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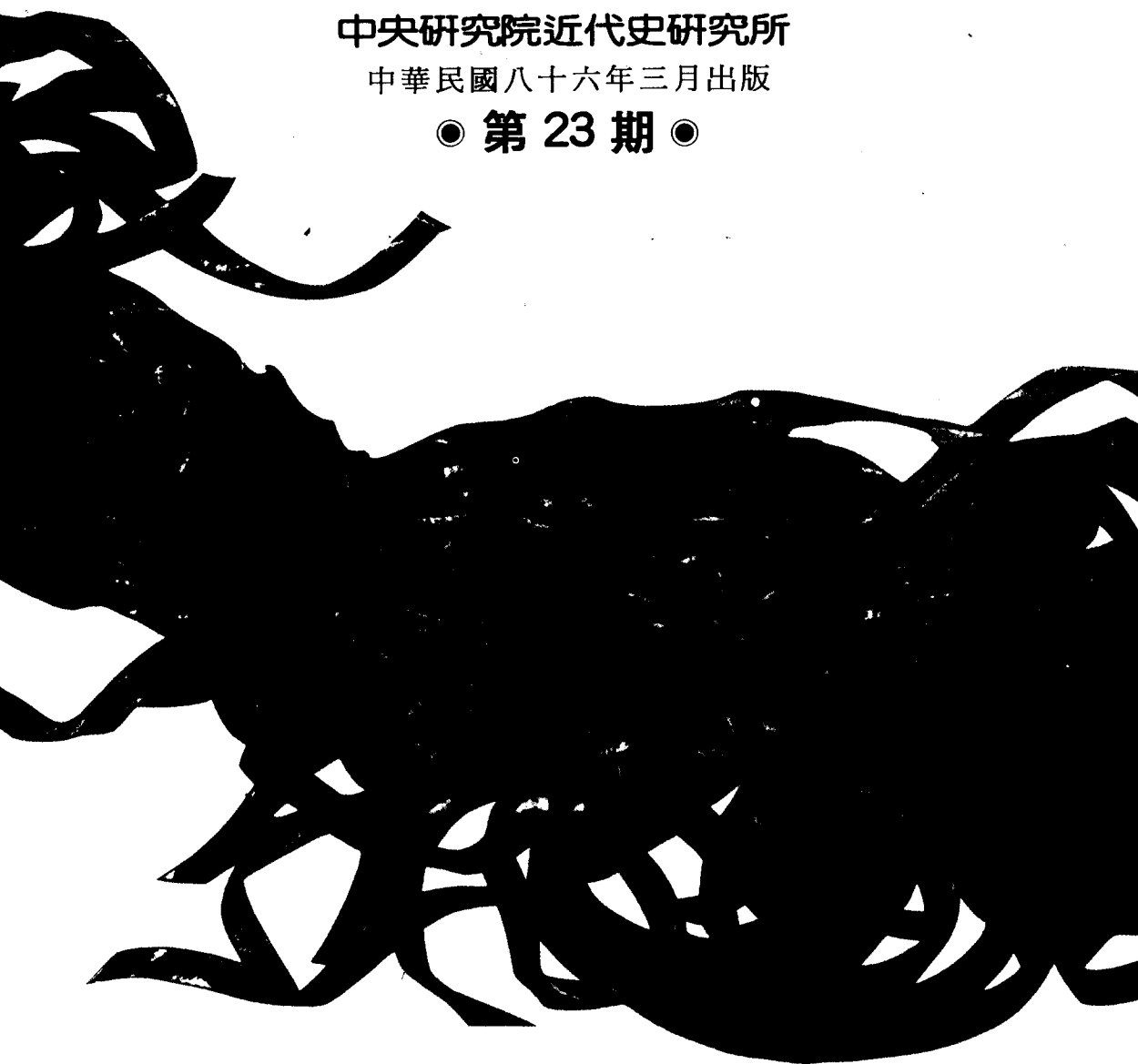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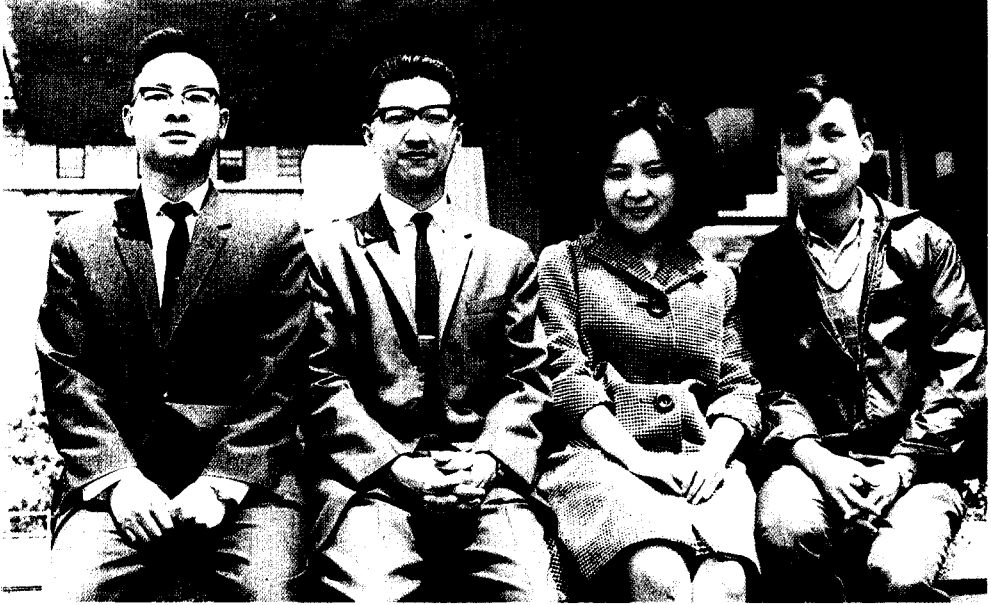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出版

● 第 23 期 ●





一九六五年六月張朋園先生(左一)留學美國時，與徐乃力先生(左二)、夏沛然夫婦合影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園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張朋園先生(右)發表退休演講前，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所長代表全所致贈「精古求新」紀念牌(李朝順攝)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二十三期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台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張隆志	3
	船政夢華： 紀念福州船政局創辦一百三十週年的研討會馬幼垣	7
	群英會翠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 國際學術討論會追記.....陳三井	11
	大陸「第二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 學術會議」記略.....謝國興	17
	「紀念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紀要.....徐乃力	20
	「馬歇爾使華」學術討論會簡介.....徐乃力	24
	會議消息.....曾金蘭輯	16、28
學術演講	研究生生活的回顧——從梁啟超到現代化.....張朋園	33
	對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William C. Kirby，陳時偉節譯	43
學人簡介	從梁啟超、立憲運動到現代化 ——張朋園先生的學術歷程與成就.....劉紀曜	52
研究概況	中國大陸太平天國史研究述評.....夏春濤	66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出版緣起.....李金強	78
	「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介紹.....廖敏淑、陳昱伶	82
	上網際網路 INTERNET 查詢近史所資訊.....胡國台	86
史料介紹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近代中國研究與典藏 ——倫敦地區史料介紹之二.....呂芳上	8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 概況（十四）——台糖檔案介紹.....姜正華	9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澳門專檔》史料介紹.....莊樹華	106

	從汪精衛一封未傳送出去的函稿談起.....邵銘煌	114
新書評介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賴惠敏	122
	陳鴻圖：《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劉素芬	126
	李勇、張仲田編著：《蔣介石年譜》.....劉維開	129
學位論文	台灣各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 之博碩士論文目錄.....丘慧君輯	135
	香港各大學研究所歷屆有關中國近代史 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鄒重華等輯	141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6.5~1997.2).....公小穎輯	147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三井

編輯委員 陳三井 陳存恭 陳永發 許雪姬

呂芳上 謝國興 張力 李達嘉

洪秋芬

執行編輯 張力

助理編輯 公小穎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 23 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台幣 200 元



學術會議

台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

張隆志*

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與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的「台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996年12月14、15兩日，假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召開。本次會議共有來自美國、荷蘭、澳洲、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等國內外學者27人，發表論文24篇，合計參與會議研討的國內外學者及博碩士研究生約兩百人。中研院李遠哲院長特以書面致詞期勉，誠為近年來有關台灣商業史研究的一場學術盛會。

有鑑於台灣作為一個海島的地理特性，本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於結合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統的探討商業在台灣歷史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會議中發表的論文內容，在時間上涵蓋了十六世紀以來至戰後台灣各時代的商業貿易史，在專題上則包括了貿易關係、商業組織、產業類型、社經生活、政策制度乃至於歷史特質等重要課題的個案研究與宏觀分析。主辦單位在議程設計上，除兼顧時代及專題性的討論外，並安排了兩場圓桌討論會(Round Table)，分別就台灣中小企業及台灣商業史研究等兩項專題進行研討，頗獲好評。各篇論文主講人、題目、評論人詳列如下：

12月14日

第一場

主持人：陳奇祿（中央研究院院士）

Leonard Blussé（荷蘭 Leiden 大學歐洲擴張史研究中心），〈十七世紀初中國海商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關係〉。評論人：曹永和（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

翁佳音（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近世初期北部台灣的貿易與原住民〉。

*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助理

評論人：劉益昌（中研院史語所）

第二場

主持人：李國祁（中研院近史所）

林玉茹（台灣大學歷史系），〈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商業資本〉。

評論人：邱澎生（中研院史語所）

卓克華（中原大學共同科），〈新竹塹郊古行號暨長和宮考〉。評論人：

吳學明（台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

陳秋坤（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從地主到豪族——土地資本、租佃制度與台灣地主精英階層的形成，1780-1862〉。評論人：楊國楨（廈門大學歷史所）

第三場

主持人：曹永和（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

黃富三（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台灣開港前後怡和洋行對台貿易體制的演變〉。評論人：葉振輝（中山大學共同科）

蔡采秀（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日本的海上經略與台灣的對外貿易（1874-1945）〉。評論人：劉序楓（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

林仁川（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晚清閩台的商業貿易往來（1860-1894）〉。

評論人：林滿紅（中研院近史所）

第四場（專題討論）

引言人：陳其南（行政院文建會副主任委員）

Hill Gates（美國 Stanford 大學人類學系），“The Type Case of Chinese-Style ‘Petty Capitalism’”

David Schak（澳洲 Griffith 大學台灣研究室），“Taiwanese Management Culture: How Best to Explain It”

Frank S. T. Hsiao（美國 Colorado 大學經濟系），“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Taiwanese Small-and-Medium Enterprises”

Douglas L. Fix（美國 Reed 學院歷史系），“Late Colonial-Era Taiwanese Small-Scal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12月15日

第五場

主持人：賴澤涵（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

莊英章（中研院民族所）、連瑞枝（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從帳簿資料看日據北台灣鄉紳家族的社會經濟生活——以北埔姜家為例〉。

評論人：溫振華（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許雪姬（中研院近史所），〈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評論人：王世慶（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

呂紹理（政治大學歷史系），〈日治時期台灣的餘暇生活與商業活動〉。

評論人：張隆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第六場

主持人：王世慶（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

朱德蘭（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日據時期台灣的中藥材貿易〉。評論人：許雪姬（中研院近史所）

許賢瑤（文化大學史學系），〈台灣茶的東北輸出(1932-1942)〉。評論人：陳慈玉（中研院近史所）

張家銘（東吳大學社會系）、葉秋玲（東吳大學社會系），〈大稻埕布業經濟之發展〉。評論人：陳國棟（中研院經濟所）

第七場

主持人：陳秋坤（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劉素芬（中研院經濟所），〈台灣的農商傳統與管制經濟〉。評論人：吳聰敏（台灣大學經濟系）

郭平欣（中研院經濟所），〈台灣省民間互助會起會與參與的決策分析〉。評論人：葉淑貞（台灣大學經濟系）

薛化元（交通大學共同科）、薛兆亨（高雄技術學院財務管理系），〈戰後台灣票據制度之發展——以支票為中心〉。評論人：林向愷（台灣大學經濟系）

第八場（綜合討論）

主持人：黃富三（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引言人：劉翠溶（中研院經濟所）

曹永和（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東亞貿易圈與台灣〉

涂照彥（日本名古屋大學經濟學部），〈怎樣看待世界市場中的台灣商業發達史〉

林滿紅（中研院近史所），〈台灣商業經營的中國傳承與蛻變——以台灣最近相關研究為基礎之省察〉

綜觀本次會議 24 篇論文中，除通論 3 篇外，計有荷蘭時代 2 篇，清代 5 篇，日據時代 8 篇，戰後 6 篇。由日據及戰後時期研究比重的增加，尤其是有關明鄭時期論文的付諸闕如，可略窺目前台灣商業貿易史研究的趨勢，似已逐漸脫離過去偏重明清時代為主的研究傳統。另一方面，從與會學者對於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清代台灣商人資本、地方菁英階層形成、晚清外商洋行體制，以及日據時期商品貿易及家族經營史等舊課題所提出的新個案或解釋，我們可以見到近年來台灣商業史研究在史料開發與研究累積上的成果。而本次會議論文中諸如近世原住民貿易，乃至日據時期餘暇生活等新課題的出現，則反映出新史料與研究觀點的影響與啓發。

除了學術業績的呈現之外，從學術交流的角度而言，本次會議亦是一次成功的經驗。除了來自不同學科及世代的國內研究者的參與，主辦單位亦邀請相關領域的多位知名外國學者來台發表論文，並擔任會議評論與引言工作。雖然部份國外學者如東京大學濱下武志教授無法來台與會，史丹福大學 Hill Gates 教授僅提出大綱報告，但諸如荷蘭萊頓大學鮑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澳洲 Griffith 大學 David Schak 教授，美國 Reed 學院費德廉(Douglas L. Fix)教授，科羅拉多大學蕭聖鐵(Frank S. T. Hsiao)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學涂照彥教授，以及中國廈門大學楊國楨及林仁川教授等人的與會，均分別提供了有關台灣商業史研究，尤其是有關戰後台灣中小企業的比較視野與研究成果，並提供了未來進一步對話交流的基礎。

在兩天緊湊的論文研討後，本次會議的壓軸，是由台史所籌備處黃富三主任主持，經濟所劉翠溶院士擔任引言的綜合討論，會中曹永和教授從台灣島史及東亞貿易圈的比較眼光，敘述台灣商業史的長期發展軌跡；涂照彥教授從國際經濟及世界市場東移的理論視角，分析台灣商業貿易發達的歷史特徵；林滿紅教授則以社會、市場和國家為主軸，歸納中國傳統對台灣商業經營的歷史影響。在這三篇總論性的重要論文外，與會學者並對於「商業傳統」一詞的妥切性及台灣商業史研究的價值與方向進行熱烈討論。

此次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的圓滿舉行，以及會議論文與討論過程中所提出的相關問題及見解，相信對於促進未來台灣商業貿易史的研究與討論，將有重要的貢獻。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船政夢華：紀念福州船政局 創辦一百三十週年的研討會

馬幼垣*

同治五年(1866)，閩浙總督左宗棠(1812-1885)獲清廷的支持，於福建省省會福州以東 19.6 公里的馬尾沿江地區（東去閩江口 17 浬）創辦福州船政局（簡稱閩廠）。統合製艦造船，培育造船的技術人才，和訓練駕駛指揮的海軍軍官，三種不同的海防工作為一體。這種綜合體制，在中國固屬創舉，在世界各國亦難找到別例。然而福州船政之頗見成績，並不單繫於左宗棠一人。船政開辦僅數月，左宗棠便調任陝甘總督，船政大臣一職乃由丁憂在籍的江西巡撫閩人沈葆楨(1820-1879)繼任。沈葆楨任此職九年，華路藍縷，為船政工作奠定鞏固的基礎。簡言之，船政的成績可用艦和人兩尺度去衡量。閩廠製造的艦隻是清季各洋海軍採用國產艦時的慣常首選。閩廠的畢業生，特別是習駕駛指揮者（其中又以曾放洋留學者聲名最著），更是遍佈清季民初主要艦隊人事的上層和中層。近人恆稱閩廠為中國海軍的搖籃，並非過譽。時移世易，福州船政局在見證近代中國層出不窮的變化之餘，自己亦演易再三，終轉型為企業化，專門建造大型貨船的馬尾造船廠。變化雖大，傳統的連貫仍是不難看得出來的。

1996 年適值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一百三十週年，馬尾造船廠遂約同船史研究會（會址設在上海交通大學船舶及海洋工程系）、福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單位，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福州東湖賓館舉辦「船政文化學術研討會：紀念馬尾船政創辦 130 週年」。

意義雖佳，會議卻辦得不倫不類。三日的會期，除了開幕禮、參觀、遊覽外，真正開會時間為兩個下午。那兩個下午的會用不分組，不設評議，不分配討論時間，僅由主席唱名，然後宣讀者詳略隨意地講解的方式進行。對參加者來說，這是輕鬆不過的安排。但這種安排很難給予學術會議應有的莊嚴。更嚴重的是，大會始終不發這兩個下午的宣讀次序單。連幾

* 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

位最交遊廣闊的福建師範大學教授都不認識所有的參加者，以致何人讀何文，大家初時還東詢西問，後來就乾脆不理，反正簡述陳見者多，創拓新境者稀，歌頌船政者眾，平情論析者寡。結果不管何人出來講，說的絕大多數都是沈葆楨如何偉大，福州船政的貢獻如何深遠的陳腔濫調，而且說來說去總超不過淺入淺出的皮毛話。

因此，替這個會存紀錄很不容易。以下是拜託幾個朋友分別筆錄的結果。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下午：

姜 鐸（上海社會科學院），〈紀念福州馬尾船政 130 週年學術討論會的發言〉

沈傳經（四川大學），〈論福建船政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林慶元（福建師範大學），〈沈葆楨與李鴻章關於購買鐵甲艦的爭論及其意義〉

陳 俱（原福建科協技術委員會），〈沈葆楨的科技觀〉

楊志本（海軍司令部）、鄭明（原海軍裝備技術部），〈船政學堂的歷史功績：兼評晚清當局使用海軍人才的嚴重失誤〉

龐百騰（美國 University of Delaware），〈1866-1875 年中國第一批近代海軍軍官在馬尾的訓練和調遣〉

席龍飛（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劉 妍（山東登州古船博物館），〈福建船政在科教興國方面的歷史貢獻〉

林偉功（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教澤深滋能拔萃，學風足式可超前：福建船政學堂對福州現代科技人才的影響〉

李春潮（黃埔造船廠），〈福建船政對廣東近代海防和造船工業的貢獻〉

巴鍾奇（湖南省物資局輕化總公司）、王鍾英（台灣中華航空公司），〈馬尾飛機處往事〉

陳 絳（復旦大學），〈沈葆楨與福建船政局〉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1866-1912 年間福建船政局的法國技術人員和造船工程質量〉

陳美眼（華東師範大學），〈船政文化與晚清海防論〉

高曉星（海軍指揮學院），〈足為海軍根基〉

- 沈祖戡（中國太平洋學會），〈沈葆楨創建船政的歷史功績評述〉
- 鍾桂臣、張良助（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第七研究院），〈中國近代海軍的
濫觴：船政〉
- 趙承春（海軍司令部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堅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建
設強大海軍的道路：發揚福建船政教育人才造軍艦的經驗〉
- 馬幼垣（香港大學），〈北洋海軍平遠艦考釋〉
- 黃政（福建省博物館），〈船政學堂紀略〉
- 陳道章（福州海軍博物館），〈論福建船政科學技術的成就〉
- 楊秉綸（福州市博物館），〈試論福建船政〉
- 蔡永基（香港大學），〈近代中國海軍搖籃：福建艦隊之創建及沒落〉
- 戴學稷（福建社會科學院），〈論船政學生〉
- 黃國盛（福建師範大學），〈論馬江之役中國軍民保衛船廠及沿江砲台的
歷史功績：兼評馬江之役的勝負與得失〉
- 林友華（閩江大學），〈船政的輝煌在於學堂〉
- 王民（福建師範大學），〈馬尾船政局與晚清社會〉
- 蕭忠生（福州市社會科學院），〈沈葆楨與教育〉
- 李鄉瀾（福州市工人業餘大學），〈談馬尾船政的文化及其歷史貢獻〉
- 鄧華祥（福建省博物館），〈福建船政製造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及
其管帶貝錦泉〉
- 陳嘉震（原上海海運學院），〈馬尾憶舊〉
- 張寒松（福州馬江海戰紀念館），〈福州海軍博物館的籌建問題〉
- 柴勇軍（中國歷史博物館），〈介紹「致遠」艦打撈及設館情形〉
- （內有因大會時間不足，或因唱名時作者不在場，而沒有宣讀，僅分發論
文的）

總括而言，會方有過份主導之嫌。在大會引導下，發言者老是把「船政文化」一詞掛在嘴邊。視閩廠的經驗，或者說得漂亮點，船政的傳統(即英文 legacy 之義)，為船政文化，牽強與誇張兼而有之。假如閩廠的經驗足稱為文化，那麼影響力絕不亞於閩廠的江南製造局豈不該稱為「江南文化」?!

會方過份主導的另一例子為「馬尾船政」一詞的濫用。福州船政局似無正式定名，故亦有以福建船政局稱之。然創辦人之日的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1835-1886)既稱之為 Foochow Arsenal, 則福州船政局之名

應較福建船政局為正式。若究之清季檔案，則閩廠一詞出現的次數比福州船政局與福建船政局二名的運用總和數字還要大。起碼這是文獻足徵的簡稱。但參加這次會議者，除一人外，竟沒有人用此簡稱。大家隨會方的主導，遍用的簡稱卻是近乎無中生有的「馬尾船政」！試問在清季文獻中，「馬尾船政」一詞究出現過多少次？

至於發言者對福州船政局清一色祇有溢美之詞，更不該是任何學術會議應有的現象。如果會方預設結論，祇許讚，不許彈，那麼會議還有什麼研討的餘地？難怪大會根本不設評議，不分配討論時間。

還有，大會在結束前，花了不少時間，讓某三十年代畢業生講述當時的海軍學校如何以愛國為第一訓導原則，和自己留校執教時如何嚴格授課，然後再由這位仁兄的學生逐一證明老師的話。簡直是鬧劇，哪是堂堂正正的學術會議應有的節目？！

對外來參加者而言，忍受這些不按牌理的節目是一遊閩廠舊址的代價。船廠確是去過，但連走馬看花的程度都談不上。會期第二日，晨早去馬尾造船廠。一個上午就是看一艘貨船下水，和到陳列室繞個圈子，便匆匆離開船廠。廠內古蹟一概免問，連擺在廠的大門那幾個代表廠歷年製艦造船成績的模型也沒有機會停下來看一眼，下午卻帶大家去參觀鋼片廠和電視機廠！

總之，這是一個預設結論，公關成分過重，不容參加者在歌功頌德範圍外稍越雷池，且沒有討論空間的研討會。

【編者按】根據與會的徐學海先生攜回台北之資料，此項會議還有以下之論文，但報告人可能並未出席宣讀：

- 史滇生（海軍指揮學院），〈沈葆楨和福建船政〉
- 余根漢（福州開發區黨校），〈馬尾船政文化初探〉
- 陳發光，〈對弘揚馬尾船政文化的幾點認識〉
- 徐鐵駿，〈馬尾船政文化建設發展前瞻〉
- 林濂藩，〈船政興國與北洋水師〉

群英會翠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 國際學術討論會追記

陳三井*

一、前 言

孫中山先生誕生於 1866 年，為紀念這位民國開國偉人的一百三十周年誕辰，兩岸莫不紛紛舉辦學術研討會以為慶祝，極一時「紀念史學」之盛。就筆者所知，上海、南京、北京等地都先後舉辦過以孫中山為主題，規模或大或小的研討會，台北亦由華僑協會總會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辦了一次「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南北同步，兩岸交流，真正美不勝收？

惟堪稱跨世紀中國近代史學界最大規模的一次盛會，則當推在孫中山故鄉——翠亨鎮舉辦的「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是會由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共同主辦，假風景優美的翠亨賓館舉行，從 1996 年 11 月 3 日至 8 日，為期共六天。

二、八方精英會翠亨

就大陸而言，由於「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討論會屬於中央級的全國性會議，再加廣東人向以好客聞名，所以這次出席參加的學者相當踴躍，號稱多達二百二十人，稱得上老少咸集，舊雨新知共聚一堂，構成本世紀末難得一見的盛況。茲誌各方重要出席人名單如下：

中國社會科學院——由高齡七十八的老院長胡繩與副院長汝信領軍，近代史研究所幾乎精銳盡出，到有劉大年、張海鵬、耿雲志、楊天石、陳鐵健、曾業英、尚明軒、梁尚賢、李玉貞等學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平津——金冲及、王玉璞（以上中央文獻研究室）、李文海、胡繩武（以上中國人民大學）、龔書鐸（北師大）、俞辛焯、李喜所（以上南開大學）等重量級學者大多捧場，並有代表宋慶齡基金會的黃華、劉啓林、盛永華等人。

冀魯豫——僅有范書義（河北師大）、成曉軍（河北大學）、孫占元（山東師大）、馬小泉（河南大學）、鄭永福（鄭州大學）等人出席，稍嫌勢孤力單。

京滬——因南京、上海都有類似的會，南來的學者只有姜義華、沈渭濱（以上復旦大學）、湯志鈞、李華興（以上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劉學照（華東師大）、馬洪武、楊振業、閻小波（以上南京大學）等人。

兩湖——陣容頗為壯盛，湖北方面有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馬敏、朱英、蘇中立（以上華中師大）、吳劍杰、蕭致治（以上武漢大學）；湖南方面有章杰廷、鄭焱、遲雲飛、郭漢民、饒懷民、李育民（以上湖南師大）、劉泱泱（湖南省社科院）。

西南——以四川大學的隗瀛濤、謝放、何一民三劍客為主，加上鮮于浩（西南交大）、王炎（四川省社科院）；貴州有吳雁南（貴州師大）、馮祖貽（貴州省社科院），廣西為黃錚（廣西省社科院）。

東北——採精兵主義，分別有關捷（大連東北民族學院）、寶成關（長春吉林大學）、劉興華（哈爾濱師大）三位代表。

福建——雖近在咫尺，但出席者並不算茂盛，有羅耀九（廈門大學）、林慶元（福建師大）、戴學稷（福建省社科院）、林偉功（福州市方志會）等人。

廣東——身為地主，堪稱傾「巢」而出，大致以廣東省社科院與中山大學兩路人馬為主，有張磊、張難生、黃彥、劉望齡，方志欽，劉曼容、王杰、丁旭光（以上為省社科院）、陳錫祺、林家有、李吉奎、段雲章、邱捷、桑兵（以上為中山大學）等，此外尚有楊萬秀、鍾卓安、駱寶善（以上為廣州市社科院）、莫世祥（暨南大學）、吳智棠（南方成人經貿學院）等人。

台灣——聞報名參加者四十餘人，實際到會者約為一半，有劉鳳翰、陳三井（以上為中研院近史所）、胡春惠、林能士、馬起華（以上為政治大學）、魏萼、姜新立（以上為高雄中山大學）、邵台新（輔大）、王甦、莊政（以上為淡江）、劉碧蓉（國父紀念館）等。

香港——李志剛（基督教文化學會）、余炎光（樹仁學院）等。

澳門——霍啓昌、盧文輝（澳門大學）、吳志良（澳門基金會）、陳樹榮（澳門日報）等。

日本——陣容相當整齊，有山田辰雄（慶應大學）、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學）、伊原澤周（追手門學院）、山口一郎（孫中山紀念館）、中村哲夫（神戶學院大學）、深町英夫（中央大學）、緒形康（愛知大學）等老中青三代學者。

韓國——裴京漢（釜山女大）。

越南——阮輝貴（社會科學與人文中心）。

俄羅斯——舍維廖夫（Konstantin V. Schevelyoff，石克強，科學院遠東所）。

澳洲——黃宇和（雪梨大學）。

美國——吳相湘、韋玉華、孫穗芳。

從這份名單，大致可以看出，中國國內學者網羅相當整齊，但做為國際學術討論會，比起 1986 年與 1990 年的兩次，出席者仍有美中不足之處：

（一）歐美學者幾乎完全缺席，像過去的常客，如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巴斯蒂（Marianne Bastid）、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韋慕庭（C. Martin Wilbur）等人皆不見蹤影。

（二）台灣史學界捧場者亦明顯減少。

（三）香港及東南亞學者所佔比例稍嫌偏低。

三、開會過程與論文討論

「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討論會因係中國全國性活動的組成部分，所以顯得特別地隆重，開幕典禮由中國孫中山研究會秘書長金沖及與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及社科聯主席張磊共同主持，黨政學三界領導冠蓋雲集，輪番上台致詞，所以耗用一個上午的時間。

在眾多致詞中，不可避免地充滿宣示性的政治口號。例如胡繩院長除了強調，孫中山是兩岸共同尊敬的偉人外，並預言繼港澳之後，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其勢不可擋，將成為事實。

代表宋慶齡基金會的黃華、劉啓林均表示，宋慶齡與孫中山同樣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希望學者對宋慶齡的研究，給予像對孫中山研究一樣的關

注。多位致詞者幾乎異口同聲，一再提到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但來自夏威夷，曾出版《我的祖父孫中山》一書，並自稱孫中山孫女的孫穗芳女士，在受邀講話時卻鄭重指出，終孫中山一生，無所謂新舊三民主義之分，為開幕典禮留下一點不同的聲音。

論文宣讀分成全體會議與分組討論兩種。把論文安排在全體會議上報告，是大陸開會文化的特色之一，多少含有敬老尊賢的意味與地區性的分配考慮，充滿人情味，沒有定規與討論，全憑報告人各顯神通，有形式上的榮寵，而缺乏實質上的雙向溝通。

真正的論文宣讀分成 A、B、C、D 四組舉行，除參觀節目外，共分四場，每場均設兩位召集人，場場宣讀的論文少則七篇，多則九篇，堪稱濟濟一堂，所以每人的報告時間僅有十分鐘，相當緊湊，但若召集人控制時間得宜，也能發揮討論的功效。筆者曾遊走各組，瞭解若干組的一些討論，進行得相當不錯，具備高度的學術水準。

要想對 130 篇論文做個簡單的介紹，事實上不可能，也太佔篇幅，所以在此僅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並參考與會者公開表達出來的意見，做一番非全貌性的「掃描」：

(一) 因本次討論會的主題標誌著「近代化」，所以論文的題目除了與孫中山直接有關者外，幾乎一大半均冠上「近代化」的字眼，可謂集海內外「近代化」之大成；不過，也有少數幾篇偏離主題。

(二) 在大陸討論現代化，類似改革開放一樣，仍然是個大熱門，所以無論執筆為文或宣讀討論，容易陷入下列三種截然不同的模式：

1. 一切往現代化的框架去套，把現代化變成「科學性」、「合理性」、「正當性」的堂皇藉口；
2. 對現代化不斷「拔」高，認為孫中山早有很好的現代化理論，系統完整，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實現；
3. 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根本扯不上現代化的理論，一切都是後人為了趕時髦，因緣附會強加其身。

(三) 會中有一組專談孫中山與外國的關係，諸如中美、中日、中俄、中法、中德等，是一項新穎而重大的收穫，值得再深入探討。

(四) 會中也有一組專談孫中山與華僑及會黨的關係，可惜多是一些老生常談，在資料與方法上亦較缺乏突破。

(五) 在討論過程中，當然也出現了一些歧見，例如民生主義的內在

矛盾，近代化設計的可操作性，以「統戰思想」新詞彙加諸孫中山身上是否合適等大大小小問題。

（六）由於會議頻率太高，現代化幾乎氾濫成災，不可避免地炒冷飯的舊題目居多，而有創意，能發掘新材料，並提出深度解釋的高水準論文，相對較少。

四、印象難忘的參觀活動

一般而言，參加研討會，除了紀念性並藉此以文會友之外，多少也抱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藉機參觀名勝古蹟的願望。這次有幸到孫中山的故鄉開會，當然也希望得償遊覽與孫中山有關的勝蹟的宿願。

因此，在緊湊的節目之外，我儘量抽空，利用各種機會與管道，展開一系列的參觀活動，以增廣見聞。本文的目的，不在報導參觀的所見所聞，所以僅做一簡略交代：

（一）利用休息時間，與李玉貞、舍維廖夫一齊參觀孫中山故居與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二）在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李伯新先生的導覽下，與一群中日學者，參觀中山紀念中學、孫眉墓、陸皓東墓園及翠亨村的馮氏宗祠（孫中山上私塾處）、陸皓東和楊心如等人故居。

（三）在林家有教授陪同下，與魏尊教授專車到珠海特區一遊，參觀這個新興的經過規劃的既富裕又美麗的城市。

（四）在大會安排下，全體參觀了中山市，對這個全中國唯一的花園城市的市政建設，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回廣州之後，在黃彥、林家有、李吉奎等好友陪同下，遊覽了聞名已久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中國國民黨一全大會舊址、越秀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等名勝。

雖然受到時間的限制，仍然留下不能盡窺廣東勝蹟全貌的缺憾，但已算不虛此行！

五、結尾的話

負責綜合評述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海鵬先生，認為

此次討論會氣氛熱烈、和諧、成功，他給 130 篇論文整體打了七十五分，或許稍嫌寬厚，帶有鼓勵性，但雖不中亦不遠矣！

說過「歷史是劃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這句不朽名言的華中師大章開沅教授，對類似紀念孫中山這種「紀念史學」的討論會，曾語重心長地提出幾點懇摯的意見，值得海內外同行一齊分享共勉：

(一) 領域要拓寬

要把孫中山放在整體人類歷史的大脈絡中更廣闊的領域裡去做比較，才能為孫中山找到更恰當的定位。

(二) 更勤奮地去挖掘史料

不要把研究孫中山，由「顯學」變成「險學」（意指降低水準），應不斷去挖掘新材料，從資料中去尋找新的解釋，增加歷史的深度。

(三) 尊重歷史，超越歷史

真正的史學不僅屬於全民族，更且屬於全人類。嚴酷的現實教育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也不容許竄改歷史。而做為歷史學家，更應該捍衛歷史的真實，維護歷史的尊嚴。所謂超越歷史，就是不要受陳舊歷史眼光的局限，更不要因襲過去歷史所造成的各式各樣的偏見和誤解。

俗云：「文章千古事，不怕先生，怕後生」，「紀念史學」若辦理得好，大家嚴肅以待，未嘗不可以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推動並激勵素來不甚受重視的史學研究，不斷提升研究水準，有朝一日同樣可以留下扎實而有知識累積貢獻，並垂之久遠的耀眼成果？（1997年1月31日脫稿）

會議消息：「七七抗戰」研討會三種

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題目暫定）

由中華軍史學會主辦，擬於今年7月8、9兩日在台北舉行。

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由中國歷史學會和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舉辦，將於今年7月18至20日在台北舉行。

「七七事變」六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史學會、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北京市科學聯合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舉辦，將於今年7月初在北京舉行。（曾金蘭輯）

大陸「第二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 學術會議」記略

謝國興*

—

大陸的「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學術會議」，係「中國史學會」與地方上的學術機構合作舉辦。第一屆會議於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西安舉行，出席者限定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有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百餘名代表參與，平均年齡三十三歲。五年之後，在一九九六年的十月七日至十一日，仍由「中國史學會」主辦，安徽大學協助（名義上兩者共同主辦），在合肥安徽大學召開了第二屆會議。這一次出席者的資格限定一九五五年以後出生。根據大會手冊的出席代表資料作一粗略的統計，出席者年齡在三十歲以下者十人，三十一歲到三十五歲之間者四十九人，三十六歲至四十一歲之間者五十人，不明者二人，共一一一人。在這一百一十一人中，學士學位者九人，碩士最多，六十七人，博士二十二，不明者十三人。職務方面，助教四人，講師三十人，副教授六十一人，教授十六人。其中兼任副系主任（副所長）者至少十八人，擔任系主任（所長）甚至副院長者十人。在一九九〇年前後，大陸歷史學界的青年學者具有副教授以上資格者絕少，近兩三年形勢大為改觀，年長者漸退休，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均有提拔年輕學者的政策，尤不乏破格提拔之例，有一年之內連升兩級成為教授者，也有國外回來的年輕學者直接評（職稱）為教授者。在年輕化的政策下，此次出席會議者年紀多在三十五歲左右，而已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者約佔百分之七十。據瞭解，許多歷史系所均無主任、所長，副系主任或副所長實際主持系（所）務工作。

參與會議的出席者有兩類，一為主辦單位邀請組成的「會議組織委員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會委員」及「學術顧問」，包括中國史學會的會長、理事、北京及安徽方面較年長的歷史學者，另一為各省歷史學會推荐的代表及中國史學會主動邀請的學者。我因認識幾位中國史學會的理事，承其盛情，受邀出席，遂以「觀察員」的心情與會。

二

這次會議的形式與一般正式學術會議有所不同。較年長的出席者僅參加會議，不必準備論文，年輕的出席者必需提交論文，但大會議程安排中，並不針對出席者的論文作討論，僅將論文大綱編印成冊，供與會者參考。大會另外定了討論主題，因此會議性質比較接近「史學工作會議」。

一九九一年的第一屆會議討論主題有二：「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和「青年史學工作者的責任和貢獻」，一九九六年的第二屆會議大會討論主題有六：

- (一)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歷史學的科研和教學工作
- (二) 世紀之交中國史學的回顧和展望
- (三) 中國史學在二十一世紀世界史學中應有的地位和貢獻
- (四) 中國史學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 (五) 迎接新世紀青年史學工作者的修養、使命和責任
- (六) 面向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的社會功能及開拓、發展

在議程安排上，第一天開幕式之外，主要為「大會發言」，安排戴逸（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蔣大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瞿林東（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椿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員）等年長學者，以及出席會議的幾位年輕學者就上列「大會主題」發表專題報告（演講）。內容包括回顧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歷程、史學理論的內涵與演變、具體研究方法與主題的檢討、中國史學會參與國際史學大會的經過，及爭取公元二千年國際史學會在北京召開大會失敗的原因等。

第二天開始分組討論，大會依與會者所提交論文的性質，分成史學理論、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世界史等五組，分別指定召集人，召開小組討論。參與小組討論的，除了提交論文的出席者外，還有較年長的「學術顧問」，以及各報刊、出版社的文史編輯人員，前者具「指

導者」意義，後者則係來瞭解學術研究動態，並多認識一些朋友，作為將來「組稿」工作的準備。這兩類型的人游走各分組，不固定參與某一分組的討論。

我原來被分配參加「中國近代史」這一分組，原想隔天轉到「中國現代史」分組旁聽，不意分組討論的第一天下午，原中國現代史分組的人員紛紛跑到中國近代史分組來，最後連召集人也自動過來，分組討論的第二天，這兩個分組乾脆合為一組開會。大陸史學界過去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將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以一九一九年為時間斷限，強行劃分，其不切實際，由此可見一斑。

就我參與的分組討論所見，第一天大家先各自介紹自己，包括研究領域、所屬學術機構情況等，就耗去了不少時間，接下來也不是針對各自提出的論文內容作報告與評論或討論，而是針對「大會議題」以及各人研究心得發表意見，因此顯得零亂，沒有太多共同討論的焦點，因此這次會議的性質接近「工作會議」而非「學術會議」，聯誼的意義較大。

雖然大會設定了六項討論主題，但在分組討論時很少有人針對這些議題發言，大家更關心的是實際研究工作中碰到的問題、歷史學在目前大陸學界的地位、出路等問題，許多與會者共同的感慨是：相較於「解放初期」，目前大陸的歷史學界面臨的是學科不受重視、研究成果出版不易、歷史科系招不到或招不足學生、學生畢業後找不到理想工作等現實問題。

就與會者所提交的論文大綱，以及分組討論時發言來看，雖然仍有不少人堅持（或形式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但流於口號意義的情況也不在少數。普遍的現象是，大家已公然的否定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而「現代」的中國史學，除了一方面仍喊著「堅持」馬克斯主義外，同時也對於「辯證唯物史觀」重新加以解釋，不堅持「經濟決定論」之類的說詞，而是「凡推動歷史具體發展的各種因素，皆是歷史前進的動力」；一方面主張馬克斯主義的思想觀念是「最有效」的史學研究指導，另一方面也承認其他類型的歷史研究方法有其價值，應吸收其長處，「以豐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內容」。我個人的觀感是：絕大部份的年輕史學工作者並不標榜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研究方法論上的優越性，傑出的研究成果，從其字裏行間，也不易明白看出其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總之，「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似乎有點類似當年台灣的國父思想教師所展示的三民主義：博大精深，無所不包。

「紀念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紀要

徐乃力*

由全國政協及陝西省政協資助，西安事變研究會及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合作主辦之「紀念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於1996年12月7日至9日在西安市西北大學舉行。與會學者、政協代表，及特邀人士近百人參加，原定各類論文共有六十一篇，但有數人因故未到，會場派發之論文約有五十五篇（請見文後之論文目錄）。海外學者受邀者六人，但有兩位未能出席。台灣學者因種種因素限制，無人出席，為會議之遺憾。不過高茂辰先生率同力霸公司電視台製作小組，到大會採訪，成為台灣方面僅有的出席者。

中共中央一向對西安事變持肯定態度，每逢重要的周年均有紀念儀式，但是由於過去政治運動的頻仍，對於張學良及楊虎城的部屬及家人，並非一直尊重、優待。有些人在文革期間受到嚴重迫害，家屬至今仍感憤慨。今年情勢大為不同，對西安事變的紀念擴大舉行，除了的事變發生地的西安舉行為期三日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外，12日又由全國政協主持，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儀式，並由江澤民親臨致詞，可以說已將西安事變之肯定提昇到了國家黨政的最高層。當年的西安事變是促成中國停止內戰，走向全國團結抗日之一重要關鍵。推崇這一歷史事件在目前海峽兩岸關係僵著的形勢下，自然有其政治作用。

西安的會議雖然為期三日，但各項儀式及參觀活動占時頗多，分組之學術討論稍嫌不足。最後一天的綜合學術交流則由大會安排十位人士做總結報告及簡介張學良在夏威夷之起居近況。報告人士之安排亦煞費苦心以求取平衡，其中兩位代表張、楊家屬，兩位是海外學人。其他六位學者代表大陸各地區，包括東北、陝西、北京、河南與四川。

會議的討論中，受到一致肯定的是西安事變邁向團結抗日的歷史意義、張學良及楊虎城之精誠愛國，及中共代表周恩來之調解以求和平解決

*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歷史系教授

之功。有好幾位大陸學者對於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在事變期間調停之功亦極爲推崇。至於會中爭論和一些新觀點的提出亦有不少，茲簡要介紹於下：

一、西安事變是否挽救了紅軍的命運？有人認爲紅軍已臨覆滅之危機，而事變挽救了局面。但亦有認爲紅軍雖然勢蹙，仍保有堅強之戰鬥力，由於全國民心之趨向，遲早會「逼蔣抗日」。

二、「擁蔣抗日」之政策究係中共本身政策之演變，還是接受史大林及第三國際之指示？這一問題涉及中共的獨立自主性及1936至1937年間中共與蘇共之關係。

三、關於中共與張學良之東北軍及楊虎城之十七路軍關係之探討，同時涉及的問題如中共對事變的參與、紅軍與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中下層之聯繫等等。

四、對於事變期間南京政府中的「主戰派」，過去大陸史學界一向歸之於「親日派」。對於主戰最力的何應欽，更認爲是有野心擬取蔣而代之。會中有人對這些論點提出批駁，並根據可靠史料更深入探討主戰派的動機。

五、有些論文將西安事變的討論面擴大，如研討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善後問題，尤其是東北軍內部發生的「二二事件」；或是討論擴及全國各地之「東北救亡運動」；以及從西安事變前後至抗戰初期之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及宗教問題之探討等等。

總結而言，這是一次以西安事變爲主題規模最大的學術討論會，所提出的論文品質雖然參差不齊，但至少有一半數具有高度可讀性。一般而言，大陸有些研究人員在資料應用方面佔有優勢，特別是涉及中共檔案及地方上的有關資料，往往能利用此等史料加以發揮。相比之下，海外學者則多以宏觀的角度，特別以國際形勢來分析西安事變時期中國的局勢，或者探討全國的政局，或評論歷年來對此事件研究之成果。海內外對西安事變這一重要歷史事件之研究頗能互補短長，收切磋之功。若要對與會大陸學者的論點提出最簡要的批評，則是對張學良、楊虎城有些過度推崇，跡近偶像化之嫌。而有些學者對西安事變之影響過度強調，甚至認爲1949年大陸易手亦導因於此。

「紀念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目錄

李云峰 愛國主義：西安事變的主旋律

丁雍年 西安事變與民族精神

- 牛桂云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愛國精神的集中體現
- 王作權 試論西安事變之魂
- 張梅玲 西安事變：中國近代歷史的轉折點
- 唐德剛 西安事變改寫了世界歷史
- 王 杉 略論西安事變與中國的現代化
- 陳國慶、楊 洪 論西安事變的傳統文化底蘊
- 王續添 傳統政治文化觀與西安事變——試析傳統政治文化觀對張學良、蔣介石的影響
- 楊光彥、張國鏞 從「分化」到「聚合」——論「九一八」事變與西安事變的內在關係
- 房成祥 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幾個問題
- 丁勝利 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要原因
- 史滇生 西安事變與中國軍事格局的變化
- 周錫銀 西安事變與團結抗日民族政策
- 范克明 雙「十二」功垂青史
- 宋廣波 大陸十年來西安事變研究綜述
- 吳天威 西安事變研究之介紹與批評
- 鄭德榮 西安事變若干問題的新思考
- 梁仲明 關於西安事變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兼與張仲良先生商榷
- 陳鐵健 西安事變發動時間考略——《西安事變新探》札記之一
- 李 敏 試論優秀個體的社會價值與歷史地位——論張學良愛國思想與實踐
- 任振河 試述張學良五訪閻錫山的歷史意義
- 李 昕 張學良送蔣歸寧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義舉
- 高曉華、陳肖沫 身在禁中、心憂國事——張學良為處理西安事變善後所作的努力
- 畢萬聞 相忍為國、一致對外——談張學良幽居期間與周恩來的往來密信
- 高茂辰 認真
- 王 冀 西安事變與東北軍的善後問題
- 翁有為 張學良、楊虎城愛國思想與西安事變
- 苗建寅、苗建基 論楊虎城將軍革命思想發展的道路
- 原蔭盛 楊虎城堅守西安的戰略地位及其重大意義
- 雷云峰 民族英雄正氣歌——弘揚楊虎城將軍愛國主義的民族氣節

- 賀伯清 楊虎城十七路軍發動西安事變的底蘊
- 王寶成 論馬占山將軍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及善後問題的重要貢獻
- 王宇明 趙壽山將軍與西安事變
- 蔣文祥 蔣介石與西安事變
- 楊奎松 蔣介石是被張學良設計騙來西安生擒的嗎？
- 梁星亮 馮玉祥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貢獻
- 李仲明 試論西安事變中的何應欽
- 熊宗仁 論西安事變中何應欽主戰之動機
- 李秀芳、劉耀京 宋美齡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 邢建榕 端納與西安事變
- 徐乃力 西安事變前後中央與地方實力派的關係
- 夏素清 試論中國共產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作用
- 李云峰、葉揚兵 論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決策調整
- 蘭虹、房成祥 試論中共「逼蔣抗日」政策與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方針
- 張天社 論西安事變與中國共產黨政治角色的轉換
- 宋毅軍、戴茂林 中共在西安事變前後的軍事戰略防禦
- 孫欲聲 西安事變與西路軍
- 張桂英 中國共產黨爭取東北軍走上聯共抗日道路之歷史探源
- 葉心瑜 毛澤東與西安事變
- 甘久翔 毛澤東與西安事變
- 郭志民 張聞天與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 何步蘭 張聞天與西安事變中的「二·二事件」
- 王秦 中國共產黨的密使潘漢年與西安事變
- 周毅 東北流亡集團與西安事變
- 王連捷 淺議西安事變與東北救亡運動
- 魏向前、王國鈞、于曉春 西安事變前後東北大學學生的抗日救亡活動
- 袁武振、梁月蘭 西安地區的抗日救亡刊物與西安事變
- 羅平漢 試論日本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兼論西安事變後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
- 張慶瑰 共產國際與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 朱永德 西安事變與世界大局——兼論蘇聯所扮的角色

「馬歇爾使華」學術討論會簡介

徐乃力*

位於美國維琴尼亞州(Virginia)中西部，在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 Mt.)及著名風景區藍嶺(Blue Ridge)之間的小城萊克心頓(Lexington)，人口不及一萬，卻有兩間高等學府：一是私立的「華盛頓及李氏大學」(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另一所就是著名的軍校「維琴尼亞軍事學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這一軍事學院除了軍事訓練及管理以外，其課程相當於一般大學。自 1839 年建校以來，其畢業生只有百分之十八成爲職業軍官，但在美國的陸軍史上，維琴尼亞軍校畢業生中有 258 人升爲將官，而其最卓越的畢業生是馬歇爾將軍(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馬歇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六年(1939-1945)，擔任美國陸軍的最高指揮官「陸軍參謀長」(Army Chief of Staff)，運籌帷幄，指揮調動數百萬大軍，主宰同盟國的軍需供應，對於取得戰爭的勝利居功甚偉。戰後未及稍息即爲杜魯門總統指派爲其特使，來華調停國、共之爭，使華的任務甫結束，即爲杜魯門任命爲國務卿，在三年的任期中執行了援助西歐各國，促成經濟復蘇的「馬歇爾計劃」聞名於世。下任後被推選爲「美國紅十字會」主席。而 1950 年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再邀其出山，當時馬氏已屆七十高齡，終又勉爲其難，擔任了近兩年的國防部長。1953 年馬氏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一位職業軍人出身而獲此殊榮，也可說是絕無僅有。馬氏過世以後，其母校即闢地籌建了馬歇爾展覽館，收藏了與馬氏一生有關之圖書文件，以供學術研究之用。

1995 年馬歇爾基金會的董事會決定主辦一次以「馬歇爾使華，1945 年 12 月至 1947 年 1 月」爲主題的學術會議(George C.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A Symposium)，由基金會的總幹事 Dr. Larry I. Bland 主持籌備事宜。經過了一年多的聯繫與準備，會議終於 1996 年 10 月 18 至 19 日舉行，與會的學者及軍官共約五十餘人，在會場宣讀

*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歷史系教授

之論文共 21 篇，分爲六個小組，副題分別爲：

- 一、馬歇爾使華任務之起源
- 二、對馬歇爾使命之各種看法
- 三、中國各界對馬歇爾使命的看法與態度
- 四、馬歇爾使華及中國內部情勢
- 五、使華期間之軍事發展及情報工作
- 六、馬歇爾使華的影響（會議之程序表附於本文之後）

除了宣讀學術論文以外，在開會期間前後有三次特別演講，講題涉及馬歇爾使華的歷史背景及當今的美、中關係。開幕式晚宴時，由頗有聲望的美國外交史學者 Thomas G. Paterson 講馬歇爾一生的時代背景與美國的國勢發展。會議首日的晚間由美國前任助理國務卿 Lawrence S. Eagleburger 作一次特別演講，探討當前的中（共）美關係。Eagleburger 爲人風趣，以講話率直出名。會議結束的晚間則由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 (Andrew J. Nathan) 講馬歇爾使華與當前美、中關係之歷史淵源。

此次會議之幾點主要特色爲：

一、會議集合了兩類研究背景及訓練很不同的學者於一堂：第一類是研究美國外交史及軍事史的學者；第二類是研究亞洲史的學者。如以學科之訓練而言，則半數學者是歷史學家，而其他一半則是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專業的學者。雖然在討論過程中並未引起嚴重爭議，但這次會議給不同背景的學者一次對話及討論的機會。

二、會議從各種角度深入探討有關馬歇爾使華之各方面：包括對馬氏受任命之政治及個人背景分析；馬氏對其使命之信念及外交手腕；馬氏與美國新聞媒體巨擘亨利魯斯(Henry Luce)之關係變化；中國對立的國、共兩方對馬氏使命的看法及反應；馬氏與魏德邁將軍(General Albert Wedemeyer)之關係；馬氏使華時期美國的情報工作；馬氏軍事調停方案之可行性；美國的日本占領政策之變化對中國政局產生之影響等等。有許多題目是過去研究這一段歷史所未曾涉及的範圍。尤有趣者是 Steven I. Levine 一文同時探討了 1945-46 年馬氏之調停使命與 1989-92 年國際對非洲莫三鼻給(Mozambique)內戰之調停，頗有政治學者對問題比較研究的新看法。

三、會議中有不少論文發掘及採用了不少新資料，譬如對馬氏生平及個人關係之研究；大陸來的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學者採用了一些中共方

面的新史料；另外有關美國在 1940 年代情報工作的新史料等等。當然仍有不少學者感嘆史料收集之不夠周全，馬氏使華這一歷史事件已過去了半個世紀，而有些直接有關的一手史料迄今仍未公諸於世，是為最大缺憾，特別是中國方面的檔案不夠公開，有人直接點出「大溪檔」，希望能盡早付印，以供中外學術研究之用。

「馬歇爾使華」學術討論會講程

10 月 17 日

Keynote address by Thomas G. Paters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In Marshall's Time: Nation Building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10 月 18 日

Session 1: Origins of the Mission

Chair: Larry I.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

Mark A. Stoler (University of Vermont), "Why George C. Marshall? A Biographical Assessment"

Wang Chen-main (王成勉，台灣國立中正大學)，"Marshall's Style and Approach"

Edmund S. Wehrl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Marshall, the Moscow Conference, and Harriman"

Commentator: Thomas Paters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ession 2: Views on the Mission

Chair: Edmund S. Wehrl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Keith E. Eiler (Hoover Institution), "General Wedemeyer's Views"

Robert E. Herzstei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Luce, Marshall, and China: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in 1946"

Ramon H. Myers (Hoover Institution), "Frustration, Fortitude, and Friendship: The Reactions of Chiang Kai-shek to the Visit of 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 to China, December 21, 1945 to January 8, 1947"

Commentator: Nancy Bernkopf Tucker (Georgetown University)

Session 3: Chinese Views on the Mission

Chair: Larry N. Shyu (徐乃力，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He Di (何迪，President Standard Industries Co, Beijing), "Mao's Changing

Perceptions and the Mission's Effect on CCP Policies”

Zhang Baijia (章百家，北京國際與戰略研究基金會), “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Niu Jun (牛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Guomintang and CCP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rshall Mediation”

Yu Shen (沈于，Indiana University Southeast), “The Marshall Mission — Then and Now: A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CCP's Views on the Mission”

Commentator: Larry N. Shyu (徐乃力)

Address by the Honorable Lawrence S. Eagleburger on the State of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0月19日

Session 4: Chinese Domestic Scene

Chair: Mark F. Wilkinson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Larry N. Shyu (徐乃力，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In Search of Peace in Postwar China: The Domestic Agenda”

Roger B. Jeans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Last Chance for Peace: Zhang Junmai (Carsun Chang) and Third-Party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October 1946”

Odd Anne Westad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Could the Chinese Civil War Have Been Avoided? An Exercise in Alternatives”

Commentator: Ramon H. Myers (Hoover Institution)

Session 5: The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Story

Chair: Yu Shen (沈于，Indiana University Southeast)

Joseph K. S. Yick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The Communist-Nationalist Political Struggle in Beiping During the Marshall Mission Period, 1945-1947”

Mark F. Wilkinson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A Shanghai Perspective on the Marshall Mission”

Marc Gallicchio (Villanova University), “About Face: General Marshall's Plans for the Amalgamation of Communist and Nationalist Armies in China”

Maochun Yu (U. S. Naval Academy),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ommentator: Warren I. Cohe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Session 6: The Consequences

Chair: Roger B. Jeans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uchu Zhang (Flushing, N. Y.), "Why Marshall's Mission Failed"

Shigehiro Yuasa (Tokyo Woman's Christian University), "Japanese Views of the Communist-Nationalist Accommodation"

Thomas D. Lutze (Illinois Wesleyan University), "America's Japan Policy and the Defection of Chinese Liberals, 1947-1948"

Steven I. Levine (Boulder Run Research/Duke University), "Mediation of the Chinese (1945-46) and Mozambique (1989-92) Civil Wars"

Commentator: Andrew J. Nathan (Columbia University)

Concluding address by Andrew J. Nathan (Columbia University) on the Mission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U. S.-China relations

會議消息

曾金蘭*輯

"Narratives, Arts and Ritual: Imagining and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研討會

時間：1996年11月15日

地點：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Kai-Wing Chow (周啓榮,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Narrating Nation, Race and Culture: Imagining the Hanzu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Chi-kong Lai (黎志剛,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National Identity and Hair in Modern China"

Hung-yok Ip (葉紅玉,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助理。本欄承陳存恭、羅久蓉、黎志剛、Roger B. Jeans等教授提供資料，特此致謝。

- Ideal Image of Nation in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Culture”
 Peter Zarrow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Imperial Ritual/
 National Ritual: Emperor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asenjit Duara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Order of Authenticity: National
 History and Gender in Modern China”
 Andrew Jon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The Sing-Song Girl and
 the Nation: Music and Mass Culture in Shanghai, 1927-37”
 Jiu-jung Lo (羅久蓉, 中研院近史所), “Trials of Taiwanese as *Hanjian* and War
 Criminals and the Search for Taiwan Identity in the Post-war Period”
 Poshek Fu (傅葆石,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Framing
 Identity: Mainland Emigres, Marginal Culture, and Hong Kong Cinema,
 1937-1941”

西安事變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時間：1996年12月12日 地點：台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蔣永敬（政治大學歷史系），〈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諫蔣的背景與經過〉

西村成雄（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張學良「遊歐經驗」之心路歷程〉

徐乃力（加拿大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西安事變與抗戰前夕中
 央與地方關係的變化〉

朱文原（國史館），〈宋氏兄妹與西安事變〉

楊維真（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龍雲、劉湘與西安事變〉

王克文（政治大學歷史系），〈西安事變前後的汪精衛〉

張力（中研院近史所），〈「蘭州事變」相關史料的考訂與發現〉

許育銘（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西安事變時期日本之輿論反應〉

蘇澄基（中國時報），〈蔣中正先生何以輕蹈虎穴〉

陳存恭（中研院近史所），〈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

劉維開（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山城堡之役研究〉

（此項會議之詳細報導，請參考高純淑，〈西安事變六十週年學術研
 討會紀實〉，刊於《近代中國雙月刊》第116期，1996年12月）

紀念北伐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時間：1996年12月17-18日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

主辦單位：中華軍史學會

王綱領（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英美二國對北伐的態度與政策比較——以「出兵保僑」為中心〉

唐啓華（中興大學歷史系），〈1927年天津英租界歸還談判——兼論北伐時期的英國對華政策〉

陳鵬仁（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北伐與租界問題——兼談北方政局〉

毛知礪（政治大學歷史系），〈試論張嘉璈與北伐時期財政金融的關係〉

陳慈蓉（國防部史編局），〈「孫越宣言」的再解讀及其相關的幾個問題〉

李恩涵（中研院近史所），〈陳友仁與北伐前期(1926-1927)的「革命外交」〉

Vladimir S. Miasnikov（弗拉基米爾·斯·米亞斯尼科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遠東研究所），“The Northern March and the Soviet Union’s Position: Perspective of Russian Scholar”

劉鳳翰（中研院近史所），〈馮玉祥與北伐〉

蘇啓明（行政院陸委會），〈論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期間的發展〉

林玲玲（陸軍官校），〈廖仲愷與黃埔建校建軍〉

簡文吉（政戰學校），〈北伐時期國民政府憂患排除及其結果〉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北伐前後中國國民黨在山東的黨務(1919-1935)〉

卓文義（空軍官校文史系），〈北伐時期航空隊之參戰與貢獻〉

劉祥鋒（國防部史編局），〈北伐前航空系統及其戰時地位〉

簡筌簧（國史館），〈晉綏軍與國民革命軍北伐〉

老冠祥（香港珠海書院），〈楊樹莊在北伐期間率海軍易幟的意義和影響〉

張世瑛（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龍潭戰役的評價與反思〉

朱法源（中研院近史所），〈白崇禧結束北伐前後〉

十七世紀的嶺南學術研討會

時間：1996年12月21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主辦單位：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香港華南研究會、中山大學歷史系

韋慶遠（中國人民大學），〈近年來的檔案發現與珠江三角洲研究〉

關文發（華南師範大學），〈關於十七世紀嶺南文化的幾點意見〉

蔡鴻生（中山大學），〈十七世紀嶺南佛門的分化〉

葉顯恩（廣東社會科學院），〈十七世紀廣東經濟的復興與李士楨撫粵〉

蕭田（華南農業大學），〈「綜觀經濟學」與社會經濟史研究〉

劉偉鏗（肇慶市志主編），〈嶺南文化的特點及其十七世紀的反思〉

鮑煒（中山大學），〈關於清初遷界與復界的幾點思考〉

- 陳春聲（中山大學），〈明清之際社會動亂與潮洲地方社會的軍事化〉
關漢華（華南師範大學），〈屈大均與史學〉
冼劍民（暨南大學），〈屈大均對嶺南文化的貢獻〉
彭世獎（華南農業大學），〈十七世紀廣東養魚技術的發展〉
Marion Diamond（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十九世紀澳洲與中國貿易〉
趙立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明清之際廣東十字門的海外貿易〉
周 湘（中山大學），〈清代中期廣州海運毛皮貿易〉
黃國信（中山大學），〈「藩王時期」廣東的鹽商〉
黎志剛（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研究中心介紹〉
翁佳音（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助理），〈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情況介紹〉
蔡志祥、廖迪生、張兆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介紹〉
梁洪生、邵 鴻，〈江西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介紹〉
劉 森，〈汕頭大學海外華商經濟文化研究介紹〉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東南區學會第 36 屆年會

時間：1997 年 1 月 17 日 地點：美國喬治亞州 Savannah 市

- Andrew Scobell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China's Number One White Boy: W. H. Donald in Republican China"
Ann L. Lo (Tallahassee Community College), "Working Women in Ch'ing China: A Preliminary Study"
Lung-Kee Sun (University of Memphis), "The Politics of Hair in China"
Loren Fauchier (Queens College), "CCP Legitimacy and Its Impact on US-China Foreign Relations"
Gael Graham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The Natives are Western Tonight: American Rhetoric on Mimicry and Transgress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Leng Dong (汕頭大學), "The Study of Overseas Immigrants in the Hanjiang A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eng Liu (Duke University), "Literary Power through Political Power"
Chienping John Lee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Greater China: Myth and Reality"

Dorothea Martin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Qiu Jin: Dual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t and Feminist"

Changing Chinese Nationalism, 1700-2000 圓桌討論會

紐約大學主辦，於 1997 年 2 月 11、20、25 日假該校舉行，參加討論者有 Evelyn Rawski, Nicola di Cosmo, Zona Man-cheong, Jonathan Hay, Jonathan Spence, Ernest Young, Harry Harootunian, Ruth Rogaski, Ann Anagnost, 鄭培凱、周婉窈、James Peck 等學者。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第 49 屆年會(49th AAS Annual Meeting)

於今年 3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伊利諾州芝加哥市舉行。年會之中預定宣讀之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論文題目及摘要，請利用全球資訊網站台：<http://www.easc.indiana.edu/~aas/1997Abst/china/ctoc.htm> 查詢。

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由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主辦，於 3 月 21、22 日在中壢校區舉行。探討文史哲各領域的近代學術成就，將發表包括康有為、熊十力、章太炎等近代人物之論文十七篇。

Shanghai: Past and Present 研討會

由澳洲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亞洲商業史中心舉辦，於 1997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假該校舉行，分以下十個主題進行討論：(一)上海商業簡史，(二)商業檔案，(三)銀行，(四)百貨公司，(五)股票市場，(六)當代上海企業，(七)上海海外資本家，(八)貿易，(九)技術移轉，(十)商業文化。

外籍顧問與近代中國討論會

由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聯合主辦，預定今年 4 月 26 日在台北召開。

第七屆中國海洋發展史國際研討會

由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於 1997 年 5 月 1 日至 3 日在台北南港舉行，分「中國海洋貿易史及沿海地區對外交流史」、「中國海外移民史及華人社會」、「台灣開發史、台灣對外關係史及社會經濟發展史」三項主題，將有來自八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宣讀三十四篇論文。

Opium in East Asian History, 1930-1945 研討會

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和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合辦，預定今年 5 月 15 至 17 日在多倫多舉行。



學術演講

研究生生活的回顧——從梁啓超到現代化

張朋園*

一、引言

兩個多月前，陳所長三井先生對我說：西方國家的大學教授屆齡退休時，常會受邀發表一篇演講，師生共聚一堂，藉此機會聆聽前輩學者的治學心得。近年來國內各大學也逐漸倣效，舉辦這種退休演講會。他認為近代史研究所也能建立此一傳統，為每位退休同仁舉辦演講會，並希望從我開始。我很難拒絕陳所長的一番好意。近史所成立至今，已經四十二年，相繼已有好幾位前輩退休，但我們並沒有退休演講的制度。今天陳所長、黃福慶副所長及幾位組主任覺得應該建立這個制度，我衷心支持此一想法，雖然我很害怕發表什麼退休演講。然而制度是一定要建立的，早晚要這樣做，今天從我開始，我不能因為害怕而不面對現實，所以我接受了陳所長的好意。

退休演講最好是一個專題。最近幾年來，因為個人體力的衰退，我的研究已沒有從前那麼積極，研究成果也就少了。我的雲貴研究雖然尚未出書，但陸續發表的論文，大家都已得見，沒有重複的必要。年前完成的《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一九六二——一九七三）》也在討論會上向大家報告過了。所以，我實際上沒有什麼新東西。幾經思索，或許只有談談自己的研究生涯。報告這個題目，第一，不需要做太多的準備，第二，大致可以反映我們這一代做研究工作的特色，以及我們的研究工作的缺點和限制。就這樣，我靦腆登場獻醜。不過，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係於1996年12月30日在中研院近史所發表之退休演講。

我不想再拾起那「憂患的歲月」一類的題目來掃大家的興。¹我想檢討我們這一代的學術專業化是如何成長和變遷的，不過以我個人為例而已。今天我將「我的研究生活」分做三個階段來講，用「學習」二字作為架構。

二、從學徒開始：梁啓超和立憲派的研究

大家都知道我是本所創辦人郭廷以先生的學生，因為這一個師生的關係，我在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後，得有追隨郭先生的機會。²本所創辦於1955年，我於1961年入所任助理研究員。郭先生與我談研究題目時，我知道本所所有外交部的檔案，認為是研究外交史的好地方。但是郭先生不要我研究外交史，而要我研究中國的內政。我後來才知道我的師兄們大都以外交史為研究範圍，人才濟濟。就因為這樣，我進所之後，沒有如師兄們一樣都做外交檔案的整理工作，今天想起來，不免為自己錯過一個奠定史學訓練基礎的大好機會，而深感遺憾。³

進所時，我雖然已自研究所畢業，對於研究工作，卻還是一個門外漢。郭先生要我研究中國的內政，我根本不知從何下手。我與郭先生面對面坐著，他看我愣在那裡，知道我無言以對。他說：「滿清末年的立憲運動如何？」「立憲運動？」在大學時郭先生講授中國近代史課程，曾經講到這個題目，但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郭先生看我沒有反應，就接著說：「你先看看世界書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8)如何？」就這樣，我們的第一次談話結束了。

郭先生指導我們學做研究，好像父母親教孩子學爬學走；我們入所的時候，可能剛剛過了學爬的階段，郭先生牽著我們學走，一步一步的向前。這是我的研究入門情況。我們當年是在「師徒」制度下成長的。師傅

1 見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2月）。

2 我於1956年自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畢業，1957年春天考入師大國文研究所，當時是全台灣唯一的研究所。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推動博物館、圖書館、文字學人才訓練，委託師大國文研究所招生代辦，所以史地系畢業者可以報考。

3 郭先生原先非常重視外交史研究。他在福特五年計畫中強調此一工作，但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建議他加入內政研究一項，所以郭先生擴大了五年計畫的研究範圍。見拙著，《郭廷以、韋慕庭、費正清——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一九六二——一九七三）》（即將出版），第一章。

指導徒弟入門，天經地義，可以說沒有例外。做師傅的義務並不止於此。當我們的論文寫好之後，郭先生爲我們看論文，爲我們改論文，爲我們潤飾論文……徒弟當中並不是每一個人的天份都很高，更不是每一個人的文字工夫都通順可讀。我就是一個天份不高，文字訓練不足的人。他會非常有耐心逐字逐句的修改、潤飾我們的論文。一字千金的真意，就是郭先生那支生花妙筆。

梁啓超研究是我的入門起點。一個研究生能不能找到適合於自己的研究題目，關係他是否能夠進入學術界這一個天地。我追隨郭先生學習，在他的指導下，我踏進了學術圈子。郭先生要我讀丁文江編輯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這一部五、六十萬字的年譜，開啓了我的學術生涯。登堂入室，自此我能在學術圈中尋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我在其中磨鍊我自己，陶冶我自己，我從讀年譜進而讀《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報》、《國風報》……我因而強調梁啓超早年立志救國，熱血沸騰，也想做一個革命志士。我更強調他從 1903 年（光緒 29 年）轉變爲立憲派。梁任公這部年譜更打下了我進一步研究立憲派的基礎。這是我的學徒生涯，我在郭先生的指導與細心修改下，完成了三部著作，⁴ 成爲梁啓超研究的先驅者。

三、科際整合之一：學習社會學與政治學

我的研究生活的第二個階段是接受科際整合的訓練。此可分爲三方面來說，第一是學習社會學，第二是學習政治學，第三是學習經濟學。

1964 年我有機會（獲福特補助）到美國進修，在哥倫比亞大學選修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的中國近代史專題討論(Colloquium on Modern China)，他要選課的學生讀何炳棣的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明清社會史論》），和張仲禮的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兩本關於紳士階級的著作。大家都知道這是當時正流行的新著，張仲禮的書容易讀，他的用字簡單。何炳棣的書則引用了一些社會學的觀念。我沒有社會學的基礎，碰到幾個社會學的名詞不了解，我心裡就起了念頭，要讀社會學。

⁴ 《梁啓超與清季革命》(1964)、《立憲派與辛亥革命》(1969)、《梁啓超與民國政治》(1975)。

我於 1966 年春天轉到哈佛大學，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先生邀我去的。⁵頭一天，他邀我吃中飯，談了半個小時的話。他聽了我的學習情況，主動建議我去聽社會學的課程，簡直猜透了我的心事。⁶他要我去聽 Robert Bellah 的課。我好高騫遠，既聽 Bellah，也聽 Talcott Parsons。結果，後者我根本無法跟上。我發憤從頭學起，讀一本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的教科書，這樣我才真正走進了社會學的大門。

社會學與政治學是相通的，我在讀社會學的時候就對政治學發生了興趣；1965 年至 1969 年研究立憲派時，尤其感到政治學的重要性。我的老朋友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對我的幫助更是使我終生不忘，今天我書架上的政治學書籍，幾乎有一半是他送給我的。

我在政治社會學上對幾個觀念下過一些工夫，例如菁英分子(elitism)、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政黨政治(political parties)等，我讀了一些當時流行的著作。但我只是吸收觀念性的知識，對於原典則少接觸。

四、科際整合之二：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1960 年代是我吸收科際知識狂熱的時期，這一時期美國的社會科學對第三世界研究也最爲熱門。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年輕歷史學者不會忽視這一個研究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殖民主義的時代過去了。西方國家與共產主義集團競爭影響第三世界，一個說民主自由最好，一個說共產主義最好。西方學者宣傳民主自由，避免自我中心意識的流露，使用「現代化」代替「西化」。現代化的著作極多，社會學談現代化，政治學談現代化，經濟學談現代化……琳琅滿目，我們來自第三世界的年輕學者，無不讀這些風行的名著，例如：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1960);

G. Almond & S. Verba, *The Civic Culture*(1963);

G. Almond & G. Powell, *Comparative Politics*(1966);

5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是學生身分，到了哈佛我就變成了訪問學者，我的第一本書《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已經出版。

6 費正清自 1950 年代末期就倡導科際整合，主張歷史學家用社會科學輔佐歷史研究。

David E.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1965);

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1966);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

S. N. Eisenstadt,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1966).

大有目不暇給之勢。這些書有的已成經典之作，有的已經過時了。而我多是在 1960 年代後期閱讀的。

回到台北後，發現台北的學術界也受「現代化」一詞的影響，成了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有的學者正著手準備要組織以「現代化」為主題的研究，社會科學整合與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氣氛也很濃厚。1972 年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幾位社會科學方面的先進學者正發起一個「中國現代化研究」，邀請近二十位學者參加，有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等，我也被拉了進去成為其中的一員。我在這個討論會中獲益不少，有一些讀物都是與會學者介紹給我的。

我們學歷史的也組成了「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我們隨著時代的潮流轉進。最初我們有好幾位同事對現代化這一觀念很感興趣，在我的記憶中，最先聚在一起談這一個問題的有呂實強、李恩涵、王樹槐、李國祁、張玉法諸先生和我。是誰先提起「現代化」三字，我已不記得了，但以區域為研究的想法，似是呂實強先生的主張。俗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我們幾經商量，就決定了。

組成這一個計畫的理由，除了時尚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第一是兩個福特五年計畫在 1972 年結束，補助斷了；當時國科會推動集體研究計畫，我們與之配合，一拍即合；第二，我們這一批少壯派，在所內有志難伸，唯有做集體計畫，展示一下我們的實力，大概就沒有人敢欺壓我們。

我在這一個計畫中擔任湖南地區研究和理論架構方面的問題，逼著我去讀許多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這是我學習生涯中最具挑戰性的一個階段。得到許多進步，也遭遇到許多挫折。

我們的「現代化區域研究」在 1980 年代前後相繼發表，在美國沒有得到好評是一定的，在大陸中國受到推崇則出了我們的意料。美國學界在 1960 年代後期就對「現代化」一詞起了厭惡感，⁷他們也不喜歡「區域研究」那麼大的題目，就有如我們不滿意他們的研究，細小到見樹不見林。

⁷ 有些美國人說「現代化」是包了糖衣的帝國主義。

這個研究計畫的架構，是認為中國的區域受外力衝擊，沿海、沿江地區較早，內陸地區較晚。我們分成兩個階段來研究，先做沿海、沿江地區，後做內陸地區。⁸我們的做法，可說確實掌握了中國近代變遷的順序。

G. William Skinner 自人類學的觀點將中國分為九個地區，看上去頗為新穎，但實際上不能採為我們的研究架構，除非有九個人宣誓終身以某一區域研究為職志，否則，三、五年或八年十年絕不可能完成 Skinner 氏的九大區域研究。而我們分為沿海、沿江及內陸地區，一共十七個區域，前後十七個人投入，照理應該可以如期完成這一個總計八年的研究計畫。今天我們已有七本書發表了，還差十本。還沒有出版的十本書顯然有的已難以為繼。趙中孚先生已經過世了，東北這個地區的研究，已是絕望。我想將來還會有三、四本出來，超過半數是可以肯定的。

目前這七本書在大陸上甚受歡迎，那天我們可以邀請這七位學者聚會在一起，談談他們自己的書在大陸上受歡迎的情形。

我的湖南這本書，自己非常不滿意。1983年出版時，我們與大陸上學術界還沒有往來，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發表該書，今天看來，實在是太大膽了。但湖南的學術界說寫法新穎，為前所未有的，使我受寵若驚，感到臉紅。我的雲貴研究尚未成書，但已有論文六、七篇發表，有幾篇已在大陸上的雜誌轉載，北京社科院社會所的《社會學研究》，去年轉載我那篇「瘴癘」研究，貴州有好幾位學者看見了，寫信來說，我的研究非常深入，使我感到高興。

我們這個計畫，參加的人多少有些自我訓練的意思。題目太大是我們的失策，但參加過區域計畫的人，可以大膽的說，近代史上的大小問題，拿到他的面前，絕不會有丈二金剛的感覺。

五、成就感與挫折感

以上的報告，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出生在一個寒苦地區的貧窮人家，又成長於抗戰時期，教育斷斷續續，沒有像在座大多數學者一樣接受過完整的教育。因此，我只有以「活到老學到老」的態度來彌補我在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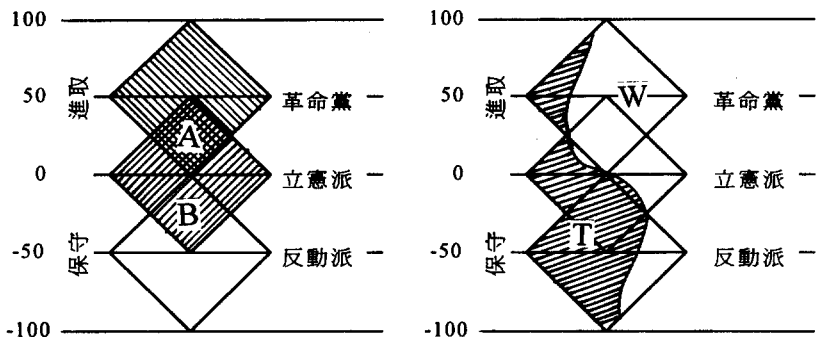
⁸ 分為兩期研究，前期(1973-1977)十人，研究沿海沿江地區；後期(1984-1988)七人，研究內陸地區。

上的缺失。研究梁啓超加深了我的這一個信念。梁氏說他「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⁹這句話也就成了我的座右銘。我一生向不敢與人辯論學問，梁之博學無人不知，尚且如此自謙，朋園何能望其項背。僥倖進了研究院，時時警惕自己，不可強出風頭，否則西洋鏡隨時會被拆穿。

我有心向學，當然希望能有所成。社會學家 David C. McClelland，說一個現代人，要有成就感(need for achievement)，我也以 McClelland 的說法為座右銘。我的《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凸顯 1903 年是梁氏進取與保守的轉折點。我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糾正前人忽視此一政治團體的正面意義，中外書評一致稱道我的觀點和詮釋，我當然感到安慰，得到了一種成就感。¹⁰

閱讀社會學和政治學及現代化著作，一度使我如癡如狂。我在撰寫〈辛亥革命時期的進取與保守〉一文時，我用三個菱型表示革命黨、立憲派和頑固派的關係，頗受社會學的影響。（圖一）

圖一 革命黨與立憲派關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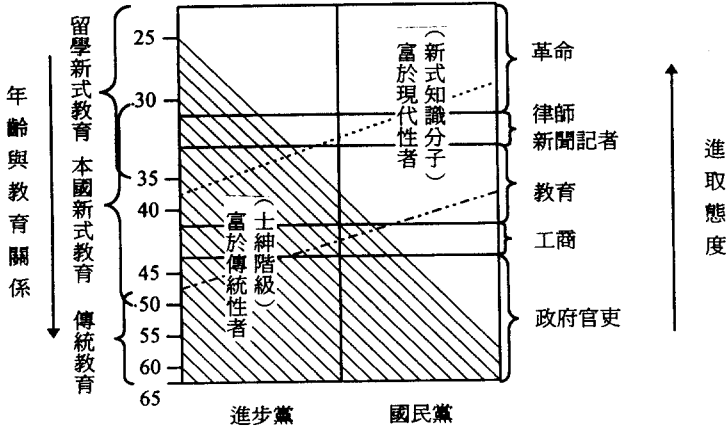


9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 59 年 3 月台 5 版），頁 6。

10 參看台大現任歷史系主任古偉瀛教授的研究〈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之幾種用於研究傳記、歷史的方法及其於中國材料底初步運用〉，《食貨月刊》，復刊卷 1 期 12（民國 61 年 3 月），頁 44-56。他從梁啓超的函件看梁氏心理和情緒的起伏，確認 1903 年為梁氏心理的轉折點；拙著“The Constitutionalists”一文（載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1968），是最早肯定立憲派的論著，在此之前，中美學界均指立憲派保守無知，為依附清廷的政客。

我的〈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創造一個兩黨菁英背景結構圖，用現代性與傳統性兩變數比較國民黨與進步黨的進取與保守背景。(圖二)

圖二 民初政治優異份子結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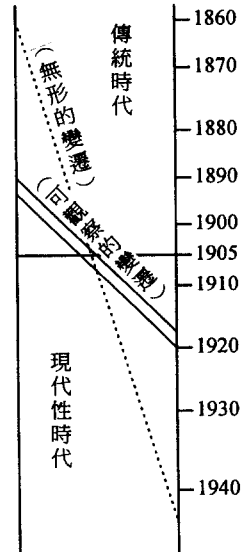


日後此一觀念繼續發展，得出近代中國現代性的發展與傳統性的萎縮結構關係，這是我學習社會科學與研究中國現代化所得的成績。(圖三)

圖三 傳統與現代的過度與結合

曾經有一位同行以好奇的眼光投向這三個圖型，他說：「你可能會改行走向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其實我所知道的社會科學理論非常有限，但這兩個圖型都是在 1970 年前後產生的，可見我當時對社會科學與科際整合的興趣。日後由於我的本行仍為歷史，我閱讀社會科學方面的讀物便漸漸減少了。

我有一些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知識，研究社會變遷和政治發展都可以應付，最難的是經濟學一門。大學時代我曾選修經濟學，二十年下來，舊學已不管用，不得不從頭學起。我曾下工夫讀 Paul Samuelson 的經濟學，我曾經坐進台大經濟學系的教



室，聽費景漢的經濟發展論。結果，我在第二屆國際經濟史會議中提一篇論文，竟被一位年輕學者在大會中指責我「根本不通」。遭此奇恥大辱，我方感到我的轉折入現代化研究是一個大錯誤。

奉勸年輕一代的學者，不要輕易轉行，沒有把握的轉行，必定要吃苦果。

我在經濟史研究方面的困難已無可克服，但我希望我的學生中有人研究經濟史，具備研究的能力，獲得成就。1976-1980年我在師大歷史研究所擔任行政工作，曾邀請經濟史名家侯繼明、王業鍵、趙岡、劉翠溶等幾位名學者講授經濟史課程，師資是第一流的。今天經濟史這一學門中，有不少學者的基礎是在師大奠定的，我因此而感到安慰，稍稍撫平了我的挫折感。

諸位不要聽了上面的幾句話就以爲我不再搞經濟史了。不會的。目前我仍爲雲貴的貧窮問題而苦思其擺脫之道。人不怕挫折，只怕在挫折之後投降，或放棄了自己。只要繼續努力，最後仍可有一得之愚。

我們以「現代化」爲主題研究中國近代史，至今二十餘年，有許多不期而遇的事發生，有的令人高興，有的令人生氣。先說高興的：

(1)1974年我們做完了第一年的研究：傳統敘述，召開一個傳統經濟史討論會。我們十個人各人講講區域性的發展差異，本院經濟所于宗先先生有意發展經濟史研究，也有意與我們合作(經濟學家有理論而不易深入史料，歷史學家則相反，易於史料而理論不行)，兩所在一起開會，當時侯繼明、費景漢等學者都來與會，我們以便當招待與會學者，熱鬧了一整天，以後經濟所先後舉辦兩次經濟史討論會，兩所合作甚爲愉快。開啓了兩個學門合作的機運。

(2)以後我們繼續有小型和中大型的討論會，大家熱烈討論中國的現代化，頗受外界注意，媒體電視加以報導，李國祁、張玉法和我都曾經上電視講現代化，當然也是件愉快的事。

(3)但是早先現代化這一個名詞台灣當局並不喜歡，尤其我們鼓吹政治現代化必須實行民主，國會必須改選。我們的言論頗不爲當局容納。1974年我在耕莘文教院(羅斯福路)講「中國現代化所遭遇的困難」，有六、七百人聽講，盛況空前，但該文在《幼獅月刊》刊出後，主編竟因此而被免職，這是一個意外。

(4)由於我在外面講現代化，南部的學生也注意到了，成功大學 Sigma

學社要請我去演講，布告都貼出來了，我正準備南下，突然接 Sigma 學社電話，說演講已經取消了，因為訓導處說張某人不宜在該校演講。

六、結 論

我的話講完了，我的結論是：

(1)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大多數是在戰亂中長大的。我們這一代大多數都有一些軍旅的經歷。我們從十七、八歲就投入軍中，要以自己的生命去報國。打完了仗，我們的求學年齡已經過去了，我二十五歲才進大學一年級，從頭學起，時間上已晚了六、七年，學歷之不完整是必然的。

(2)有心向學，能得名師指導固然幸運，否則就只有自修了。自修的結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學問是殘缺不整的。

(3)自己的學問既不成熟，卻又要為人師表，只讀了「人之初」，卻要教人「性本善」，我雖然在大學中教過不少年頭的書，教育部也給我一張合格教授的證書，但自己的缺點心中明白，誤人子弟，在所不免。今天這個講話，一是反映我們這個年齡的時代，一是借此機會自我懺悔。唯值得自己安慰的，是一顆努力向前的心，直到今天老了還是沒有改變。

(4)今天比我年輕的同事大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我羨慕他們，同時也為新時代在他們推動之下有進展而感到高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31)

許丙·許伯埏回想錄

許雪姬監修 許伯埏著 蔡啓恆、川島真日本語編集 傅奕銘中文要約
407 頁 平裝 400 元，精裝 450 元

本書分為兩部分，分別為戰前、戰後活躍於台灣財政界、曾任日本敕選貴族院議員許丙(1881-1963)的口述歷史與其長子許伯埏(1917-1991)之回憶錄。許丙原以板橋林家之「家長」身份，襄助林家的事業經營，最後不僅凌駕其勢，且和日本財政界、滿洲、中國大陸的關係甚為密切，於日本之對台政策也曾發生相當的影響力。藉由本書，我們得以了解台灣在戰時體制下的一些重要史實，以及台灣士紳和日本財政界的關係，進而避免完全以民族主義史觀對當時的對日協力者作過於苛酷的評價。至於戰後部份，述說台灣士紳和國民政府決策之間的關係，讀來興味盎然，且具有史料意義及參考價值。

對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William C. Kirby*

陳時偉 節譯**

尊敬的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來賓：

今天，我很榮幸能夠在北京與各位座談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問題，在座的諸位都是這一研究領域內的專家和學者，作為一名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座談不僅使你們感興趣，而且也使我有收穫。

對在座的諸位來說，能夠引起你們興趣的題目或許並不太多，但是有一個題目是我想在這裡與你們共同探討的，那就是關於西方學術界近年來對於近代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就我個人來講，這也是我長期以來研究中華民國史的過程中最感興趣的題目之一。

今天我報告的題目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一）以中美關係史為例，談談西方學術界對中外關係史研究的總體狀況；（二）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出發，談談我對這一領域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和新的設想；（三）結合世界各國檔案管理的現狀，談談檔案利用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西方近代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概況

眾所周知，雖然迄今為止，西方學術界對外交史的研究碩果累累，然而無論在人們提到宏觀的中外關係史，還是相對微觀的中美關係史時，都在概念上把它們廣泛的區別稱之為「國際關係史」。

* 柯偉林（中文名），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本文係於1996年10月29日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之演講。

**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系博士候選人

（一）對中外關係史的研究

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領域中，西方學術界對國家外交政策、國與國之間的民間關係，以及政府與政府之間關係的研究，長期以來並未清楚界定。雖然研究外交關係的「現實主義學派」試圖將國家視為一個以追求長遠利益為目標、以強調外交第一為組織原則的理性行為執行者，但是該學派對中國研究的影響微乎其微，甚至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例如，在鴉片戰爭史的研究中，學者們從未將這場戰爭看成一場英國政府和大清王朝之間純粹意義上的權力政治較量，而是單方面地從引發這場戰爭的一些顯而易見的外部因素中尋求解答。事實上這種研究是不全面的，因為它忽略了在那場戰爭中唱主角的「非國家行為者」（借用時下流行的術語）——那些臭名昭著的鴉片販子，以及他們的中國販毒網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對國家外交政策帶來的衝擊。

許多研究近代中外關係史的著名學者（例如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經把國家外交政策看作他們研究題目的一個方面，但他們在自己的研究中大都避免使用正式的外交關係理論。而中國與其它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則恰恰相反，他們在研究外交關係時奉行一個極有影響的理論模式：即馬克思、列寧、以及斯大林的傳統模式。該模式強調外交關係研究中的經濟和階級層面，並將其運用於社會、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項研究中。在中國，如同各位所知，從列寧時代繼承下來的「帝國主義」理論，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曾經居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導地位。直到最近幾年，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深入，理論上的禁區才逐漸突破，各種有關中外關係的互動理論也開始出現。

在西方，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相對立的是所謂「反唯物主義」的史學方法。這一方法在過去的二十年內流行不衰，其特點是通過研究國家間的相互認同，將外交關係置於一種廣泛的國際交往的框架之中，並且強調國家外交政策中所謂的文化建構。隨著這一方法的流行和普及，從中衍生出來的則是一系列新名詞的大量出現和廣泛運用，如「映像」、「認知」、「信仰系統」、「認同圖識」等等；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外交史學家對心理學家的趨向認同。伴隨這一現象出現的是一些十分有趣並且重要的理論，如人們在研究民族國家行為時賴以觀察和了解其信息資源的「透鏡理論」等等。

在美國，入江昭(Akira Iriye)先生是綜合幾種國際關係史方法進行總

體研究的先驅，他的方法主要見之於他有關十九和二十世紀中日關係史的研究論文集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1992)。在這一論文中，入江先生按照年代和主題將這一時期的中日關係劃分為「權力」、「文化」、和「經濟」三個基本階段，並認為「文化」是影響民國時期中日關係的主導因素。他的觀點意在說明中日關係史的研究中，如果忽略對中日雙方之間認識和文化傳播的了解，那麼對八年殘酷的中日戰爭中達於頂點的政治和軍事關係的理解，也將是不清楚的。勿庸置疑，入江先生的觀點是很容易引起爭議的，但只有當我們把中日關係當作全球戰略的一部份，並將其放在入江先生豐富嚴謹的整體敘述框架中進行考察時，我們才有可能把「九一八事變」和「南京大屠殺」（這樣一些高度軍事政治化的行爲）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來重新思考。

除了入江先生以外，其他西方學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外關係史研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孫有利在《中國與太平洋戰爭的起源》(Youli Sun,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41*, 1993)一書中對國民政府「綏靖主義」外交的再評價； Parks M. Coble 在《面對日本》(*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1991)一書中對三十年代中國「公眾輿論」的研究； Donald A. Jordan 在《抵制日貨與日本炸彈》(*Chinese Boycotts versus Japanese Bombs: The Failure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1931-32*, 1991)一書中對「九一八事變」時期中國抵制日貨運動的重新評估； John W. Garver 在《中蘇關係》(*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1988)一書中對蔣介石個人形象和外交手腕的精彩描述；以及 Andrew Forbes, Odd Arne Westad, Nicholas Clifford 等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對中外關係史所進行的研究等等。

雖然上述學者對中外關係史研究貢獻卓著，然而他們中間卻很少有人將自己稱之為純粹的外交史學家。這也許是因為國際關係史研究與外交史的研究本來就密不可分，或者說對外關係實踐的研究幾乎全部來自國際關係史領域。這一現象導致了在西方二十世紀中國外交史的研究領域中迄今沒有所謂標準讀物。甚至於在對十九世紀外交史的研究中，馬士(H. B. Morse)的英文著作《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10)依然居於無人超越的地位。

與其它領域相比較，西方對中國外交史的研究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

的，而這一狀況的存在還是由於一個令人遺憾的歷史原因，即民國時代的中國外交始終處於一種令人無法羨慕的積弱地位。1912年的民國政府所繼承的不是一個「歷史的中國」，而是一個多種民族、多元文化構成的「大清國」，它的統治區域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其它區域。可以說，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的疆域像清王朝這麼大。二十世紀的頭十年充滿了這一王朝即將瓦解的前兆。然而一個令人驚異的事實是，這一廣闊的疆域不僅在動盪不安的民國時期被重新定義為中國的神聖領土，而且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今天，它的疆界始終得到外交保護，並沿襲著自滿清以來除外蒙古以外的所有領土。清王朝覆滅了，但是「帝國」的影響卻在延續。更準確地來說，是這一帝國的版圖變成了中國民族國家遼闊疆域的基礎。這或許正是民國外交在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裡所完成的最積極、最重要的建樹，然而學術界對這一建樹的評價卻遠遠不能令人滿意。

我們可以用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的外交活動為例，來進行一些更具體、更深入的觀察。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這一時期的中國外交都代表著中國首次進入近代國際政治聯盟。隨著研究這一聯盟的各種中外歷史文獻的開放，人們對中國政府成功地與德、蘇、美三大強權結盟以抵抗第四個強權國家日本的活動看得越來越清楚。可以肯定地說，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在其國際政治經濟政策指導下所獲取的外交成就是巨大的，這些成就的範圍不僅包括中國躋身四強，登上國際政治舞台，而且包括中國獲得關稅自主權、取消治外法權、以及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建立首例中外經濟合資企業的一系列努力。然而，所有這些成就在西方史學著作中都未得到應有的評價。

（二）對中美關係史的研究

與中外關係相比較，西方研究中美關係史的著作更強調對外關係而非對外政策的研究。近年來發表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上層政治以外的活動為主題。下面我將分別加以介紹。

美國在華傳教士的挑戰性活動仍然是中美關係史研究的中心議題，儘管近年來人們在撰寫這一歷史時更多地採用了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取向。數年以前，堪薩斯大學的 Daniel Bays 教授成立了「在華基督教史研究計畫」，該計畫以基督教新教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為目標，探索西方宗教與東方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最近，有關基督教青年會在華歷史的

著作揭示了傳教士世俗化工作的另一面。西方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關於「科技傳教士」的研究著作。如果「科技傳教士」可以專門用於那些來華的美國農業專家、軍事顧問、以及僱傭兵的話，我們是否也可以考慮使用「軍事傳教士」一類委婉的說法呢？

西方在華的記者和學者構成了另一類（有時是重疊的）文化互動的載體，他們經常成爲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對象：像史沫特萊(Anges Smedley)、埃德加·斯諾(Edga Snow)、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我的老師費正清，以及費正清的老師馬士的傳記等，都屬於此類。對這些人物的研究加深了我們對中外關係中另一種溝通渠道——即所謂非官方外交、或「軟外交」的理解。

對文化交流的興趣，也促使許多美國學者醉心於中國近代科技教育史的研究。從現在已經發表的專題著作來看，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概括民國時期科學教育的各個方面，從生物學、植物學、遺傳學、化學、農學、醫學、到社會學、經濟學等。在研究各個專業學科發展的同時，對民國時期政府與中外科技合作的研究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一些正在撰寫中的博士論文，已經將其敏銳的觀點集中於戰後中美科技合作開發長江三峽、中央研究院與國際文化交流這樣一些政府層面的科技活動。而這些新興科技體制的建立和在近代中國的發展，無不受到西方科技文化的影響和歸國留學生的推動。

由於大量新史料的湧現，就連過去相對冷淡的有關四十年代中美關係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轉機。國共雙方有關這一時期史料的公佈，從數量上豐富了長期以來對外開放的美國史料。迄今爲止，最大的突破可能來自於對 1949 年之前中國共產黨外部活動的研究。例如，發表於中共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雜誌上的若干史料，已經允許 Michael Hunt 在很大的程度上重新修訂我們對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外交政策的理解。

在有關內戰與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新著作在 Steven I. Levine 的研究基礎上有所發展，但仍然無法取代他對國共兩黨遼瀋會戰的精彩研究。Steven 的研究雖然並非依靠最新檔案史料，但他確實掌控了大量旁人無法企及的國共雙方、蘇聯、美國等多方面的材料，從而將這場戰爭的研究提高到地區、國家、和國際的層面。他的著作也是少數跨越不同觀點，很少引起爭議的著作之一。他認爲遼瀋戰役對中國內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成敗有可能導致不同的結局。這一觀點國共雙方的歷史研究以

及國際關係史的研究均做出了重要貢獻。Steven 的著作提醒我們注意一個長期以來在西方被忽視的領域——即對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研究。

對未來研究前景的展望

下面談談對中美關係研究的展望。如果說上述研究還存在什麼缺陷，或者說將來對中美關係的研究還有什麼需要進一步提高的話，那就是：對一個研究中美關係史的學者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具備中國史、美國史、和國際關係史三方面的知識素養。否則，將是難以勝任的。以研究四十年代的新成果為例，這些成果已經逐漸突破雙邊以及中美關係的範疇，並且擴大到與之相關、充滿活力的整個國際關係史的研究領域。這一領域既是多層面的，又是以多國檔案為基礎的。隨著它被學者們提上中國史研究的議事日程而逐漸成型。瞻望未來，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幾個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有可能對中外關係史發生影響的新趨勢。

（一）跨越 1949 年斷代的變化與延續性

首先，一個最明顯的學術動態是以前用來劃分二十世紀中國史的一些政治「斷代」標準逐漸失去其影響力。如同人們用 1789 年做為法國史與歐洲史的分界點一樣，1949 年曾經長期以來被視為二十世紀中國史的重大分期標誌。

在美國，研究中國的不同學科對這一分期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1949 年是區分歷史科學和被稱之為「更困難」的社會科學之間的分界線。研究 1949 年以後「現代」中國的社會科學家與研究 1949 年以前的歷史學家相比，他們在所師從的導師和所接受的理論訓練方面都有所不同；而那些研究台灣的學者則屬於另一個自成一體的學術範疇。

而今天，分隔 1949 的歷史標記正在消失。學者們已經注意到中國最近十年的「改革開放」如何喚起眾多 1949 年之前存在模式的自然回歸，並且注意到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即 1949 年之後的國民政府如何在台灣復甦並取得成功的經濟發展。因此，人們開始重新審慎地評估 1949 年之前國民政府的本質和作為，並認為，如果將該政府與兩次大戰期間的歐洲「合作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試驗）和戰後東亞發展中國家的性質相比較的話，它更像是後者的雛型而並非前者的榜樣。最近，Juila Strauss 和我

在我們各自研究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著作中，都描寫了這一國家機構如何採取不同的體制策略，努力創造一個既有實權、又有專業化水平、並試圖獨立於各種政治（或政黨）勢力之外、並獲得一定成功的政府組織機構形象。我們希望通過這一體制的研究，為將來比較研究國共兩個政權在不同時期的國家政治體制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還有一些學者嘗試利用超越 1949 年的觀點來研究具體的社會集團和社會體制。1994 年哈佛大學召開了一次以 1949 政治變革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與會學者共同探討了這場變革給中國歷史帶來的變化和延續性，並進一步分析 1949 年對海峽兩岸的政治分立、經濟建設和文化發展到底在何種程度上、多長時期內、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擊和影響？

取消 1949 年分期標準的研究趨勢對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到底具有什麼樣的內在含義呢？我認為它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像 Michael Hunt 所嘗試的那樣，重新思考 1949 年之前中國共產黨和 1950 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部關係。在這一關係中，哪些是中國人民所扮演的角色，哪些是中國共產黨所承擔的具體責任？其次，任何研究「中國國民黨」對外關係的嘗試都不應忽略其遷台以後的歷史，而應該把它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史的整體部份來加以慎重考慮。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歷史學家對美國與台灣關係的研究與其题目的重要性和史料的可行性從來未成正比（對 1958 年台海危機的研究可能是一個例外），但是美台雙方自 1950 年至 1979 年之間的合作關係卻是極其成功的，雙方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事務方面，其合作的成功性都超過了二次大戰時期作為盟國那段不愉快的經歷。它或許可以成為本世紀美國與台灣政府之間互相合作的最佳記錄。Nancy B. Tucker 的新著對這一段關係首次進行了認真的歷史考察。

（二）中外關係研究的內部新領域

西方學者們在研究外部中外關係的同時，也在大膽地探索中外關係中的一些內部現象。上海，這一曾經充滿國際色彩的城市，已經自然成為新作品關注的對象。僅以對這個大都會本身的研究而言，就有 Elizabeth Perry 關於上海勞工史的研究和 Frederic Wakeman 關於上海警察的研究。這些研究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都市下層社會的黑暗生活以及警察與他們的對手之間的鬥爭。其它還有 Emily Honig 對移民文化的研究，Jeffrey Wasserstrom 對學生文化的研究，葉文心對銀行文化的研究等等，所有上

述研究都建立在近幾年剛剛解凍的檔案基礎上。

然而眾多城市研究的著作中，對國際城市社會史的研究仍然是一個冷門。Wakeman 和葉文心曾經對上海僑民有所描寫，在他們的筆下，那些僑居上海的華人銀行家、企業家、工人、學生、記者、歹徒和妓女，已經逐漸將自己認同為「上海人」。但是 Wakeman 和葉文心的研究尚未觸及上海社會的另一方面，即作為國際僑民匯集地的上海。最近，Nicholas Clifford 在其研究上海的著作中，已經對這些來自各地的商人、投機者、難民的國際僑民形象有所描述。可以確定不移地說，上海與外部世界間的互動關係，正是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有待彌補的一章。

近代中國對外商業史也存在著很大的開發餘地，而且這一領域很有可能為研究中外經濟合作與競爭的最好突破口。對學者們來說，中美通商史研究的相對薄弱似乎是一種不幸，而造成這一不幸的原因不僅在於其研究成果與 1949 年以前美國私營企業在華商業活動的規模不成正比，還因為在民國檔案廣為開放的今天，大量的國、私營公司（包括外國公司）遺留下來的經濟檔案尚未得到充分的開發利用。這些檔案除了見之於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豐富收藏外，還應包括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藏的企業史檔案。（參考 Cochran 的著作）

法制史的研究無疑是中美關係史研究中另一個有待開發的新領域。雖然中國的民法深受歐洲大陸法系的影響，但是英美法系對中國商法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中美之間存在於治外法權和後治外法權時期的互動關係，是中美關係史上一個不斷發展並且極其重要的方面。遺憾的是這一領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塊未被開發的處女地。

如何利用檔案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史

最後我想簡單地談一下有關檔案利用的情況。在歷史研究中，隨著新檔案史料的公佈，舊的結論總要被新的觀點周期性地取代。自從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史研究的情況尤其如此。目前，海峽兩岸在民國檔案的公開程度和專業化的管理方面都有突破性的進展，但是對於研究二十世紀中外關係史的歷史學家來說，應該怎樣才能使歷史檔案的保存和使用達到最佳狀態呢？

中國歷史——無論是外交史還是其它方面——並沒有終止於 1949

年，儘管大部分中國檔案將這一年視為歷史研究的截止年限。因此，對1949年以後歷史研究的學術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史料的品質，而史料的品質反過來又需要進一步依賴檔案的開放程度。這不僅僅是一個對西方學者來說需要考慮、或者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它同樣是一個應該引起海峽兩岸歷史學家共同注意的問題。儘管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制定了檔案法，台灣也有了初步的試行法案，但是我仍然擔心國際檔案開放中的不均衡性會對未來的學術研究造成阻礙。舉例來說，美國外交檔案已經大部分（即使還有缺陷）開放到1965年；英國外交部有關中國（或中文）的檔案已解密至1966年；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其黨的高層檔案已經編目開放到1989年（這一情況發生於該政府突然垮台時）；1991年之前前蘇聯的國家檔案正在循序逐漸地開放，雖然速度緩慢，畢竟已在開放之中。但是在中國，大量涉及1949年以後歷史的中文檔案卻因為各種各樣的實際原因而仍未對歷史學者開放。從最近發表的一部份有關中共黨史和五、六十年代中華人共和國外交政策的文獻來看，雖然這些史料發表時已經過嚴格的控制和篩選，它們仍然對西方歷史學者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總之，用句俏皮話來說：今天「帝國主義國家」的檔案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檔案都已經敞開了大門歡迎歷史學家，而只有1949年之後中國的檔案還在密封的倉庫裡「孤獨地」保持著沉默。不過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改革開放的深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終究會敞開它的檔案大門。一旦檔案開放，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將會產生新的變化，我和在座的各位也將會一起去迎接另一個歷史研究的春天！

我的報告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口述歷史》第八期

民國85年12月出版 238頁 定價200元

本期《口述歷史》收訪問稿五篇。張維翰先生主要敘述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其在地方與中央從政經歷。劉士毅先生主要敘述清末以來之軍旅生涯。吳開先先生訪問紀錄採對談型式，生動描述抗戰期間兩度赴滬從事敵後工作。吳思珩先生所述，主要為三十四年昆明學潮及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邱清泉第五軍由盛而衰之經過。各篇均具史料價值。徐康良先生之回憶錄固為徐先生一生經歷之敘述，若就民國空軍之建軍發展史而論，尤為彌足珍貴之史料。



學人簡介

從梁啓超、立憲運動到現代化 ——張朋園先生的學術歷程與成就

劉紀曜*

國際知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張朋園先生，已於今(1997)年2月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先生自民國50年(1961)進入近史所從事研究，匆匆已過三十五個春秋，其學術成就主要表現在四本享譽學界的著作：《梁啓超與清季革命》(1964)、《立憲派與辛亥革命》(1969)、《梁啓超與民國政治》(1978)與《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一八六〇——一九一六》(1983)。

先生回顧其研究生涯，最感激的是業師郭廷以先生，從引進近史所，到研究範圍與主題的確立，皆得力於郭廷以先生，因而自稱其學術研究為「師徒制」的，這也正是所謂「名師出高徒」吧。起初，郭廷以先生指定的研究主題是清末的立憲運動，並建議從立憲運動的領導人物梁啓超下手，就因此一機緣，使先生成為研究梁啓超的名家。

民國53年(1964)，先生的第一本著作《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出版。蕭公權先生在序言中稱讚此書「第一次把任公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間有關政治言論的背景、動機及影響作有系統的敘述和分析。這是近代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貢獻。」此書的主要特色有二：一是用很詳實的資料，依序說明了梁啓超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演變過程，彰顯了梁啓超從變法維新到共和革命，再到(開明專制)君主立憲的思想發展過程及其意義，尤其是確認了1903年在梁啓超思想發展轉折上的重要性。二是強調肯定梁啓超對清季革命的影響與貢獻，1903年之前，梁啓超固然積極倡民權、講自由、談破壞、行革命，對革命思想的傳播與革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命形勢的形成有很大的貢獻；就是 1903 年思想轉變之後，雖然與革命黨有激烈的論戰，但就其實際效果而言，與革命黨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故稱此時期的梁啟超「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實」。

此二特色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台灣史學界以革命為正統的論述觀點，另一方面也擴大同時修正了這個論述觀點。在此之前，一般歷史學家，尤其是革命黨或國民黨的史學家往往視梁啟超為反革命反國民黨的「反動」分子，對革命大業只有阻礙、破壞，不會——大概也不想——肯定梁啟超對革命的貢獻。先生此書則以詳實的資料有系統地說明了梁啟超對革命運動的貢獻，因此擴大了有關革命運動的論述觀點——革命運動的歷史不是也不會是革命黨所壟斷的歷史；同時也修正了過去有關革命運動的歷史論述，彰顯了非革命黨甚至反革命分子如梁啟超對革命的影響與貢獻。

此二特色持續表現在先生的第二本著作：《立憲派與辛亥革命》(1969)。此書詳細討論了中國史上第一次的人民選舉——清末 1909 年的各省諮議局議員選舉。發現此次選舉有幾個重要現象：第一，各省選民總數佔人口總數平均只有 0.24%，人民參政的程度有限，大體上仍然突顯出傳統的精英政治；第二，統計分析各省諮議局議員的出身背景，88.9%是有科舉功名出身的士紳階層，這也如實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第三，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固然是順應開明士紳的立憲與地方自治的要求而設，但中國紳民的政治知識普遍不足，不知選舉為何物，反應極為冷淡，亦多有賄選舞弊之事，以致「名為民選實自官派」，然而，無論如何，這總是中國第一次的民主實驗與經驗。

書中進一步從諮議局議員的出身背景，分析其心理狀態與性格，可謂「既保守又進取，在保守中求進取，在進取中求保守」。中國的士紳階層本就以名教正統自居，深具保守性；而且中國士紳的權勢與利益來自統治當局與現實的統治體制，故亦使其傾向保守。然而因為時代的改變，清末士紳，尤其是年輕的士紳，多有受過新式教育者，更不乏留學日本者，因此頗受新思潮之影響，較了然於世界新局勢，故亦具有相當程度的進取性。由諮議局與資政院議員所組成的立憲派人士，這種既保守又進取、既進取又保守的矛盾性格，就充分表現在他們從事立憲運動與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中。

諮議局的成立，給立憲派人士提供一個體制內的合法而且具有民意基礎的參政機構，乃積極參與地方政務。又因民主憲政理念之建立，諮議局、

資政院議員皆以人民的代表及政治權威的來源自居，與地方督撫與清廷時有衝突。此時，舊有的官紳關係已發生根本的改變，清廷不察，一味採取高姿態，要求立憲派人士唯命是從，只有讓立憲派人士越來越失望、不滿，終至背離而去。先生此書即詳細論述了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前後三次的國會請願運動，以及資政院的彈劾軍機案，展示了立憲派人士對清廷從期望到失望再到背離而去的過程。

對一次比一次浩大而激烈的國會請願運動，結果只得清廷允諾縮短預備立憲年限三年。先生的論斷是，立憲派人士不能利用群眾力量，反而寄希望於督撫，注定不能如願。但先生亦同時指出，當時中國的市民階層尚未發達，百姓無知，要有成功的群眾運動，似乎也是一種幻想。能縮短預備年限三年，已算是差強人意了。重要的是，請願運動使中國的政治發展趨勢有了重大的改變，有其深刻的意義與不可忽視的影響。這是中國首次以人民的名義向統治者提出政治要求，喚起人民的政治意識與權利思想。另外，國會請願的激切言論，充分揭露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不僅破滅了滿清政權的威信，且間接有助於革命運動。而立憲派人士失望之餘，轉而同情革命，則對辛亥革命的成功有深遠的影響。

宣統二年(1910)九月，資政院開議之後，來自各省諮議局的民選議員，本著立憲主義責任內閣的理念，要求軍機大臣負起政治責任，並到會聽候質詢。結果因軍機大臣藉辭推託相應不理，而引起議員們在議場上非常激烈的言論批判，並且二度進呈彈劾軍機之奏摺。雖然彈劾軍機案最後在雙方互不相讓的情況下不了了之，但這是中國第一次人民主權的表現，也是第一次政府責任的要求，因而也預示了辛亥革命前後立憲派人士政治態度的轉變。

宣統三年(1911)五月，立憲派人士以諮議局聯合會為基礎，擴大組成「憲友會」，略具政黨雛形。數月後，新軍在武昌起事，立憲派人士亦全面捲入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月餘之間，有十四省響應宣布獨立，未獨立者有北方及東北、西北邊疆八省。在詳細分析了各省以諮議局為中心的立憲派人士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之後，先生的結論是：立憲派人士有意要求立憲，卻無意之間刺激了革命，是革命的間接助長者，對辛亥前後中國革命時勢之形成，頗有貢獻。故曰：「立憲運動是和平的改革運動，但它的發展，又具有革命的性質。」此種革命性，主要表現在宣布獨立的十四省立憲人士身上，有的與革命黨合作，協助穩定地方政局，有的藉機主

導獨立，奪取地方政權，鞏固革命勢力的半壁江山，最終迫使清帝退位。

但是，先生也明白指出，立憲派與革命黨的合作，只是「革命的彌月時期」，等到革命成功，局勢稍微穩定之後，立憲派人士的保守性或妥協性就出現了。立憲派與革命黨之間，因思想的分歧、政治的恩怨、權利的爭奪等各種因素，本不易合作，亦不同途，雖因偶然的事件發展促使雙方妥協合作，但是基礎薄弱，隨即分裂。立憲派在其精神領袖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的主導之下，擁袁世凱自重，同時助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最後取得大總統職位。所以先生此書的最後論斷是：就推翻滿清政權，結束數千年的專制政體而論，辛亥革命是一個成功的革命，而立憲派人士對此多有貢獻；但是，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得不到改革，不能及時走向現代化，這也是立憲派人士的歷史罪過。

《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一書出版後，在海內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中引起廣大的回響，尤其是西洋學者，往往從先生此書去了解清末立憲運動的詳細情況及其重要性。此書也讓世人見到辛亥革命的複雜性，與立憲派人士在革命時期的活動與貢獻，糾正了對中國近代史的一些太過簡單化的黨派之見，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更精彩的是，先生於此書中對立憲派人士既保守又進取、既進取又保守的思想、性格的分析與論述，而這也構成先生此後論述中國近代知識（精英）分子的基調與特色。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於此書中，廣泛應用政治學、政黨理論、社會學、心理學與群眾運動與心理的知識，來分析說明歷史現象，讓人對歷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先生可謂台灣歷史學界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歷史追求科際整合的學術先鋒，這應歸功於在此之前留學美國兩年的寶貴經驗，也奠定了以後研究現代化問題的理論基礎。

民國 67 年(1978)，先生的第三本著作《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出版，與前此《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一書，合而為梁啟超全傳，先生的梁啟超研究至此也算功德圓滿，暫告一個段落。《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一書最大的特色是，走出以革命為正統的論述觀點與視角，根據事實毫無顧忌地論述梁啟超在民國時期的政治與學術的思想與活動。這在當時仍然以革命為正統，而有諸多顧忌甚至禁忌的學術環境中，是頗為難能可貴的，對先生的學術研究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一次突破。以此書為轉折點，現代化論述取代了革命論述。

此書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論述梁啟超自民國元年至民國 6

年(1912-1917)的政治活動，後半部則論述自民國7年退出政壇以後的學術文化活動。在政治方面，民國初年的梁啓超是堅決擁護共和體制的。但基本上梁啓超還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主張「主權在國家」而非主權在民，強調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推行保育政策，培養民力、訓練民德，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堅階級的領導，故組織政黨，欲以政黨引導政府指導國民，完成其政治理想。然而，事與願違，梁啓超雖然組織並領導了進步黨，但在國會中仍然居於少數，乃連結袁世凱，聯手打擊居於多數的國民黨，但等到國民黨被擊潰，國會也被袁世凱非法強行解散，進步黨同樣遭到排斥，政黨惡鬥的結果，只是兩敗俱傷，更便宜了袁世凱稱帝。

梁啓超堅決反對帝制，與西南四省都督聯合反袁，袁世凱死後，又與段祺瑞合作，欲實踐其中堅領導的政治策略，甚至不惜引導北洋軍閥改造國會，在北洋軍閥的操控下，名為選舉實則指派了一個新國會，以為軍閥傀儡，導致南北分裂。梁啓超本人則擔任五個月的財政總長，毫無建樹，終為段祺瑞排出政壇，結束為期六年不得志的政治生涯。先生總結梁啓超在民國初年的政治活動，認為所謂「中堅領導」的觀念與策略，並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則，骨子裡還是寡頭政治，並不代表廣大的市民階層，亦未曾真正深入民間發現疾苦，因而無法與民眾結合，不能凝聚廣大的力量，只是與軍閥、政客之間的派系惡鬥，這不只是梁啓超個人的失敗，也是當時中國政治無可救藥的惡症。

梁啓超晚年的文化學術活動、若即若離的政治關係、師友之間的情誼以及廣為注目的言論事業，先生在書中都有很詳細的論述，其中最突出的是有關梁啓超社會主義思想的討論。民國8年(1919)，梁啓超在歐洲考察一年，親身體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所造成的災難性結果，思想再次有了變化。就梁啓超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是西方物質主義極端發達的結果，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事實上卻是科學的破產。但是，此時的梁啓超對以唯物辯證法為思想基礎，信仰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所發動的共產革命，又相當的同情，且肯定俄國共產革命的歷史價值將不在法國大革命之下，甚至稱讚列寧的人格，認為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列寧之人格感化全俄的結果。此時的梁啓超，似乎對社會主義充滿期待。

然而，梁啓超對社會主義的期待是矛盾的，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也是有點混亂。如從西方的歷史發展，肯定階級為人類進化不可缺少之工具，認

為「近世代議制度之建立，實以階級精神為中堅」，也相信中國未來必定有經濟性的階級產生，因此社會主義應是中國未來的理想。但是，環顧中國的現實情況，資本缺乏，產業幼稚，既無資本家，更無勞動階級，而且政治組織腐敗無能，根本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梁啟超相信，「必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藉」，故對當時的中國而言，必須先「借資本階級以養成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實現。梁啟超鼓勵中國人發展實業，但又不希望中國社會走向不自然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因而強調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與基爾特(Guild)式的社會主義，是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就當時而言，也許可說是個精神上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一個行動中的社會主義者。所以，在現實的行動上，梁啟超是反共的，尤其是對採取暴力恐怖活動的共產黨，更是深惡痛絕，他認為向外推銷暴力恐怖活動的共產蘇俄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當時的蘇俄「只是共產黨人的大成功，卻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就梁啟超看來，蘇維埃式的共產黨徒，為了未來渺不可知的天堂，已經將現實的人間變成地獄了。不論梁啟超是否為社會主義者，梁啟超堅決的相信，中國能走的唯一路途，就是發展實業，積極現代化。這也正是先生此後的研究主題。

一九六〇年代，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術界興起現代化的研究熱潮，這自然也是台灣學術界關注的主題，先生與近史所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同仁十人，自民國 62 年(1973)至民國 65 年(1976)，在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支助下，從事一項名為「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的三年集體研究計劃，一時頗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注目。先生在此計劃中，擔任湖南省的研究工作，成果於民國 72 年(1983)出版，即《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一八六〇——一九一六》。在此書中，先生以詳實的資料、圖表先分析湖南省的背景環境，如自然條件、人口、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再論西力衝擊與湖南人的反應與心理轉變；最後以三章詳細論述了湖南省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三方面的現代化歷程。

先生在此書中表述的中心論點是：後進國家的現代化，必須由中央有計劃的推動，才比較有效而能成功。檢視湖南省在清末民初的現代化歷程，也證實了這一論點。雖然專業人才的缺乏與資本不足，一直是中國現代化的困境，但是中央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階層，尤其是民國初年動亂的政局，才是中國現代化不能成功甚而倒退的致命傷。從政治、經濟、社會

各方面的資料，都突顯出一個事實，即清末的中央政府雖不見得強而有力，但在中央的號令之下，全國齊步預備立憲，在各方面都有實質的進步，只是進步緩慢難於令人滿意而已；反觀民國初年，政局動亂，中央無力，地方靡爛，現代化不進反退。因此，先生在書中一再表達了對民初政局的失望，也因此促使先生再度檢討革命在現代中國的意義與價值。從現代化的研究，先生得到一個結論，即革命對現代中國而言，其意義與價值是負面的。先生現在並不諱言，其觀點與態度是反革命的。先生三十年的研究歷程，似乎是從革命走到了反革命。

民國 72 年以後，先生除陸續發表一些有關梁啓超與立憲派的後續研究之成果外，再度與近史所的年輕研究員合作，將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擴大到內陸省分，以與沿江沿海諸省做個比較，希望對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有一全面的理解。先生這次所擔任的研究區域是故鄉貴州與雲南兩省，其成果已有七篇論文發表，成書的出版則有待來日。已發表的七篇論文，以雲貴的貧窮為中心論題。先生認為雲貴地區生活環境較為貧瘠，困境不易突破，久而久之，人民的心理上亦缺乏「成就感」，形成一惡性循環，不可自拔。這是近代雲貴成為中國累贅的原因。

先生一向關心中美學術交流，不時著文討論，最近完成一本專書：《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近日內即將出版，這是了解六、七〇年代中、美中國近代史研究學界三位核心領導人物的交往情誼，以及當時中、美學術界的詳情實況最值得參考的一本書。先生是這場學術交流的積極參與者與見證人，書中也表達了一些個人的學術經驗與感受。

民國 15 年(1926)，先生誕生於貴州貴陽，抗戰末期投筆從戎，後隨部隊來台，45 年(1956)自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即現在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畢業，再考入同校國文研究所，48 年(1959)獲碩士學位，50 年(1961)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3 年至 55 年(1964-1966)，赴美進修，入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歷史系，獲碩士學位。民國 66 年(1977)8 月至 69 年(1980)2 月，先生擔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之職，最後半年又兼歷史系主任，培養了不少年輕的歷史研究者與教育者。69 年 3 月，赴美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近代史講座教授一年，深受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歡迎。

先生學養豐富，做人謙虛，從不自滿於自己的成就，時時自以為不足，

時時力求改進，又熱心教導後學，希望台灣史學界能不斷進步。先生深知學術自由之可貴，從不以權威自居，指導學生研究亦能尊重學生的自由發展與判斷，引導學生去發現自己的學術目標與途徑，做一個獨立而有創意的研究者。先生亦深知學術研究的艱苦與寂寞，對他人的學術研究，總是抱持著同情與善意，不吝惜讚美與肯定，不作尖酸刻薄的批評，此種與人為善的學者風範，是頗值得學習與效法的。先生退休之後，仍任近史所兼任研究員，繼續其所熱愛的研究工作。在此，謹祝先生的學術更精進，也期待先生更精彩的研究成果。

附錄：張朋園先生論著目錄

專 書

-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1)，民國53年5月，345頁。
- 《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4)，民國58年1月，354頁。
- 《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與自強運動》(與李恩涵等合著)。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66年，262頁。
-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67年5月，338頁。
-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1860-1916——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6)，民國72年2月，469頁。
- 《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0)，民國86年，188頁。

論 文

- 〈清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之分析〉，《思與言》，卷5期6(民國57年3月)，頁13-23。
- 〈梁啟超之迎拒虛無主義〉，《大陸雜誌》，卷38期8(民國58年4月30日)，頁17-21。
- 〈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1898-1921〉，《思與言》，卷7期3(民國58年9月)，頁1-5。
- 〈黃遵憲的政治思想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民

- 國 58 年 8 月)，頁 217-237。
- 〈辛亥革命時期領袖群的進取與保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4 期 7(民國 60 年 7 月)，頁 4-5。
- 〈廣智書局(1901-1915)——維新派文化事業機構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民國 60 年 6 月)，頁 397-415。
- 〈進步黨——兼論清末民初溫和型知識份子〉，《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輯 1(民國 60 年 12 月)，頁 283-323。
- 〈維護共和——梁啟超之聯袁與討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下冊)(民國 61 年 12 月)，頁 377-396。
- 〈時報——維新派宣傳機構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民國 62 年 5 月)，頁 151-175。
- 〈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卷 6 期 1(民國 62 年 3 月)，頁 1-15。
- 〈梁啟超的「國務大臣」志氣及其對民初財政司法外交的影響〉，《食貨月刊》，復刊卷 3 期 7(民國 62 年 10 月)，頁 1-24。
- 〈梁啟超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及中國現代化的見解〉，《食貨月刊》，復刊卷 3 期 10(民國 63 年 1 月)，頁 6-28。
- 〈中國現代化所遭遇的困難〉，《幼獅月刊》，卷 41 期 1(民國 64 年 1 月)，頁 9-12。
- 〈梁啟超在民國初年的師友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3(民國 64 年 2 月)，頁 187-203。
- 〈清末民初的兩次議會選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輯 5(民國 65 年 1 月)，頁 83-110。
- 〈近代地方政治參與的萌芽——湖南省舉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4(民國 65 年 4 月)，頁 381-405。
- 〈近代湖南的人口與都市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5(民國 66 年 4 月)，頁 447-487。
- 〈近代湖南人性格試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民國 66 年 6 月)，頁 145-157。
- 〈革命黨與立憲派推展民主政治的進程〉，《近代中國維新思想研討會》。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68 年 6 月，頁 66-75。
- 〈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兼論蛻變中的政治優異分子〉，《國立臺

- 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7(民國 68 年 5 月)，頁 363-447。
-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現代化——嚴復、梁啟超的進化觀〉，《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 68 年 12 月，頁 187-230。
- 〈進步黨之結合與權力分配〉，《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民國 68 年 11 月，頁 279-303。
- 〈湖南省憲之制定與運作，1920-1925〉，《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二冊)，民國 70 年 10 月，頁 524-562。
- 〈預備立憲的現代性〉，《中國近代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研討會》。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1 年 4 月，頁 108-115。
- 〈湖南省地方傳統中的幾個方面：量化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0(民國 71 年 6 月)，頁 177-272。
- 〈清末民初湖南的軍事變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1(民國 71 年 7 月)，頁 101-115。
- 〈再論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2 年 6 月，頁 187-193。
- 〈從臺灣看中美近三十年之學術交流〉，《漢學研究》，卷 2 期 1(民國 73 年 6 月)，頁 23-55。
- 〈湖南政局演變與人事遞嬗〉，《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3 年 12 月，頁 151-185。
- 〈近代中國的政治領導階層〉，《聯合校刊》(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期 41(1985 年 10 月)，頁 3-8。
- 〈中國現代化初期的助力與阻力〉，黃俊傑編，《面對歷史的挑戰》。臺北：幼獅文化公司，民國 73 年 11 月，頁 13-41。
- 〈中國近代的知識份子〉，《史政學術講演專輯》(二)。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73 年 12 月，頁 13-18。
- 〈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5(下冊)(民國 75 年 12 月)，頁 81-108。
-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民國 75 年 12 月，頁 849-867。
- 〈理性與傲慢：清季貴州田興恕教案試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上冊)(民國 77 年 6 月)，頁 41-51。
- 〈落後地區的資本形成：雲貴的協餉與鴉片〉，《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

- 會議》。台北：中研院經濟所，民國 78 年 1 月，頁 1069-1104。
- 〈清末民初民主政治之興衰〉，「中國民主前進研討會」論文，民國 78 年 8 月，18 頁。
- 〈中國內陸地區對西力衝擊的反應——雲貴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78 年 6 月，頁 649-679。
- 〈近代中國的軍事與現代化〉，《史政學術演講專輯》(三)。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78 年 9 月，頁 501-519。
- 〈雲貴地區少數民族的社會變遷及其限制〉，《中國現代化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80 年 3 月，頁 239-275。
- 〈清末民初民主政治之發展〉，《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卷 2 期 2(民國 80 年 8 月)，頁 171-183。
- 〈革命與現代化交織下的近代中國〉，《思與言》，卷 29 期 3(民國 80 年 9 月)，頁 1-20。
- 〈雲貴地區識字率的增進，1902-1949〉，《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三冊)，民國 81 年 4 月，頁 330-363。
- 〈韋慕庭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漢學研究》，卷 10 期 2(民國 81 年 12 月)，頁 437-454。
- 〈梁啟超的家庭生活〉，《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民國 82 年 6 月，頁 965-994。
- 〈立憲派的「階級」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2(上冊)(民國 82 年 6 月)，頁 221-264。
- 〈梁啟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分子的約束〉，《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期 2(民國 83 年 6 月)，頁 51-64。另收於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後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193-205。
- 〈貧窮與疫病：雲貴地區瘴癘探源〉，《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民國 84 年 3 月，頁 512-541。另收於《社會學研究》(北京)，1996 年第 3 期，頁 18-31。
- 〈人材培植：雲貴現代化的先決條件〉，《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上冊)，民國 84 年 2 月，頁 183-201。
- “The Constitutionalists,” 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43-183.

- “A Typological Hypothesis on the Elit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9: 1-2(1972-3), pp. 32-38.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Parliament of 1913-191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7: 2(February 1978), pp. 293-313.
- “Provincial Assemblies :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1909-1914,”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7: 3(Spring 1984), pp. 3-28.
- “Sino-American Scholarly Relations as Seen From Taiwan, 1949-1979,”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1: 3(Fall 1983), pp. 46-86.
-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China: Its Promotive and Obstructive Forces,” *Issue & Studies* 21: 9(September 1985), pp. 11-34.另收於 Yu-ming Shaw 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Publications, 1985, pp. 43-69.
-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3: 1(Fall 1989), pp. 3-22.
-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1860-194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9(民國 79 年 6 月)，頁 45-66。
- “Hu Shih and Liang Ch’i-ch’ao: Affinity and Tens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of Two Generations,”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6: 4(Summer 1993), pp. 3-49.
- “The Tenacity of Tradition: Liang Qichao and Gender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ols. 25&26 (1993-94), pp. 42-54.

書 評

- 〈朱著《現代中國改革家張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民國 58 年 8 月)，頁 369-375。
- 〈《張南通(謇)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民國 58 年 8 月)，頁 363-367。
- 〈高著《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民國 60 年 6 月)，頁 585-589。
- 〈評介史扶鄰著《孫逸仙與中國革命的起源》〉，《思與言》，卷 8 期 5(民國 60 年)，頁 44-48。
- 〈徐著《中國近代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民國

- 61年7月)，頁672-632。
- 〈傅著《丁文江與中國科學和新文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1(民國62年1月)，頁271-273。
- 〈賈著《俄羅斯與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民國65年6月)，頁533-563。
- 〈姚著《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民國66年6月)，頁409-414。
- 〈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爭與憲政不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6(民國66年6月)，頁415-420。
- 〈李雲光著《康有為家書考釋》〉，《東方文化》(香港)，卷18期1/2(1980年)，頁269-271。
- 〈勞著《清季教育與大眾識字能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9(民國69年7月)，頁455-462。
- 〈駱編《中國的現代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2(民國72年6月)，頁397-414。
- 〈沈宗翰傳記評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11(民國72年6月)，頁281-291。
- 〈周著《胡適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4(民國74年6月)，頁377-383。
- 〈柯著《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民國75年3月)，頁113-116。
- 〈楊世驥著《辛亥革命前後湖南史事》〉，《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台北：國史館，民國76年6月，頁129-140。
- 〈熊希齡研究的展開：三種相關出版品評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3(民國81年3月)，頁191-196。
- 〈貴州軍閥史研究會著《貴州軍閥史》〉，《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九)。台北：國史館，民81年12月，頁260-269。
- 〈費正清著《中國史新論》〉，《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十三)。台北：國史館，民國83年12月，頁415-428。

編輯

《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第一冊，(與沈懷玉合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民國 76 年 6 月，603 頁。

口述史訪問

- 《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2)，民國 72 年 1 月，226 頁。
- 《白瑜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4)，民國 76 年 4 月，220 頁。
- 《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5)，民國 76 年 6 月，302 頁。
- 《袁同疇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6)，民國 77 年 6 月，263 頁。
- 《盛文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8)，民國 77 年 6 月，171 頁。
- 《於達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19)，民國 78 年 7 月，132 頁。
- 《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22)，民國 79 年 6 月，280 頁。
- 《龍繩武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28)，民國 80 年 5 月，129 頁。
- 《張法乾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34)，民國 81 年 2 月，122 頁。
- 《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47)，民國 82 年 5 月，158 頁。
- 《任以都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50)，民國 82 年 12 月，209 頁。
- 《王微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60)，民國 85 年 6 月，210 頁。
- 《賀國光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七期(民國 85 年 6 月)，頁 10-52。
- 《吳思珩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八期(民國 85 年 12 月)，頁 145-172。



研究概況

中國大陸太平天國史研究述評

夏春濤*

一、1949年以前的史料發掘與史事考訂

太平天國從 1851 年揭幟立國到 1864 年中央政權覆滅，前後長達 14 年。太平天國敗亡後，除清方從諛頌「皇清武功」的角度，刊行了一些公私著述外，民間談論太平天國始終是一件禁事。直到本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前夕，這一禁區才被打破。革命黨人奉洪秀全等為反清撲滿的前驅，開始對太平天國進行重新評價和認識。漢公（劉成禹）《太平天國戰史》、黃小配《洪秀全演義》等書先後在海外祕密出版。不過，這些著述均屬興漢反滿一類的宣傳品，遠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如漢公一書的封面即題為「漢族流血書之一」。孫中山先生在序言中稱之為太平天國「一代信史」，但該書內容實際上大多出於杜撰，與史實出入頗大。

辛亥以後，研究太平天國史不再是禁忌，故相繼有多種論著問世。其中，羅惇勳《太平天國戰紀》（1913）、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1923）偏重於敘事；李一塵《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1930）、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1931）偏重於理論分析。上述著作雖有開拓之功，但共同的缺陷是參據的真實文獻史料不足。

太平天國失敗後，其文獻被毀滅殆盡，國內已不易搜求。但國外一些圖書館尚保存有大量的太平天國文獻，均為當時曾與太平天國有過接觸的西方朝野人士所贈送。於是，通過一些獨立的、偶然的機會，國內湮沒已久的太平天國自身的文獻，如它的印書¹、文書等，開始陸續由中國學者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太平天國稱自己刊行的書籍為「詔書」，也稱作「天書」、「真書」或「聖書」。今大陸學者則統稱之為「印書」。

在海外發現並傳回國內。

梁啟超最早從國外傳回太平天國文獻。1919年，他在荷蘭萊登大學圖書館發現太平天國印書，遂命人繕錄五冊。可惜事後未曾報導和刊行，故長期不為國人所知。太平天國文獻傳回國內並正式出版，則自1920年代始。1926年，北京大學教授劉復將六年前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今大英圖書館）抄錄的文獻編成《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交北新書局出版，內有印書《太平條規》一部及「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一篇。同年，程演生教授將兩年前在巴黎東方圖書館攝影、抄錄的文獻，編成《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計收印書八種。約與程氏同時，俞大維先生又在德國普魯士圖書館攝得印書九種。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羅崑、沈祖基編《太平天國詩文鈔》一書的修訂本，內有張元濟據俞氏照片校補編入的八種印書。

在海外搜訪太平天國文獻貢獻最大的當推蕭一山教授。1932年，蕭氏赴歐洲考察文化，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獲見大量太平天國文獻，遂予以攝錄，後編成《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1936年由南京國立編譯館影印出版，計收入印書21種，書末各附考訂跋文一篇。稍後，王重民於1935年從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傳回太平天國印書10種，皆程、蕭等人所未見者，編為《太平天國官書十種》，後作為「廣東叢書第三集」出版。至此，在海外發現並傳回國內刊布的太平天國印書計達36種，占太平天國原刊書籍的絕大部份。

與此同時，太平天國遺存文書亦陸續公諸於世。1932年，清人張德堅編纂的《賊情匯纂》一書，由南京國學圖書館石印刊行，學人藉此得見該書輯入的太平天國前期的大量文書。次年，故宮博物院從清廷軍機處存檔內選輯太平天國文書12件，取名《太平天國文書》影印出版。海外也有重大發現，除前述劉復一書外，蕭一山將在倫敦獲見的文書編為《太平天國詔諭》、《太平天國書翰》兩冊，由國立北平研究院分別於1935年、1937年影印出版，計收文書30件，篇末各附考釋或後記。此外，蕭氏在南京主編的《經世》半月刊與簡又文在上海主編的《逸經》半月刊，也不時刊布一些國內外新近發現的太平天國文書。

同在1930年代，學術界開始重視譯介西文資料。簡又文在這方面著手最早、貢獻最大。1935年，洪仁玕述、瑞典韓山文(Rev. T. Hamberg)著、簡又文譯《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由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

改名為《太平天國起義記》。同年，簡氏《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內收英人富禮賜(J. Forrest)《天京游記》等多種譯著。簡又文另選譯《北華捷報》中的報導多篇，在《逸經》雜誌上陸續發表。此外，簡氏還獨闢蹊徑，多次赴廣西實地考察，後將採訪所得輯成《金田之游及其他》一書，1944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內以口碑材料和文物考釋最有價值。

太平天國史事的考訂研究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大進展，一批深具影響力的論著相繼問世，主要有謝興堯的《太平天國史事論叢》(1935)、郭廷以的《太平天國曆法考訂》(1937)、《太平天國史事日誌》(1946)，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1937)、《太平天國史叢考》(1943)，簡又文的《太平軍廣西首義史》(1944)。這些著作均參引史料進行稽考，澄清了過去的許多訛傳和誤解。例如，前期漢公等人的著作均沿襲《平定粵匪紀略》中的舊說，認為朱九濤創上帝會而洪秀全曾師從之。羅爾綱經過考訂，證明朱九濤係湖南天地會一首領，與上帝會和洪秀全毫無瓜葛。又如，日本學者田中萃一郎1912年排列了天曆與陰陽曆對照表，認為天曆的干支、禮拜與陰(夏)、陽曆同。郭廷以通過勘核對比，得出天曆的干支、禮拜較陰(夏)、陽曆提前一日的結論，解決了太平天國曆法研究中的一大疑案。

《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則是作者在參考六百餘種中西文著述的基礎上考訂而成，書末所附各種圖表及引用書目也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它為日後簡又文撰寫《太平天國全史》、《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向達等編纂《太平天國》，提供了便利或線索，並且至今仍是大陸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是太平天國史研究的開拓和初始階段，其成績主要表現在史料發掘和史事考訂方面，其中，蕭一山、郭廷以、簡又文、羅爾綱等人筆路藍縷，是研究太平天國史成就卓著的第一代學者。

二、「文革」結束前的研究概況

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出現了轉折，研究者普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採用階級分析法來從事研究，修正了以往視太平天國為宗教革命或種族革命的觀點。翌年，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

「太博」)開始籌建。21951年1月11日是金田起義一百周年紀念日,許多城市舉辦了紀念展覽會。《人民日報》於當日發表社論,充分肯定了這場農民運動反封建反侵略的偉大意義。

由於該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視,加之新的文獻史料和文物不斷發現,學術界開始了大規模的編纂、出版太平天國資料的工作。1950年,金毓黻、田余慶主編的《太平天國史料》由開明書店出版,計分太平天國官書、文書、清方文書、中外記載四部份,收入了向達、王重民1930年代從英國抄錄的許多重要史料。1952年,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種《太平天國》八冊(俗稱「八大本」),由神州國光社出版。這是一部大型資料匯編,由向達等20人編輯,分太平天國史料(印書38種、文書84件等)、清方記載(《賊情匯纂》等52種)、外人記載(《洪秀全革命之真象》等7種)、專載(《向榮奏稿》等3種)四部份,可謂集一時之大成。次年,吳煦檔案數萬件在杭州發現,極富史料價值。1958年,靜吾、仲丁編《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由三聯書店出版,內分太平天國文書等六類。1959年,榮孟源主編的《太平天國資料》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計收錄新發現的文書10件,清朝檔案和一般記載19篇。1961年,羅爾綱協助「太博」主編的《太平天國印書》20冊,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共輯印書42種(內有兩種是重刻本),至今仍是最大的一部太平天國印書的匯編。不過,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內有數種印書係仿刻影印。

與此同時,學術界開始系統輯錄太平天國文物。1952年,「太平天國起義百年紀念展覽會」編《太平天國革命文物圖錄》,由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計收印信類13件,遺物遺跡類20件,碑刻類6件,文書告諭類20件,公據類28件。1953年、1955年,郭若愚編《太平天國革命文物圖錄續編》、《太平天國革命文物圖錄補編》續在上海出版,各收文物圖片87件、76件,體例大略同前。這三種圖錄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文物資料。

編纂清方記載的工作也有重大突破。在羅爾綱主持下,「太博」搜集了1,200萬字資料,從中精選出140萬字,編成《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六冊(俗稱「六大本」),1961年起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陸續出版。

2 按:該館於1956年正式成立,兩年後遷至十里秦淮原東王楊秀清王府舊址一瞻園。

該書計分專著、紀事、時聞、奏稿、詩歌五類，內有不少孤本祕籍等罕見資料。

西文資料翻譯方面同樣受到了重視。1954年，王崇武、黎世清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內有《戈登在中國》等重要資料，另附插圖14幅。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英人哈喇(A. F. Lindley)《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革命史，包括作者親身歷險的敘述》一書的全譯本，由王維周翻譯，取名為《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

總之，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大陸學術界在太平天國資料的蒐集、編纂、出版上成績斐然，尤其是在太平天國文書、文物和清方記載方面。這就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研究工作方面，范文瀾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修訂本）1949年由上海新華書店出版，後又被收入暢銷一時的《中國近代史》一書，故而傳播廣泛，影響深遠。該書認為太平天國揭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革命運動。這種看法成為大陸太平天國史研究整整一個時期的主流觀點。羅爾綱則在1950年代先後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稿》、《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以及《太平天國史記載訂謬集》、《太平天國史事考》等七種論文集，集中代表了他在史事考訂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並為後學提供了一把入門的鎖鑰。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圍繞著太平天國革命是市民運動還是舊式農民戰爭的問題，學術界展開了一場熱烈的爭論。這場爭論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研究的深入。圍繞著太平天國時期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太平天國的農村政權、鄉官成份，文化、思想和工商政策，《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及相關人物的評價，太平天國抗擊內外敵人的戰績，同各地各民族反清起義的關係等，研究者發表了很多論著，其數量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中首屈一指。

這一時期的研究儘管成績驕人，但同時也存在著偏差，主要表現在片面強調歷史研究為現實政治服務，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國，導致研究工作有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這表明此時的太平天國史研究仍處在摸索階段，尚未臻成熟。但這一進程不久便因「四人幫」大搞影射史學而被打斷。1964年批判李秀成的政治運動和1974年在太平天國史領域中搞「批儒評法」，給研究工作帶來極大混亂，不少學者因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辯護士」

的大帽子而受到衝擊，太平天國史研究由此而經歷了一個曲折乃至倒退的時期。

三、近期的主要研究成果

「四人幫」垮台後，太平天國史研究又逐步恢復了生機。1978年7月，「文革」後大陸第一個學術團體——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正式成立。不久，浙江、廣西、四川、廣東等地，相繼成立了太平天國史研究會。³在這些學術團體的組織和推動下，太平天國史研究異常活躍。1979年5、6月間，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與南京史學會在南京聯合舉辦了太平天國史學術討論會。這是一次空前的盛會，計收到中外學者的論文三百餘篇。與會者對太平天國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展開了積極的討論。對洪秀全早期思想的重新評價是這次會議提出的重要問題之一。王慶成先生〈論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發展〉一文認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經歷了從追求功名、以道德說教手段改造世道人心，到立志反清的發展過程，1843年皈依上帝並不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點；洪秀全的著作中並沒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思想，其綱領是平均主義的，也是專制主義的。這一觀點在當時引起了強烈反響，並逐漸被學術界所接受。這表明大陸學者開始有意識地糾正前期研究中所出現的偏差。繼南京會議後，蘇州、廣州等地又相繼召開了太平天國史學術討論會。

1981年、1983年，由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主辦、王慶成主編的《太平天國史譯叢》、《太平天國學刊》先後問世。這兩種叢刊均由中華書局出版，前者專門收輯研究論文，後者則以編譯西文資料為主。其中，《學刊》是大陸權威性的太平天國史研究的專業刊物，成為反映大陸學者最新研究動態和成果的一個窗口。

到1980年代中後期，「史學危機」的呼聲在大陸日甚一日。多數史學工作者意識到，史學危機的出現主要源於史學界本身，以往的研究方法陳舊單一，研究對象上課題陳舊、範圍狹窄，已遠不能適應變革時代的要求。於是，人們開始積極探尋擺脫危機的方法和途徑。

在上述背景下，近十幾年來，尤其是近年來，大陸的太平天國史研究

³ 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於1990年5月在南京成立。

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茲就其具體表現擇要略加評述。

（一）文獻史料的編纂出版和研究

在太平天國自身文獻方面，羅爾綱協助「太博」主編的《太平天國文書匯編》於197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計收錄1977年前所發現的太平天國文書418件。《太平天國印書》也於同年另行排印出版。這兩部書與前述「八大本」、「六大本」一起，構成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最基本資料。此外，王慶成、莊建平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史料集》，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計輯錄有關史料215件，內有一批太平天國文書係英國學者柯文南(C. A. Curwen)教授從英國檔案館中發現並提供，史料價值很高。

《天父聖旨》、《天兄聖旨》的公佈則是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文獻發現。當年蕭一山教授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搜訪太平天國文獻，貢獻巨大。但他誤以為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藏太平天國文獻經其搜尋，已「了無遺珍」。⁴1984年春，王慶成在那裡發現了這兩種已塵封百餘年的珍貴文獻，攝影帶回，後將之編成《天父天兄聖旨》一冊，1986年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平天國以宗教立國，楊秀清、蕭朝貴假托天父上帝、天兄基督附體下凡所傳的「聖旨」是太平天國的最高指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兩種文獻便是天父、天兄歷次下凡活動的記錄匯編，它們的發現大大豐富了人們對太平天國早期歷史的認識。

清方記載方面陸續編纂出版的主要有：羅爾綱協助「太博」主編《太平天國資料匯編》第一冊《平定粵寇紀略》、第二冊《中興別記》（中華書局，1979-1980），董蔡時主編《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茅家琦、董蔡時等編《江浙豫皖太平天國史料選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李武緯等編《吳煦檔案選編》（同上），張守常編《太平軍北伐資料選編》（齊魯書社，1984），皮明庥編《出自敵對營壘的太平天國資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以上大半屬沒有公佈過的新史料。

調查資料方面，饒任坤、陳仁華編《太平天國在廣西調查資料全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一部廣西有關太平天國之口碑、碑刻、

⁴ 見《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序。

族譜、契據、手稿等資料的匯編。

西文資料方面，除《太平天國史譯叢》陸續編譯了《華爾傳》、《常勝軍》等外人早期著述外，馬博庵譯、章克生等校注《太平軍在上海》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選譯自《北華捷報》。

此外，受某古籍整理機構的委託，從1982年起，羅爾綱、王慶成主編並有龍盛運、吳良祚、趙云田等學者參加，開始編輯《太平天國》八冊的續編。這部「續編」計分太平天國文獻、清方記載和西文史料三部份，編入了多種新的史料，如印書類有《武略》、《欽定舊遺詔聖書》前六卷、《欽定前遺詔聖書》全部（缺卷四）等。西文史料則包括《英國議會文書》和克拉克(P. Clarke)、格利戈里(J. Gregory)編《西方關於太平天國的報導》兩種。綜計約三、四百萬字，現已全部編譯完畢，近年內將由中華書局出版。

文獻史料的研究方面同樣有重大收穫，羅爾綱注釋李秀成「自述」便是突出的一例。羅氏於1931年開始對之作注，1951年由開明書店出版《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一書，轟動一時。由於曾國藩當初曾對李秀成「自述」進行刪改，世傳版本並非其原貌，故羅氏又反覆調整版本，增訂注釋。1962年，台灣世界書局影印出版了曾氏後人密藏的《李秀成親供手跡》，使這件稀世之珍公諸於世。羅氏遂第三次調整版本，於1982年推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後又根據新史料續加修訂，199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其增補本。其注釋是名物訓詁與史實考訂並重，堪稱精湛。羅先生窮半個多世紀之力注釋李秀成「自述」，從青春一直注到白首，在大陸史學界傳為佳話。

1993年，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一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王氏是近幾十年來大陸在海外搜訪太平天國文獻方面用力最勤、貢獻最大的一位學者。該書介紹了作者在海外獲見的太平天國文獻，探討了太平天國印書制度的演變等問題，包括新文獻刊布和文獻校訂；另結合文獻研究相關史實，諸如洪秀全與羅孝全的早期關係，儒學在太平天國的命運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

祁龍威教授在太平天國文獻學方面亦頗有建樹，尤以對文獻史料的考訂、辨偽、校注見長，著有《太平天國史學導論》（學苑出版社，1989）等書。

（二）新、舊課題的研究方面

李文海、劉仰東著《太平天國社會風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該書從家庭結構、服飾裝束等九個方面，描述了太平天國轄區的社會習俗和風土人情，是從社會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開拓之作，給人以清新之感。

太平天國宗教問題以前是個無形的禁區，在 1949-1977 年間公開發表的論文中，僅有一篇論及宗教。此後，該課題逐漸引起少數學者的重視。其中，王慶成對之作若干開拓性研究，其文集《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中華書局，1985）計收有此類論文 11 篇。夏春濤的《太平天國宗教》（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則是大陸第一部以此為題的研究專著。該書較為系統地考察了上帝教的創建過程、教義、宗教儀式及宗教經典，與西方基督教和中國民間宗教之間的關係；另逐一分析了洪秀全與洪仁玕宗教思想的異同，上帝教對太平天國社會理想、對外觀念和文化政策的影響，在太平軍內部和民間傳播的情形，以探討宗教與太平天國興亡之間的關係。

龍盛運的《湘軍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朱東安的《曾國藩幕府研究》（同上，1994）則是近年來研究太平天國政治對手的重要論著。前者從政治史的角度，探析了湘軍從創建、發展到裁撤的全過程，並兼論湘軍戰史，從而在內容上超越了以往單純研究湘軍戰史、兵制的論著；後者則從曾國藩幕府的組織機構入手，考察了其設置、職能及其成員的活動，分析了曾國藩的人才思想及其幕府對晚清政局的影響。

傳統課題的研究繼續走向深入。人物研究方面的論著主要有蘇雙碧《太平天國人物論集》、鐘文典《太平天國人物》、陳寶輝等著《太平天國諸王傳》；地方史研究方面，主要有董蔡時《太平天國在蘇州》、王興福《太平軍在浙江》、徐川一《太平天國安徽省史稿》等；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也有新的論著問世（參見下文）。

（三）一批工具書的問世

姜秉正編《研究太平天國史著述綜目》，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4 年出版，收錄 1853 至 1981 年間海內外有關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專著、論文、資料和文物等，分全史、人物評傳、史料、學術思想和書志學五大類，計收五千多條目，著作者 2,262 人，在內容上較 50 年代張秀民、王會庵合編的《太平天國資料目錄》更為完備，但在史籍的版本源流和西文書目的翻譯

上略有失察之處。

郭毅生主編《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太平天國歷史與地理》，中國地圖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前者是一部以太平天國戰史為主線的專史地圖集，由地圖 104 幅、圖片 132 幀、圖說約 10 萬字組成；後者計收相關考釋文字 40 萬言。

郭毅生、史式主編《太平天國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年出版，110 萬字。該書為太平天國史專業辭典，共收近四千條詞條，分總敘、詞語、人物、軍事與戰爭、地理、經濟和文物、史料、著作七大類編排。

（四）一批總結性成果的問世

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一批總結性成果在 90 年代相繼問世。其中，鐘文典主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國史叢書》較為引人注目。這套叢書自 1991 年起已陸續推出了約十種，茲按出版時序略加評介。

1. 賈熟村《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這是一部全面考察太平天國時期地主階級的學術專著。作者將地主階級分成中央政權和地方勢力兩大類來考察。前者按軍事勢力，分作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臨淮軍、勝保、僧格林沁五大軍事集團；按政治勢力，又分為權貴派、經世派、洋務派三大政治集團。後者則分成擁清派、騎牆派、媚外派、經世派、洋務派。作者逐一論析了各自的代表人物及其重要成員，以揭示地主階級究竟採取了何種行之有效的對策，從而使得搖搖欲墜的清政府最終搖而不墜。

2. 郭毅生《太平天國經濟史》：該書係作者在舊著《太平天國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修訂補充而成，分別論述了太平天國經濟制度和政策產生的歷史背景，洪秀全的經濟思想，《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的內容和性質，太平天國的聖庫制度，「照舊交糧納稅」政策的實施，後期兩種並行的土地政策，田賦與稅收政策，商業政策與貨幣。對於一些眾說紛紜的問題，作者均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3. 華強《太平天國地理志》：太平天國政權不穩，且洪秀全後期立政無章，加上相關資料零碎分散，故研究太平天國地理難度甚大。該書則填補了這一空白，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反映了太平天國政區地理的總貌，對郡縣之地理沿革、疆界四至，太平天國新建省郡縣及避諱更名情況、攻佔退出時間，各郡縣守土官及駐防官等，均做了詳細考察。

4.吳良祚《太平天國避諱研究》、史式《太平天國詞語研究》(合訂本)：避諱在太平天國既是重要的禮制，又是盛行的習俗。吳氏在該課題的研究上最有造詣，所著結合歷史學、語言學及民俗學的方法，考察了太平天國避諱制度產生、發展與終結的歷史，探討了其避諱的分類、方法及實施的具體情形，論述了避諱在太平天國文獻史料版本校勘、訓詁翻譯、辨偽考信等方面的作用；末章附有避諱禁用字 160 多個，使該書同時又具有工具書的性質。《詞語研究》係史氏在舊著《太平天國詞語匯釋》的基礎上提煉而成，探討了太平天國詞語的來源及其衍生、發展的過程，太平天國推行專用詞語的目的、方式和實際效果，並附有詞條二千餘。

5.鐘文典《太平天國開國史》：作者在 30 年前撰有《太平軍在永安》一書。這部新著首先探討了太平天國起義的背景，復依次考察了洪秀全等從祕密醞釀、金田團營、正式揭幟、永安建政直至進軍長江、定鼎金陵的全過程，是迄今研究太平天國開國史最為全面和翔實的一部著作。

6.茅家琦《太平天國與列強》：作者多年來一直潛心研治該課題。本書是其舊著《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的增訂本，重點考察了太平天國與西方朝野人士交往和接觸的過程，太平天國後期的對外貿易，英、法、美等列強「中立」政策的實質及其演變，並分析了太平天國對外政策的得失。其特色之一是參考、利用了大量的外文資料。

7.蘇雙碧《太平天國史綜述》：本書主要從理論上論述太平天國史，史論結合，以論為主，分別探析了太平天國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諸如這場運動的性質及其產生的社會根源，洪秀全等人對待「西學」的態度，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及其歷史作用等；另兼論天京事變、安慶保衛戰等一些重要事件。

8.祁龍威《太平天國經籍志》：該書是作者研究太平天國文獻學的一個總結性成果，首對「旨准頒行詔書」29 部及其他印書順序解題並校勘版本，復對近人所編太平天國文獻進行述評；並採用「以字証經，以經証字」之法，箋釋太平天國專用字詞；另論述偽造的太平天國文獻史料及辨偽方法。該書「外一種」《太平天國文書制度》，朱從兵、崔德田著，專論太平天國文書制度的發展歷史及其文體、用語的特點。

9.周新國《太平天國刑法研究》、吳善中《太平天國曆法研究》(合訂本)：刑法問題是太平天國史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周著對之作了縱橫兩方面的探析，考察了太平天國刑法的歷史演變，刑律、刑罰及審判制度

的來源和內容，並對洪秀全與洪仁玕的刑法思想、太平天國與清王朝的刑法作了比較研究。「天曆」是太平天國更改正朔而自創的一種曆法，謝興堯、郭廷以、羅爾綱、董作賓等學者都曾對之做過研究。吳著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曆法發展史，對天曆的曆理、創制與頒行問題，天曆的特點及天曆六節等，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

10.張一文《太平天國軍事史》：關於該課題研究，此前較權威的著作爲鄺純《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但其缺陷是單純研究戰爭史。張著計分「戰爭」和「軍事」兩編，上編考察了影響乃至制約太平天國戰爭成敗的戰略行動及重大戰役，下編探析了太平軍的領導體制與軍隊編制，太平軍的軍紀、訓練、武器裝備、後勤保障制度及戰法、陣法等，在內容上更爲全面、系統。

這套叢書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陸太平天國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該叢書仍在繼續編纂、出版之中。

此外，兩部大型太平天國通史類專著也於近年內相繼問世。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中華書局 1991 年出版，繁體字豎排，計 88 卷 154 萬言。該書內容充實，論証精審，並在編著體例上有重大更新，綜合了敘論、紀年、表、志、傳五種體裁，以「敘論」概括全書，「紀年」記大事，「表」標明複雜繁瑣的史事，「志」記典章制度，「傳」記人物。羅先生以 84 歲高齡，於 1985 年撰成此巨著，融匯了他 60 年來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成果，被學術界譽爲不朽的傳世之作。

同年，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計 5 篇 22 章，135 萬字。該書是受教委委託集體撰寫的一部高校教材，以軍事爲主線，描述了太平天國由興盛到衰亡的全過程，詳略得當，且有所創見。

綜上所述，經過幾代學者長達大半個世紀的共同努力，太平天國史研究在八、九十年代終於步入了成熟和收穫的季節，成爲中國近代史學界研究最爲深入、成果最多的一個領域。

四、結束語

太平天國史研究在繁盛興旺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趨於冷落，1987 年《太平天國學刊》、《太平天國史譯叢》因經費問題而停刊便是其標誌之一。此後，儘管有一大批總結性論著相繼問世，但仍無法挽住其

頹勢。近十年來，隨著研究難度的加大和學者們研究興趣的轉移，報刊上發表的相關論文越來越少，學術活動遠不如以前那樣頻繁，研究隊伍的人數也日趨減少。以太平天國為主體的農民戰爭史研究曾因成績巨大而被譽為大陸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如今卻不禁令人有寥落之感。

太平天國史研究「內冷外熱」則是引人關注的另一現象。近年來，一些圈外人士進行客串研究，否定太平天國、替曾國藩翻案的觀點被炒得沸沸揚揚，出現了對前期研究中過「左」的地方反彈過分的傾向。

對歷史的認識和探索是很難窮盡的。研究越深入，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也就越準確，得出的結論才會更加令人信服。太平天國史這一園地雖然是塊熟地，成果豐碩，但並不意味著已沒有繼續耕耘的餘地。就資料而言，《欽定制度則例集編》、《欽命記題記》等印書至今仍未發現；西文資料是太平天國史料的一大寶庫，但我們在西文資料的發掘、利用方面，卻一直遠不如人意，所涉及的僅是一隅而已。再就具體研究而言，即便是研究最為深入的課題，仍存在著一些空白或薄弱之處；太平天國社會史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才剛剛起步。因此，倘若我們能在上述兩個方面繼續努力，或許新的收穫就在眼前。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出版緣起

李金強*

中國自漢唐以降，海陸交通漸開，遂得與亞、非、歐、美各國與民族互通往來，中外交通由是頻密，而文化交往日見繁富；其中宗教一項，尤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之大事，世界三大宗教——佛、回以及基督教均先後入華，遍傳中土，其中基督教之景教、天主教分別於唐、元、明清之交，先後來華宣教，然均因政治關係而中止，唯獨基督教新教自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再度來華宣教後，始告成事。時英、美各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國傳教士隨即接踵而至，建堂興教，開辦傳教事業，新教終於在中國社會落地生根，華人教會亦隨之而生，而基督教入華之歷史，亦由此形成，從而引起教會學者之關注，埋首撰著，此即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產生。相關著述於二十世紀前後陸續出現，而以通史編寫最為普遍，著者如 K. S. Latourette 之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1929)及王治心之《中國基督教史綱》(1940)；並在民國時期中西交通史研究風氣下湧現一批史家，如陳垣、張星烺、向達及方豪等，開拓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溫教及明清天主教等專題研究，成爲此一專史首開風氣之課題！¹

然而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至五〇年代開始出現新變化。此即由上述通史及斷代專題研究，逐漸轉入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史之探討，尤以新教入華傳教史之研究，最爲突出；此一新研究方向之產生，主要與二次大戰後中國近代史研究風氣大開，具有密切關係，²並在海內外近代史專家之推動下，促成近代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之研究，不斷成長，終於成爲中國基督教史範疇內之重鎮。

其一，美國方面由哈佛大學 John K. Fairbank 與劉廣京首倡美國來華傳教士及其傳教事業之研究，先後出版一系列書目、專著及論文，成績斐然；並於八〇年代開拓中國教會「本色化」及自立教會之研究，而以 Daniel Bays 之研究，最具代表。³

其二，台灣方面以中研院近史所呂實強爲首，從事整理清季總理衙門教務教案檔，開拓近代中國教案史之研究。六〇、七〇年代之交，林治平則起而鼓吹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關係之研究，從而肯定基督教入華之貢

1 查時傑，〈七十年來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代序）〉，魏外揚，《宣教事業與近代中國》（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7），頁17-28；〈簡評幾本基督教在華通史〉，《中國與教會》，II：4(1982)，頁19；李東華，〈懷授菴與亮塵，念覺明與杰人——略論民國以來國人的中外交通史研究〉，《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系，1992），中冊，頁901-915。

2 參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一書。

3 Murray A. Rubinste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One Scholar's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of the Research in China Mission and China Christian History, 1964-1986,"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4(1987)，頁111-143；相關研究書目並參 Jessie G. Lutz,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China Missions: Works Published Since 1970,"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20, No. 3(1996), pp. 98-106.

獻，此即基督教在華正、反兩方面影響研究之開展；⁴林氏並於一九七三年創設《宇宙光》，透過文字傳媒，宣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社會之「關連」，而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即為推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舉辦研討會，出版論文集、專著叢書以至於圖片集，⁵引發學者投身研究，台灣一地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起興，林氏實居首功！此外，尚需一提者為台灣大學歷史系查時傑，講授中國教會史而專注研究教會名人以及民國教會史，最為專業，亦為當地之開風氣者。⁶

其三，香港方面則由羅香林、簡又文及 Carl T. Smith 三位首開風氣。羅氏六〇年代出版唐元二代景教之研究，已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取得一席之地，其間且以中西文化交流角度探討香港傳教士與華人信徒之事蹟與貢獻；而簡又文則致力於太平天國的基督教研究，並撰寫《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縷述新教開山時期中西教士之事蹟；至於 Carl T. Smith 探討香港早期華人信徒之出身及其事業上之表現，無疑開啓了早期新教來華及香港基督教史之研究。與此同時，香港基督教界知識份子出版《景風》雜誌，以言論延續民國教會「本色化」運動，刺激民國教會史研究，而個別華人教會，亦先後出版堂會史，至此香港之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日見興盛。⁷

其四，中國方面自中共建國後，視基督教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之工具，採取否定，並在反帝的政治理念下，於反洋教與義和團運動之課題中進行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遂形成以教案為主流之研究，而以李時岳之《反洋教運動》一書最為著稱。然至一九七九年後，隨著改革與開放，引動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熱潮，至今方興未艾，除舊有教案研究課題繼續發展外，近日相繼開拓傳教士、教會領袖、教會大學、區域研究，以

4 李金強，〈傳承與開拓——一九四九年後台灣之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同註2，頁53-54。

5 林治平，〈總序〉，《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3），頁2-12；〈尋找好土，預備好土——「基督教與中國全方位關懷系列叢書」〉，《宇宙光21週年感恩紀念集》（台北：宇宙光傳播中心，1994），頁211-217。

6 郭偉聯、阮成國，〈鑑古知今——與查時傑教授談治中國教會史〉，《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期9(1996)。

7 李家駒、黃文江，〈香港的中國基督教新教史研究〉，《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4），頁148-168。

及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等新課題，研究亦日見蓬勃。⁸

由此可見，隨著五〇年代後，由於海內外史家共同努力與開拓，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得以不斷成長，並漸受重視；此一學術研究新動向，至九〇年代香港學術界，更見明顯。舉例而言，除各大專院校、神學院相繼招收從事此一領域之研究生外，香港中文大學之吳梓明、梁元生合力推動中國教會大學研究，出版《通訊》以及《教會大學檔案叢刊》；又出身該校歷史系之梁家麟與邢福增，亦於建道神學院創設「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且出版《通訊》，刊行專著；而浸會大學亦設立「中國基督教文獻部」，收集相關書籍及史料，並於去年十月召開「中國基督教史學術研討會」，出席中外學者之論文，皆多集中於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而歷史系即在此一學術風氣影響下，籌設出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

該集刊現時由筆者出任主編，並由系中同事組成編委會，及本校教學發展中心協助編、印事務，以年刊形式出版，並邀約海內外學者出任顧問。現時應邀而允諾之學者包括美國之 Jessie Lutz, Daniel Bays, Suzanne Barnett、劉廣京、江勇振；日本之容應庚、深澤秀男；中國大陸之章開沅、熊月之；台灣之王爾敏；香港之梁元生、梁家麟；尚有若干位學者在邀約中，謀求借助上列學者之專業，提供出版方向、撰稿，以及評審。

集刊內容主要包括專輯論文、口述歷史及書評三方面，其中專輯論文乃因應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課題而設定；至於口述歷史則以教會長牧，出身教會之社會賢達及專業份子作為訪問對象，而以香港地區為主，目的在於為華人教會史研究發掘史料，創刊號稿件已經集齊，預計於 1997 年中出版，並以「研究史」為創刊之專輯！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成果，除專書外，論文一直散見於各專上學院、神學院之學報，史學及宗教研究之刊物，至今尚未出版一份屬於此一領域之中文專業刊物，故本刊之創刊，其目的在於為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具有興趣及專業者，提供出版與交流之機會，藉以推動此一領域之研究，故此深盼海內外之同道，共同支持此一刊物之出版及其未來之發展。

⁸ 陶飛亞、劉冰冰，〈近年內國內基督教史（新教）研究簡評〉，收於朱維錚主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288-307。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介紹

廖敏淑、陳昱伶*

「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是自民國八十四年九月正式成立的一個跨校際討論近代中外關係之研討會。此討論會的緣起是依據教育部顧問室於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十三日舉行「研商八十五會計年度（八十四學年度）歷史教育改進之問題會議」的第二項決議而成立，該項決議希望激發研讀風氣，請各大學、研究單位有興趣籌組研討會的學者提出計劃申請，參加人員為教師與學生（研究生為主），人數以二十人為限，補助經費每組每年以不超過五萬元為原則。

據此，「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計劃主持人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唐啓華遂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其計劃目標為：「國內從事近代中外關係教學及研究者，散佈於各大學與研究單位，為整合成果，提升教學研究水準，亟需有交換研究心得、研究資訊，與研討問題的經常性集會，乃擬成立此跨校際研討會。」

研討會在第一學年度的經費補助只有四萬五千元，之所以能在這麼拮据的情況下完成十次研討會，主要由於計劃主持人唐啓華先生不憚煩勞，親自擔負起聯絡歷次研討會的主講人、函邀各大學、研究單位的學者、研究生，和相關單位如外交部人員等與會，以及有關研討會的種種瑣碎事項，如會計支出、寄送文件等工作。

此外，這個研討會還承蒙許多學者研究單位的惠予支持，才能順利地一路走下來。例如計劃總召集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所長，免費提供近史所會議室場地、茶水等等，替研討會節省下龐大的開銷。而陳所長本人幾乎每次都蒞臨主持研討會並參與討論，甚且常在會後宴請與會人士，進一步聯絡與會者的感情，增加對研討會的向心力。因此陳所長是研討會能夠持續成長發展下去的有力支柱。另外，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前系主任余文堂先生，是研討會第一年的計劃單位負責人，也給予研討會各方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面的支持，如八十四學年度第四、五兩次研討會是假臺中市興大學歷史學系舉行，余主任即動員系上人手，全力負起兩次研討會的所有籌備及善後工作。當然十次研討會的十六位主講人，以及參與會議的諸位學者、研究生，更是研討會之所以能夠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總之「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能夠在第一年順利完成，該感謝許多為它貢獻心力的人們。

八十四學年度的十次研討會中，進行了下列主題的討論：

- 第 1 場 張啓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84/9/30 民國四、五年間外蒙活佛冊封的難題
- 第 2 場 唐啓華（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84/10/28 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在國際聯盟的參與
張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國民政府時期中國與國聯的關係
- 第 3 場 陳三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84/11/25 許文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孫若怡（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大陸「中法關係史」及「法國史」研究現況
杭州大學「中法關係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報導
- 第 4 場 塚本元（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副教授）
85/1/20 北京政府時期外交中的中央與地方
〔探討主題：1.中央外交與地方外交 2.福州事件
3.湖南中日衝突案件〕
川島真（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班學生）
日本的近代中外關係研究現況
北京政府時期外交中的中央與地方
〔探討事例：1.雞公山避暑房屋案 2.關東大震災案〕
- 第 5 場 陳信雄（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85/1/20 十六世紀以來的中琉關係——離中歸日
陳鴻瑜（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台僑在東南亞的經濟活動及其文化效應
- 第 6 場 李國祁（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85/4/20 波茨坦所藏德國駐華大使館檔案
余文堂（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戰後德人對納粹暴政與戰爭責任的省思

- 第 7 場 柯福恩 (Stephen Craft) (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生)
 85/5/25 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的秘密美籍國
 際法顧問——摩爾 (John Moore) 與蘭辛 (Robert
 Lansing)
- 第 8 場 李朝津 (文化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85/5/25 評介 Stephen A. Schuker: 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 Plan
- 第 9 場 李仕德 (文化大學歷史所博士)
 85/6/15 英國與中國的貨幣改革，1934-1936
- 第 10 場 余敏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85/6/15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檔案介紹

另外，在第十次研討會後，也舉行了期末綜合討論，檢討關於研討會本年度的進行方式以及規劃下年度研討主題與進行方式等等事項。

由以上十次的討論會看來，「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的論題可謂包羅萬象，隨著主講人各自專精的研究領域而呈現多采多姿的豐富面貌。研究中外關係的學者，自然得精通一種以上的外語，但中外關係常不只是兩國之間的問題，尤其是國際互動愈來愈頻繁的近、現代中外關係往往牽涉多國，而研究者卻難以兼具多種語言能力，因此，借助研討會與會學者的交流，讓研究者得以突破語言與研究領域的障礙，自由悠遊於中外關係的各個研究層面。這樣的交流，屢屢讓與會者得以知悉同一事件的不同觀點，也得到他山之石切磋琢磨的機會。而各研究者亦可瞭解彼此正在研究的方向及新成果、新資訊等等。故「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不僅是跨校際、跨單位研究者的交流，它也讓研究領域的交流變得更迅速直接。

對於剛步入研究工作、尚在摸索研究主題的碩士班學生而言，常常對整個近代中外關係的時代背景、事件的來龍去脈都還有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般的迷惘，而與會的學者都是浸淫於自己研究的領域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前輩，他們的講題、討論內容，往往給予初學者很大的幫助，足以發聾振聵。學者們在研討會中的討論，正如同高人過招一樣，引導我們漸次探尋研究的方向，領略中外關係的高明與精微之處。

「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第一年的成果，如計劃主持人唐啓華先生向

教育部顧問室報告的總結所說的：「已使散佈於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研究近代中外關係的學者們，有一定期的研討會，形成一研究社群，交流研究成果，交換研究資訊，並引導研究生參與，對提升國內本領域之研究水準應有一定之貢獻。」

「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八十五學年度繼續獲得教育部顧問室補助七萬元，自九月起迄今已舉行的六次研討會如下：

- 第 1 場 李玉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85/9/21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
- 第 2 場 徐相文（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班）
85/11/9 從蘇俄的亞洲戰略看中共「一大」以前的建黨活動
- 第 3 場 黃宇和（澳洲雪梨大學歷史系教授）
85/12/7 瞎子摸象：400 年的中英關係
林雅青（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
抗戰初期英國對華外交，1937-1941
- 第 4 場 唐啓華（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85/12/28 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
李朝津（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對聯合國政策
- 第 5 場 雷俊玲（輔仁大學歷史系講師）
86/2/1 清末駐英使節劉錫鴻對西方的認識
- 第六場 吳翎君（花蓮師範學院社會教育系副教授）
86/3/1 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Co.)在中國，1870-1933

第二年的研討會在第一年的基礎上，仍將再辦六次研討會；並擬與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及中研院近史所聯合舉辦「外籍顧問與近代中國討論會」，時間將定於八十六年四月。過去傳統中外關係多集中在外交層面上，範圍比較狹小，而外人在近代中國常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中外交觸後的互動，這些顧問影響的比外交軍事更重要，尤其是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屆時希望能有更多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專家、學者，以及研究生來參與。

「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已邁入第二個年頭，而教育部補助的經費也提高到七萬元，希望研討會能在有心提振近代中外關係研究領域的諸位人士，以及整個「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研究社群的大力推動下，能夠長久穩健地進行，近代中外關係的研究方能欣欣向榮。

上網際網路 INTERNET 查詢近史所資訊

胡國台*

中研院近史所相關資訊已於一年多前放置在網際網路 INTERNET 之上，網址如下：<http://www.sinica.edu.tw/imh/>

目前再度完成資料更新。在上述網址可以查到近史所 Home Page（首頁）改版後的最新訊息。其概括內容有本所成立簡史、各學術組研究重點及成員主要研究領域、圖書館藏書、檔案館典藏史料重點說明、資訊室設備及功能，以及所內歷年來重要研究成果與本所出版品目錄簡介。

近史所出版品種類眾多，大約可分為史料、研究成果、報導性刊物等十餘大類。史料方面有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史料叢刊、口述歷史叢書、名人日記、史事日誌、目錄彙編等。同仁研究成果方面目前出版專刊、集刊、研討會論文集等。其他定期性刊物如《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口述歷史》、《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等，內容大要均可在本所網址中略見一二。未來也會根據最新資料，立即更新相關消息，敬請以 BOOKMARK 標記本所網址，以便隨時查閱最新資料。

郭廷以先生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與《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約二百萬字，近期內也將以電子文獻形式放置於 INTERNET 之上。讀者可以全文檢索方式查閱，快速方便。

上近史所網站最好以中文 BIG-5 碼視窗 CWINDOWS 3.1 或 CWINDOWS 95，再配上 BROWSER 瀏覽器觀看。如果沒有中文系統可至下列網址下載顯示 BIG-5 碼軟體，如南極星(NJSTAR)及亞洲通(ASIA SURF)：

<http://www.njstar.com.au> 或 <http://www.dynlab.com>

NJSTAR 南極星是由澳大利亞一家軟體公司所發展的亞洲語言顯示系統，有中文簡體 GB 碼、正體（繁體）BIG-5 碼、日文 JIS 碼與 SHIFT JIS 碼、韓文 KSC 碼等多國語言。優點是公用軟體，但是字形不夠美觀。亞洲通(ASIA SURF)則是台灣華康公司所開發，字形平順，顯示快速。試用期為十五天，期滿以後得付錢購買正式版本。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資訊室主任



史料介紹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近代中國研究與典藏

——倫敦地區史料介紹之二

呂芳上*

一、亞非學院的創立與中國研究

造訪過牛津、劍橋大學的人，再到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或政經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感受會是相當的不同。牛津多數學院的門面是冷硬的巨石浮雕，進入堂奧之後的校園則別有一片天地；劍橋的學院錯落有致的散布在清澈的康河(River Cam)兩旁，垂柳、綠地、小橋、流水，簡直如詩如畫。亞非學院和政經學院落在倫敦市的心臟地帶，校區就是街坊，新學生第一次找教室，恐不免如入迷宮。但它緊鄰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國家畫廊近在咫尺，唐寧街(Downing Street)也在不遠，造就所成，一個曾是帝國亞非殖民地官僚的養成所，一個是英國十九世紀下半葉有名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發祥地。

倫敦大學主要是由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亞非學院和政經學院組成。最早設有漢學講座的是大學學院，接著是國王學院，這得力於傳教士基德(S. Kidd)和出使過中國又通漢語的史當東(G. T. Staunton)的努力。儘管十八世紀英國與亞非關係日益密切，但帝國與被殖民地區，則衝突迭起，直到二十世紀初葉(1908)，曾任孟買總督且當過英國學術院與皇家亞洲學會主席雷依(Lord Reay)主持下的委員會，才正式向政府部門提議設立一個以東方學研究為主的常設機構。歐戰時期(1916)以倫敦研究所(London Institute)為基礎，擴充的東方學院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成立，次年開始招收學生，論其創校初衷正是：「顧慮到與人相處，必得先瞭解」的實際需要。因此初期學院重點放在亞非地區各民族語文、歷史、宗教和習俗的研究上，兼具了實用與學術研究的雙重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8)名稱正式改爲亞非學院，成了倫敦大學的重要成員。1973年坐落在羅素廣場旁 Thornhaugh 街的學院大樓完工，亞非學院才開始有了像樣的新家。

在全世界算來也是少有的以亞洲與非洲作爲研究重心的亞非學院，目前設十四個系十個研究中心。學系的名稱分別是非洲語言與文化系、近東與中東語言文化系、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南亞語言與文化系、東南亞及群島區語言與文化系、人類學與社會學系、藝術與考古系、經濟系、政治系、歷史系、地理系、法律系、語言系及宗教研究系。其中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包含中國學(含港、台研究)、日本學、西藏學、蒙古學和佛教學等專業科目；非地區性的學系又多半設有中國相關的研究課程。研究中心多屬科際整合和學院與外界合作的研究機構，音樂研究中心、發展研究中心之外的地區性研究中心，包括非洲、近中東、南亞、東南亞、韓國、日本及中國研究中心，另加一個當代中國研究所。全學院有亞非問題專家兩百人，每年有來自世界八十個國家的學者和學生到訪。根據1995年的統計，全學院大學部學生二千一百人，研究生六百五十人，是頗具地區性研究特色的學府。

亞非學院的確有不少地區性的專家分布在不同的學系中。以中國研究而言，在人類與社會學系開設「從漢到文革時期中國疾病、醫藥與社會」課程的 Dr. Elisabeth J. Croll，和歷史系的 Dr. Chris Cullen 同爲中國醫學史專家；掌理著名的大衛中國美術收藏品(宋、元、明、清藝術品及圖書館)(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的藝術與考古系 Miss Rosemary E. Scott 和 Prof. Roderick Whitfield，是研究中國陶器、漆器和敦煌佛教藝術的學者；東亞語言文化系的 Dr. Sarah K. M. Allen 懂得甲骨、金文，也是先秦思想史的名家；Prof. Hugh D. R. Baker 精通廣東話，對華南地區的社會與家族有精湛的研究；歷史系的狄德滿博士(Dr. R. G. Tiedemann)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史，對群眾運動、農民運動、中共革命都有興趣；Mr. Philip T. Denwood 之於西藏文化、Alan J. K. Sanders 之於蒙古文化社會、Dr. David Morgan 之於蒙古帝國歷史均有特殊造詣；Dr. Paul M. Thompson 精研早期中國經典，又醉心於典籍的電腦化，是東亞語言文

化系的中國語文專家。在歷史系和宗教系開課的 Prof. T. H. Barrett 對唐代道、佛二教的研究更是知名學者。至於政治、經濟、法律各系的學者，多半與當代中國各有一方的專長，他們會開設像「中共法制研究」、「中國、港、台投資與貿易」這樣的課程，便是兼具了學術與實用的雙重目的。

隸屬於亞非學院，創辦於六〇年代的當代中國研究所(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和 1992 年成立的中國研究中心，重點都放在中國現狀的研究上，他們與英國政府相關部門保持聯繫，出版「當代中國研究叢刊」，國際知名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就是他們的重要出版品。

亞非學院會成爲中國學的研究重心，另外一個因素是他們擁有相當豐富的中國資料收藏。

二、亞非學院圖書館的近代中國圖書

1973 年落成的亞非學院新建大廈，是以圖書館爲中心的六層樓建築。二樓中庭設有可容一百二十人的主閱覽室，扶級而上的四層塔形設計，分藏亞非各種語文資料。另外的四百八十個讀者座位散布在各層的各個角落。這一圖書館原始設計是容納一百萬冊的圖書，目前已有八十萬冊的收藏，其中期刊有四千四百種，另有地圖四萬五千張、照片二萬二千張、幻燈片四萬張、視聽資料一千四百件。這些收藏是亞非學院自己所標榜「以語言、文化平衡；求古典、現代並重」的亞非研究本錢所在。

圖書館的三樓和四樓至少有十七萬冊的中國圖籍，近千種的中文期刊，加上爲數可觀的檔案，構成爲倫敦地區近現代中國資料的最大收藏地之一。這些資料最早來自「倫敦研究所」的收藏，稍後併入了大學學院圖書館和國王學院圖書館的中國資料。而這些收藏又有幾個引人注意的來源：一是清末最早到達廣州(1807)的英國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收藏，他曾編著《漢英字典》、《廣東省土話字彙》，且翻譯過聖經。在華期間他注意中醫和科學書籍的收集，加上百餘部明刊善本書，1823 年攜回英國，由後人捐給大學學院，成爲亞非學院的最早中國典藏。接著東方學學者、古幣收藏家 William Marsden 的收藏也由國王學院移入。清末民初曾任英駐華公使達十四年之久的朱爾典(Sir John N. Jordan)以 F. Anderson 捐贈一萬兩白銀爲基金，購置的一萬二千五百冊中文書，使亞非學院圖書館的中國資料大大增色。在

1934年出版《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自命為滿清遜帝、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忠實僕人與教師」的莊士頓(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返英後曾任倫敦大學漢文教習六年，退休過世後，一萬六千多卷藏書捐入亞非學院，其中以佛教典籍及二〇年代的文學資料為主，其中不乏莊士頓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知識分子交往，因而獲得的簽名贈書。二次大戰後，W. Simon主持館務，開始對中文圖書作系統的購置與整理，加上福特基金會資助、McAleavy對十九、二十世紀通俗文學與社會風俗資料的刻意蒐集，亞非學院的中文收藏因此更形豐富。

如果從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角度作粗略的觀察，亞非學院圖書館的收藏引起筆者注意的有下列中英文資料：關於晚清十年的改革，政府出版品如《學部官報》(1906)、《政治官報》(1908-1909)、《商務官報》(1906-1909)和《外交報》(1903-1908)，均有不完整的收藏；1907年的《直隸教育雜誌》、《江寧學務雜誌》，揭載不少清末新教育的改革文獻。1909年《各省財政說明書》、《江蘇省諮議局籌辦處報告書》是各省立憲活動難得的原始資料。民國初年新舊思潮激盪下不同派別的刊物，例如猶太人哈同(Silas Aaron Haroon)在上海辦的倉聖大學，出版了《廣昌學會雜誌》、陳煥章主持下中國孔教會的《昌明孔教經世報》(1920-1925)，明顯代表保守思潮的一面；中國科學社楊銓主編的《科學雜誌》(1916-1920)、中華革命黨的《民國》雜誌(1914)、梁啟超的《大中華》(1915-1916)、舊國民黨人的《正誼》(1915)，汪精衛、蔡子民、李石曾主編的《旅歐雜誌》(1916-1918)，都表現不同思想、不同立場的言論。五四時期浙江省教育會，由沈仲九主編的激進刊物《教育潮》(1919)，三期完整如新的擺在書架上，這是筆者撰寫學運史時，多年苦苦尋求的雜誌，踏破鐵鞋卻在此發現，那種感受與多年前尋找台灣革命同盟會的出版品《台灣民聲報》，屢尋不獲，卻不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同一的「喜悅」。亞非學院圖書館期刊收藏的另一特色是佛學期刊和通俗文化讀物，前者如太虛主持下杭州覺社編印的《海潮音》(1920-1937)，有完整的十八卷本，上海中華佛教會出版的《佛教月刊》(1913)、《佛教叢報》(1911-1914)，北京出版的《佛心叢刊》(1912)、《佛化新青年》(1923-1924)等，都是比較引人注意的早期佛教復興運動刊物；後者如《小說大觀》(1915-1916)是包天笑主編的刊物，《紅》雜誌(1920-1924)、《紫羅蘭》(1925-1930)、《遊戲世界》(1921-1923)、《戲劇》(1921)，分由鄭振鐸、周瘦鵑、劉大悲等人主編的刊物，過去是

難于入「流」的文學創作，現在則被看成通俗文化研究重要資料的一種。至於地區性的書籍，如《廣州市政概覽》(1919)、《廣東單行法令彙集》(1921)、《廣州市政例規章程彙編》(1921)等，應該是國民黨人創建「新廣州」時期的重要文獻。類似史料的發掘，只有待諸有心人了。

亞非學院圖書館中還收藏了一批清末民初有關中國的英文刊物，除了1912年起就有的中國年鑑(*The China Year Book*)，1840年開始有的 *Toung Pao* 之外，屬於教會的有 *China Recorder*(1869-1936)、*China's Millions*(1875-1964)兩種，相當完整。英國人在華的代表性刊物是《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刊行近一個世紀(1850-1940)；*London and China Express* 中文名字叫《新聞紙》，1858年出刊，至1922年改名為 *Chinese Express and Telegraph*，直到1931年才結束。還有一份《華洋通聞》(*Celestial Empire*)是1874年7月至1927年3月上海出版的英文綜合性刊物，*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1923-1937)則顯然偏重在科學與藝術的討論，還有一份美國亞洲協會(American Asian Association)在紐約出版的 *Asia*(1917-1942)，不乏中國問題的文字。這些英文期刊除提供近代史研究的材料外，對洋人中國觀的考察和認識中國過程的研究，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三、亞非學院有關中國的檔案

英國學術界研究風氣雖也不免受美國影響，重視理論，但更強調檔案的運用，舉一個例子來說，畢可思博士(Dr. Robert Bickers)1992年在亞非學院的博士論文：〈1928至1931年間英國對中國與中國人態度的改變〉，這樣一本不以運用檔案為限的博士論文，卻使用了十九個機構七十九種公私檔案完成的。這自然與英國人重視而且有豐富的檔案收藏有關。

亞非學院圖書館內藏有兩千種以上的手稿，和超過一百種以上亞非語文的著作，收藏可謂琳瑯滿目。有關近代中國的收藏，至少在教會、海關、外交與商業方面的檔案，具有絕大的價值和特色：

(一) 教會檔案

這裡所擁有的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英國教會在亞非地區的傳教活動材料，是大英圖書館以外的最大收藏地。全部6,500盒文件，包含會議紀

錄、函件、報告等，並有 18,000 張照片、二萬種包括回憶錄、歷史、譯作、教會期刊、年度報告等出版品。主要的教會組織有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衛理公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即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前身)、美拉尼西亞聖公會(Anglican Melanesian Mission)和英國佈道會教務會議(Conference of 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ies)等。和中國有關係的教會和傳教士個人檔案有十三大宗，分述如次：

(1)英國佈道會會務檔(Conference of 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ies)，1912-1960 年間，常務會議紀錄及文件，國內教會相關文件、地區性文件，醫務及連絡各組織文件。共 621 盒。已製成微捲。

(2)世界教務會檔(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1795-1970 年，包括倫敦教會在華傳教活動文件、會議紀錄、通信、報告、個人文件，另有 11,000 張照片。其中包含了馬理遜(R. Morrison)與理雅各(James Legge)的文件，共有 2,358 盒。已製成微捲。詳細的目錄可參考 *The Archives of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n Outline Guide*, SOAS, 1973。

(3)英國長老教會檔(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and 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1847 年創立，1900 年之前的資料不多，大半是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長老會教務檔，有通信、報告、照片及出版品，共有 247 盒。

(4)中國內地會檔(China Inland Mission)，包括 1872-1951 年在倫敦辦事處的會議紀錄、財務文件；1886-1947、1951 年在中國傳教協會會議紀錄、傳教士名錄，一些通信和個人文件。重要的出版品有 *Chinese Missionary Gleaner*, 1853-1859 及完整的 *China's Millions*, 1875-1964。還有大量的照片。和這個教會相關的中國福音教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James Hudson Taylor 創辦，有它的傳教活動文件，1850 到 1860 年代的教務紀錄，另 6 盒是 Taylor 創辦的芝罘(煙臺)學校資料。全部 161 盒，394 卷。

(5)Aladys Aylward 檔。在華女傳教士，1931-1951 年間在山西傳教檔案，有信件和紀念品，一盒。其人的生平可參閱 Alan Burgess, *The Smolt Woman*, N. T., E. P. Dutton, 1957。

(6)Laura Beckingsale 檔。倫敦教會赴華女傳教士個人檔案，有 1911-1912 年間的信件，以日記紀錄函形式，描述辛亥革命時在武漢的見聞。

一盒。

(7)John Baker Carpenter 檔。傳教士個人檔案，1899-1921年駐福建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代表，1915-1920年執教於聯合神學院，有1899-1926年間相關的信函、文件及照片，共一盒又二宗檔案。

(8)William Evans 檔。1883-1911年擔任 Chinese Protectorate Service 主持人時，傳教活動相關的函件。

(9)Geller 日記。包括 Wilson Herbert Geller 與 Mabel Geller 兩人的日記。Wilson Geller 為華中地區倫敦佈道會俗世福音派的傳教士，有1901-1934年間的16本日記及少數地圖。

(10)James Legge 檔。出生於蘇格蘭的漢學家理雅各，1839年由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派往馬六甲任英華書院院長，1843年隨院遷往香港，1873年返英，1875年出任牛津大學首任漢文講座。在香港時與王韜有交往，英譯過四書、五經。1843-1867年間的文件，包括他與妻子 Hannah Legge 的信函。共一盒。

(11)Ebenezer & Mabel Mann 檔。1903-1944年 Mann 夫婦為中國內地會在江蘇教務主持人，1921年 E. Mann 受命為江蘇地震後之難民救濟會主席，相關文件有一盒一宗。

(12)Scott 家族檔。Rev. C. P. Scott 與 Rev. P. M. Scott 父子，原屬1872年建立的英格蘭華北教會，後改名為華北與山東教會(The 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傳教士，包括通信及出版品 *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 Quarterly Papers*；另有 P. M. Scott 子 M. W. Scott 服務於上海太古洋行(1934-1937)時的日記。共三盒十二卷。

(13)William Gawan Sewell 檔。1924年與其妻 Hilda 赴華主持 Friends Service Council，後來在成都任華西大學教授，抗戰時期住在香港。檔案包括1842-1980年間的信件、日記、書稿及照片等。

(二) 海關檔案

由於清廷對外戰爭的失敗，1850年代外人即開始介入中國海關事務，1859年便有了第一位洋人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到了1863年11月，擔任第二任總稅務司達四十五年之久(1863-1908)的赫德(Sir Robert Hart)上台後，中國近代海關制度完全建立。中國人對這一由洋人建構成的新式海關制度，似乎又愛又恨，一方面不能不承認一套規範化、技

術化、高效率的海關嚴密制度，使稅收增加，培育不少人才，建立起一系列近代新式的港務設施，的確有別於傳統包稅制度與陋規橫行的情況；一方面又視之如「國中之國」，「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實際執行人」。顯然中國近代海關的歷史需要由歷史檔案中尋求真相。亞非學院圖書館目前存有三宗重要海關檔案，詳細內容除可參考亞非學院 1973 年出版 *Paper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 1860-1943* 外，簡述如次：

(1) Bowra 文件。Edward C. M. Bowra，1860 年至 1873 年在中國海關服務，相關的文件有日記、通信、照片及剪報等；Cecil A. V. Bowra 於 1886 年進入海關任職，至 1923 年退休，他在 1886-1923 年期間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署秘書長時期的文件，共有四盒七卷。

(2) Robert Hart 文件。就其文件性質而言，應該可以正名為〈赫德與金登幹密函〉。1863 年赫德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後，於 1874 年任命他的老友金登幹 (James Durcan Campbell) 為「駐倫敦辦事處」的負責人（頭銜叫「無任所秘書」Non-resident Secretary）。赫德對金登幹信任至專，舉凡公私事務無不全權委託辦理，習慣上赫德每週一函致金，金也每信必覆，二人書信往來數十年如一日。這些保留下來的往來信件，1975 年曾由費正清在哈佛輯印出版，名曰：*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不過這部書唯獨未收入流散在亞非學院的 1874-1877 及 1898-1906 年部分的信件（共有七盒）。這些原始信函對中國海關及赫德的活動，當然有極大史料參考價值。所幸 1990 年由南京二檔館及北京社科院近史所合編，陳霞飛主編的《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已注意及此。把中國海關所存赫、金信函，補入了亞非學院這一宗檔案，合併整理，編譯成書，相信已把這一宗重要的檔案全數收入；赫、金往來函件，能以較為完整的面貌提供史學界運用，自是幸事。

(3) Frederick Maze 文件。梅樂和係赫德的外甥，1891 年進入中國海關，歷任中國各口海關幫辦、副稅務司、稅務司。1928 年國民政府任命為總稅務司。1941 年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在上海一度被日人拘禁，1943 年獲釋後赴重慶，仍為總稅務司，同年五月辭職返英。這宗檔案包含 1911 至 1943 年期間梅氏個人及官方信函、報告和相關文件，共有六十三卷。已製成微捲。

(三) 外交檔

近代中英關係密切且複雜，外交文書多半存於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 PRO)，不可忽視的是外交官個人文件，有的幸得保留，有的則下落不明。例如 1922 到 1926 年出任駐華公使的麻克類(Sir Ronald Macleay)，1943 年過世後，他太太竟把他的資料全部毀棄。麻的下一任駐華公使藍浦生(Sir Miles Lampson)比較幸運的是留下了一份日記，存於牛津大學的東方學院(St. Antony's College)；20 年代英外務部長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的個人文件一部分在 PRO，大部分在伯明罕大學圖書館。可見個人文件，流落情形不一。在亞非學院圖書館藏有五位與中國有關的外交官個人文件，分述如次：

(1)Sir John Mansfield Addis(1914-1983)檔。1938 年入外務部，1954-1957 任北京大使館參事、總領事，1960 年代出使東南亞，1972-1974 年出任駐北京大使。內容有通信、研究資料、筆記本、照片，共三十五盒。

(2)Sir Chaloner Alabaster(1838-1898)檔。在鴉片戰後到太平天國時期，擔任英在華學生譯員。1869-1873 年任駐滬副領事，後升任駐廣州總領事。內容有通信、文件、日記(1854-1890)，一盒。

(3)Patrick Devereux Coates(1916-1991)檔。抗戰時期擔任過在華領事，著有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Oxford, 1988)。檔案內容有文件、通信、研究筆記等，五盒。

(4)Sir Alwyne George N. Ogden(1889-1981)檔。1912-1948 年間曾在駐華使館服務。1941 年任天津總領事，1942-1945 在昆明，1945-1948 年在上海，均任總領事職。文件內容有通訊及相關資料，對中國政局有反應。共十八盒。

(5)Sir John Thomas Pratt(1876-1970)檔。1898-1924 年服務於中國領事處，1925-1938 任外務部遠東事務顧問，1939-1941 任新聞部遠東司長。他 1940 年之前的文件，不幸毀於二次大戰期間的倫敦大轟炸，現存多為 1941 年後的文件和出版品，包含他反對英國捲入韓戰文件及與其妻 Lady Pratt Edith 的通信。三十五盒。

(四) 商業檔案

商業活動是英國在亞非地區殖民事業的重要一環，在華英商的事業，往往隨著政治勢力而伸展，太古洋行、匯豐銀行，一如英商在馬來的 Guthrie

Corporation,在印度 Sir William Mackinnon 的印度輪船公司,都是當地熟知的英國大商號,他們的文件往往因為個人的捐贈或公司的刻意保存而獲得流傳,亞非學院的三宗文件就是例證。

(1)太古洋行檔案。John Swire 於 1832 年建立商號於利物浦,開始對華的商業活動,1870 年總公司遷移到倫敦,稱為 John Swire & Sons Ltd. 太古洋行在中國的龐大企業包括中國航運公司(1872 年創辦,即國人較為熟知的太古輪船公司)、太古糖廠(1881)、太古造船及機械廠(1901)、天津駁船公司(1904)、東方漆料廠(1934)等。文件的內容包括 1869-1967 年間通信、會議紀錄、法定文件及其他文件。全部有 621 盒,166 卷,該檔案規定三十五年以上的文件才予開放。詳細的內容可以參考 Elizabeth Hook, *A Guide to the Papers of John Swire & Sons Limited*. SOAS, 1977。

(2)匯豐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檔案。這是 Sir Charles Stewart Addis 個人捐贈的文件。他在 1880 年加入倫敦匯豐銀行工作,後來調到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緬甸、印度等地。1904-1921 年間任倫敦辦事處經理;1918-1932 出任英格蘭銀行總裁,1929-1932 年出任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副主席。內容有早期匯豐銀行相關文件、個人日記、通信、照片等,細目可參考 Margaret Harcourt-Williams, *C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Sir Charles Stewart Addis*, SOAS, 1986。有關匯豐銀行的主要檔案據說已由香港移回倫敦,雖說早在 1965 年就已有的學者 Maurice Collis 利用該檔案寫過一本書: *Way Foong: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operation*,不過這方面仍有大量資料等待開發和運用,結果顯然是可以期待的。

(3)英商中國協會(China Association)檔。1889 年創立的商人利益團體,更明白的說是一個與中國、香港、日本有關的英國商業利益者代表所組成,以遊說及維護並謀求其本身利益的商業聯合組織,包含 1889 至 1969 年間該協會會議紀錄、報告、通信和文件,共一一六盒。

四、結語

亞非學院圖書館的歷史和藏書的確不能和牛津大學的波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相比,波德林圖書館有五、六百年的歷史,有五百萬冊以上的藏書,申請閱覽證還得遵守傳統老規矩:先宣誓再給證。亞非學院

圖書館歷史沒那麼長，圖書的數量也沒那麼多，入庫當然沒傳統的老套，這樣一個提供教學與研究的開架式圖書館，藏書有一定特色，借閱、影印手續也還算簡便。平常開放的時間由上午九點到晚上八點四十五分。暑假則提早到下午五點打烊。檔案部門每天四次提件，上午十點、十一點半，下午二點及四點半，有圖書館覽證的就有權利查閱檔案，提借、歸還都還稱方便。委託影印文件或製作微捲價格昂貴，自不在話下。

亞非學院是具亞非研究特色的學院，圖書典藏也以亞非有關的資料為主。相當數量的中英文圖書和期刊，加上為數可觀的中英關係史料，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學者願意駐足的地方。對東南亞研究起步已近一個世紀的學院來說，它的資料典藏、研究成績，恐怕也是很少地方能夠企及的。

本文參考下列資料：(1)C. H. Philip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17-1967*, SOAS, 1968; (2)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Postgraduate Prospectus*, 1996; (3) Rosemary Seton, *Guide to Archives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SOAS, 199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 與整編概況（十四）——台糖檔案介紹

姜正華*

一、前 言

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亞於一般俗稱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而甘蔗和甜菜是製糖的兩大原料，就中又以甘蔗為最。甘蔗原產於亞洲東南部到印度之間，後傳至中國。我國甘蔗栽培的記載可溯始於《楚辭·招魂篇》：「臠繁炮羔，有柘（柘：蔗）漿些」，當在春秋戰國年間。甘蔗製成砂糖乃見於唐太宗時，洪邁《容齋五筆》卷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六：「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元時汪大淵在《島夷志略》琉球條記載台灣原住民「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是知台灣甘蔗的栽培應在元朝至正年之前。直到明末，隨著大陸移民攜帶蔗種來台種植的漸次增加，始有製糖工業，惟此時栽種地區僅限於現今的高雄以南。

1624年，荷蘭人入據台灣，經由荷政府獎勵，蔗糖產量大增，遂使嘉南平原得以開發。蔗田面積幾佔第一大農作稻米的三分之一強，並輸出到日本和波斯。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屯田開墾，推廣植蔗，改良栽培及製造方法，台灣糖業乃日趨發達。到了18世紀初，糖已成為台灣對外出口的大宗，主要輸往日本、波斯及英國。1895年的「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灣予日本，由於日本的糖長期仰賴輸入，而台灣地理條件又適種植甘蔗，便在1900年底成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次年，採納新渡戶稻造的〈台灣糖業改進意見書〉，確定台灣糖業政策及其方針；從而台灣糖業進行了一次全面性的大改造：引進第一個新式製糖工廠設立於橋子頭（今高雄縣橋頭鄉）、改良製糖方法、原料採行區域供給制度，台灣糖業自此步入科學化、效率化。新式糖廠廠數最高時為1938至1939年的49所，其後合併成42所，¹隸屬台灣、大日本、明治、鹽水港四大株式會社，使台灣糖業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但隨著1943年太平洋戰事的日益吃緊，兼以日軍又佔領南洋各主要產糖區，致使食糖過剩、米糧不足。在戰局的考量下，將糖業重心移至南洋，台灣則以生產稻米為主，生產量因此被迫削減而呈衰退現象。戰事末期，各糖廠廣遭盟機轟炸，42個糖廠被炸毀的就有34個之多，其中有18個糖廠受損嚴重，未受損害者僅8廠。²

二、台糖沿革與組織

1945年8月15日台灣光復，9月1日在四川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同年11月間組設「糖業監理委員會」，監理日人經營之四大製糖會社。1946年4月奉令改組為「糖業接管委員會」，展開接收工作；旋奉

¹ 盧守耕，〈台灣之糖業及其研究〉，台灣銀行金融研究室編，《台灣之糖》（台北市：台灣銀行出版，民國38年2月），頁2。

²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編，《台糖五十年》（台灣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民國85年5月），頁23。

資源委員會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令飭籌組「台灣糖業公司」，並於 1946 年 5 月 1 日正式成立。由資源委員會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辦專營，總公司設在上海，從事代理行政院辦理銷售接收日產台糖，在台灣另設辦事處。台灣各地亦在 1946 年 8、9 月間將四個株式會社改編成四個區分公司，42 個糖廠合併成 36 所。1947 年 1 月因事實上需要將總公司改設於台北市，原上海之總公司則改設為辦事處。此時依據公司法之規定，暫定名為「台灣糖業有限公司」，直至 1948 年 9 月 3 日正式召開股東大會，並報奉工商部核准登記，正名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至此台糖名稱正式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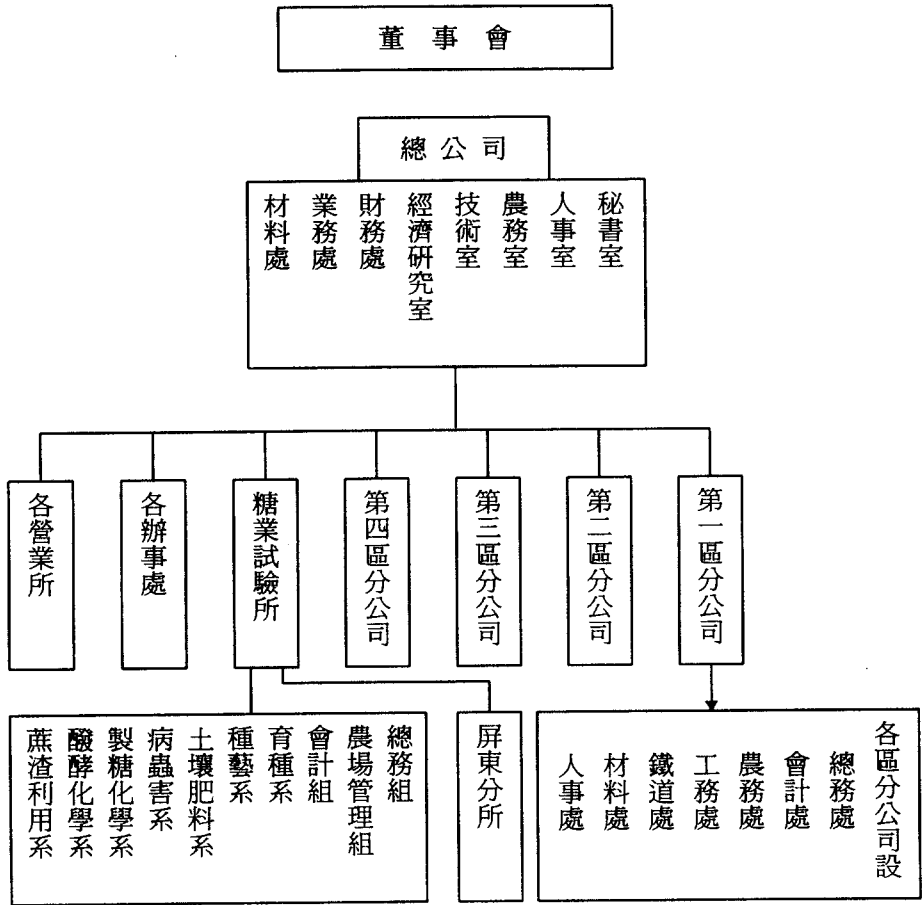
台糖公司成立之初，其組織設董事會，決裁公司內各項重大政策和決策。下設總公司，置總經理一人，秉承董事會決定方針，綜理公司一切用人行政及其他事務。總公司內設秘書、人事、技術、農務、經濟研究五室；財務、業務、材料三處。因業務需要，總公司下轄四個區分公司、一個糖業試驗所、各辦事處及各營業所。各區分公司設有總務、會計、農務、工務、鐵道、材料、人事等處。第一區分公司設於虎尾轄 14 廠，第二區分公司設於屏東轄 10 廠，第三區分公司設於總爺轄 8 廠，第四區分公司設於新營轄 4 廠和虎尾、新營、曾文等 3 個甘蔗示範場。各糖廠下又置總務、會計、農務、工務、鐵道五課及醫務室；另示範場設事務、農務、訓練、研究等組。糖業試驗所則設總務、農場管場、會計三組和育種、種藝、土壤肥料、病蟲害、製糖化學、醱酵化學、蔗渣利用七個系；而在糖業試驗所下設一個屏東分所。（參見圖一）

公司經營範圍：一、原料甘蔗之收購及原料農場之經營；二、食糖之製造及銷售；三、副產品之製造及銷售；四、原料及成品之儲存運輸；五、投資於有關糖業；六、其他有關台灣糖業。此期間各廠在自力更生，東移西補的努力下，迄 1947 年底均次第完成修復加入生產，且產量日增。

1947 年 5 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台灣省政府，於 1949 年 6 月成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資委會共同經營台糖公司；直至 1952 年生管會併入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資委會亦在 1952 年 9 月裁撤，另組國營事業司（亦即目前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之前身）管理。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國際糖價的起伏不定，為確保經營和發展，遂於 1950 年 7 月起調整公司機構，將各區分公司撤銷，改設台中、總爺、虎尾、新營、屏東等五個糖廠，下各轄數個糖廠。另甘蔗示範場由總廠接收，改為蔗作改良

場；糖業試驗所及分所則照舊。

圖一：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系統表（1948年）



資料來源：「台灣糖業公司組織章程」，資委會檔 24-20-02 1-1，中研院近史所藏。

此外，重整一切規章制度，予以統一；人事、會計、財務、銷售、生產計畫、物料調度，全部歸納總公司指揮。且為降低成本，一舉裁遣五千

名員工。另從事土地的高經濟利用（山地和濱海鹽分地從事蔗作），推廣畜牧養殖，及試種甜菜製糖。又在已停產或相關廠區增設酒精、酵母、蔗板、抗生素、鳳梨等副產品加工業的多角化經營。如此，經營和改善體質的結果，使台糖成爲國內數一數二的大企業。同時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進而在國際糖業界佔有一席之地，爲國家賺進不少外匯。甚至有部份東南亞國家如越、寮、泰等國，要求派員到各該國家去協助設立糖廠。

但 1966 年起國際糖價慘跌，以及國內工資不斷上漲，再加上台灣經濟型態由先前以農業爲主，轉型到以工業產品外銷爲導向，至此糖業失去它在台灣原有的經濟地位。1972 年後國際糖價再次回升，也讓台糖有了再創高峰的機會；不過，自 1980 年開始國際糖價又陷低迷，砂糖嚴重滯銷，畜產豬隻過剩，價格猛跌，使台糖虧損連連，只得把糖廠一間間撤銷，並出售已閒置不用的土地來維持。1985 年後，台糖採內銷爲主外銷爲副的緊縮生產計劃，從而糖業在台灣已成爲夕陽產業，自是不得不然的結果。

三、台糖檔案概述

近史所所藏台糖檔案可大分屬資委會及國營會兩時期。分述如下：

（一）資委會時期：48 函（1946-1952 年）

內容包括：組織章程；移交、接收；鑿井工程；排水溝、橋樑工程；房舍工程、工程預算、決算；客車、甘蔗車工程；鐵道工程、鐵路運輸路線圖；工程圖；借購土地及土地糾紛；交換、購買、出租房舍及印信；防空措施、防空洞工程；固定資產、器材耗廢；砂糖及副產品損耗；眾利輪爆炸有關台糖損失、石灰原石損耗；捐助、捐獻砂糖；人事糾紛、出國考察、簽證、查庫報告；薪津、福利、辭職、免職；考績、聘派、任調；員工被捕、職員貪污、懲戒；人事表冊、職員名冊；會計人員調查表；台灣省國防科技人才調查登記表；工作月報；工作報告、營業計畫；業務報告、產銷報告；生產、銷售報告、外銷；投資設廠、關閉糖廠；購置器材、物品；交換、讓售、捐贈器材；蔗作、糖收購、糖結帳；會議；業務；圖書館調查登記表、國防工業之化驗室、民營工廠調查表；預算、概算、決算；盈餘繳庫；股票、股息、外匯、借款、墊款、呆帳；資產、收支明細

表、稅率、稅捐；貸款、各項專款；會計、財政、會計報表；農機經營管理處財物狀況等。（可參見「經濟檔案函目彙編」第二冊）

（二）國營事業司：521 宗（1952-1968 年）

1.會議卷：股東大會；董監聯席會議議程及紀錄；會議檢討資料及紀錄；國際糖業理事會文件；參加國際糖業協會、會議、報告及參考文件；參加聯合國糖業會議；國際糖業協定。

2.人事卷：所屬各單位職員 43、46-49 年度考績；各單位員工概況月報表及人事；所屬各單位 43、46、47、54 年度職員員工退休；所屬各單位 43 年職員工員遣散費計算、互助金、肺病療養補助費清冊；所屬各單位員工宿舍現住人名冊；獎懲考核辦法；延聘外籍技師來台簽證及考察；聘派人員技術訓練。

3.法規卷：糖業法綱要草案；內銷糖處理辦法；保護蔗糖原料及辦法；砂糖耗損相關辦法；農貸辦法；收購蔗農糖牌價計算辦法；鐵路航運相關法規；各項獎勵辦法；歷年分糖辦法暨契約規程；46-54 年期蔗農申請自用及內銷糖辦法及同期蔗農糖寄存規則。

4.業務卷：糖業政策；台糖鐵路；溪湖糖廠火車事故；酒精管制及價格調整；糖業報告質詢及解答；懷特公司考察台糖公司報告；台灣糖業調查考察報告；糖情週報；菲律賓、馬來西亞、巴西糖業報告；金瓜石礦山及其外圍地區探勘報告；增產改進各種建議；56、57 年度公司會議報告資料；業務檢討會議；外銷業務報告；研商外銷運輸；國際糖業動態及銷售購糖情形；供售伊拉克砂糖；台糖輸日案；申請核撥外匯購料；外購器材結匯申請表；購料訂單及購料合約；中日砂糖貿易合約協議等情形；各項合約輸入物品清單；申請美援；外匯收支統計；華僑及外人依照自備外匯輸入物資表；捐贈各國物資；砂糖生產輸出消費存量表及輸出國別表；爭取輸美砂糖配額；軍事單位配糖；味精業所需糖蜜應候核定分配；味精業糖蜜原核配；高雄副產加工廠；彰化副產加工廠主要蔗板產銷存量月報表；供應省內造紙工業所需蔗渣數量；國際糖業動態及銷售情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協助我設立植物性代乳食品工廠；與美國氰胺公司合作製造抗生素副產品。

5.總務卷：興建倉庫問題；倉庫、廠房、房舍等租借情形；中漁、中紡兩公司出售農化廠招租；農化廠劃歸台糖公司兼管經營；各糖合併、籌

設調整情形；糾紛案；訴訟案；陳情案；處理呆廢物料、推銷塑合板案；各糖廠天然災害報告表及照片；各糖廠八七受災員工申請補助名冊及證明書；玉左鐵路工程施工竣工圖；台東縣池上設置糖廠；48-51年期貸配契約及蔗農棧單糖提貨限期；農貸案；擬設立台糖糖業協會繼受財團法人武智紀念財團財產；收購工礦公司豐原紡織廠及台糖高雄副產加工廠轉移民營；各項工程合約及蔗農保險約定書；各項工程及費用負擔；硝氨水施肥計劃工程完工請審計部覆驗；各廠參加地方公會組織及投資合作；台糖公司暨所屬單位現有車輛調查表。

6.計劃卷：43-55年期生產計劃表；十年更新計劃第一、二年計劃；東台灣鳳梨廠計劃；糖業試驗所四年研究計劃；深井工程計劃及施工報告；各項計劃報告；停閉一部份糖廠計劃。

7.助外卷：擬派員赴寮協助設立糖廠報告書；與越南政府合建糖廠；越南政府請協助設立糖廠；與泰國蕭松琴合作在泰國建立糖廠；協助泰國糖廠發展、技術訓練等工作報告；關於新加坡經濟開發委員會接洽對星洲合作投資建立糖廠；馬來亞僑商程壽齡籌組糖廠請予協助。

8.會計卷：各糖廠工程合同預算申請書及工程圖；會計檔案銷毀申請表；會計月報表；45-48年附屬單位預算書；會計工作初步視導報告；各糖標售剩餘物資底價表；撥配砂糖平抑糖價；糖價問題研究；銷日糖價；課稅、進出口稅制等問題；41-55年收購蔗農砂糖保糖價格；固定及土地資產重估價值表；國營事業耕地放領調查報告表；種畜場計劃暨經費概算；借入款月報表。

9.土地卷：各糖廠出售及收購土地；大肚山開發；陽明山計劃工程；各糖廠土地處理綜合卷。

以上檔案僅屬國營事業司台糖公司部份檔案，另相關台糖檔案亦散見於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各行政單位的檔案內，現正由本館整編中，讀者可互為參閱。

四、檔案內容舉例說明

從以上檔案內容觀之，只是台糖所有檔案中的一部份，如欲針對該公司做整體或個案研究時，往往無法一窺全貌。而其中較完整的要算是「開發大肚山計劃」了，因此就該計劃做一簡述如下。

台糖台中地區原有台中、烏日、潭子、月眉、埔里、彰化、溪湖、南投、溪州等九個糖廠，壓榨能力佔公司總產值的 22 %。但各廠皆位於水田區，宜種水稻。自大陸淪陷砂糖失去國內市場，糖價低落以來，農民以種蔗無利可圖，乃改植其他有利作物。原料來源供應不足，糖廠無法正常運作，遂先後停閉烏日、潭子、埔里、溪州、彰化五廠。而改組後的台中總廠亦因種蔗面積無法達到每年的預期目標，產量銳減，成本增高，若不迅謀補救，終亦無法維持。又大肚山位於台中郊區，耕地面積約為七千公頃；土層雖厚，惟地質貧瘠。且雨季大都集中於年中，雨季過後季節風起，乾旱隨之而來。農民辛勤過後的一年所得，亦無法維持一家溫飽，更無力對地力加以改良，以致未能充分利用該山土地。基於上述原因，在經濟建設與農業政策的考量下，而有開發大肚山之計劃。

該計劃自 1955 年 5 月起至 1961 年 5 止，由台糖公司提出。初期案經各相關業務主管機關的會議協商考察達成開發共識；其後與台中縣市政府及議會，有關鄉鎮長暨鄉鎮民代表舉行座談多次，聽取民意，進行溝通，取得地方上的同意和支持。另一方面經濟部研擬〈開發大肚山土地處理辦法〉和〈大肚山開發計劃處理委員會組織規程〉，於 1956 年 6 月奉行政院修定通過；進而在 1956 年 10 月底前正式成立「經濟部開發大肚山土地處理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由下列機關派員充任，包括：經濟部二人，內政部一人，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農林廳各一人，台中縣市政府各二人，台糖公司二人，共計十一人。職掌：一、開發大肚山土地處理之計劃；二、土地交換價購及徵收撥用；三、農民轉業輔導；四、有關土地處理之經費；五、其他有關土地處理事項。初期預計開發面積廣達四千餘公頃，土地取得採交換或現金價購方式處理。

但其間國防部以開發大肚山計劃與「陽明山計劃第一優先軍事工程」用地有抵觸之處為由，要求停止開發；是此台糖為免計劃胎死腹中，乃決定將原陽明山計劃用地劃出縮小範圍。如若將來陽明山計劃擴充，必須使用大肚山計劃範圍內土地時，自可照價撥讓。最後確定縮小開發之地區為，台中縣：沙鹿鎮之埔子、六路厝（偏東南部分）；龍井鄉之新庄子；大肚鄉之蔗廂、井子頭。台中市：西屯區之水堀頭、下七張犁、林厝（偏西南之一部份）；南屯區之知高、山子腳、番社腳；共計面積約為 1.500 公頃（1 公頃=1.03102 甲）。再者開發區內農民以開發計劃影響當地居民生活甚鉅和提前繳清地價問題，屢向有關機關陳情。致使該開發計劃至 1959

年底止，實際完成協議收購交換之土地，合計為 762 甲（業經改良利用者計 490 甲），達預定計劃 51%。

1960 年 9 月，經濟部以「該會工作常遭外在環境之阻撓，以致影響工作進行甚劇，嗣後宜改以土地重劃及水土保持，改良示範入手，俾農民樂於接受」³為由；要求開發大肚山計劃委員會，除將該年度計劃應辦事項限期於該年底前完成外，並辦理結束；認為該會無長遠設置之必要。另裁示該項計劃非短期間內可以奏效，日後可由台糖公司會商有關方面繼續辦理。是以，開發大肚山計劃委員會便於次年五月解散，所遺業務由台糖繼續辦理。

就開發大肚山計劃在意義上，可以說並沒有全然成功，其原因在於理想與現實未能達於一致。開發大肚山的立意雖佳，但如一旦與國家安全和民眾利益相糾結時，其成效自是大打折扣。這不爭的事實，亦可從今日政府在施政上的作為和表現，得其應證。

五、結 論

從以上的論述和本所所藏的檔案來看，不難發見台灣糖業的歷史傳承及其發展；尤以它對台灣近現代經濟上的貢獻，是不可抹滅。再者台灣光復後，至進入工業化之前的這段期間，在這物質貧乏的叢蘭小島，台糖的龐大外匯，亦是促成台灣經濟能持續且穩定成長的各項原因之一。不過，若只想從這將近三百多函的檔案中，便要對台糖做全盤的了解，是仍嫌不夠的。因此我們期待台糖公司，能將其他尚在其公司內保存的檔案，有系統的整理和公開，或交由近代所檔案館予以收藏或託管，使該公司的檔案更趨完整，以方便學者研究。

3 開發大肚山計劃（三），經濟部呈行政院函，民國 50 年 3 月 25 日發，經台(50)營字 04052 號。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台糖公司檔案」，35-25-14，40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澳門專檔》史料介紹

莊樹華*

一、編輯說明

澳門隸屬廣東省香山縣，明萬曆年間(1573-1619)中國將澳門租予葡萄牙，在香港崛起之前，澳門曾經為世界上最富庶的貿易港口之一，也曾是華工「豬仔」主要販賣港口。鴉片戰爭後，澳門沒落了、葡萄牙國勢也衰了，但這曾是殖民大國的葡萄牙，面對著同屬沒落的滿清帝國，仍不放棄其對澳門勢力的擴張，因此澳門史無疑是一部近代中葡關係史的寫照。公元1999年澳門的主權將正式歸還給中國，屆時這一塊中國境內最久的殖民地將繼香港後，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焦點。有鑑於此，中研院近史所於民國八十一年(1992)起，根據該檔案館藏總理衙門、外務部及外交部檔案中有關澳門議題史料彙編成輯¹，至民國八十五年(1996)止，共編有《澳門專檔》四冊，時間從咸豐十一年(1861)到民國十六年(1927)。

第一冊內容主要根據為總理衙門時期(1860-1900)澳門專檔類編纂而成，內容包括：葡萄牙在澳門的擴址事件、日使(西班牙)瑪斯(Don Sinibaldo de Mas)調停中葡澳門事宜，及光緒十三年(1887)〈中葡草約〉簽訂後清廷內部的反應。遺憾的是有關〈中葡草約〉簽訂前中葡雙方對此條約的議論過程，及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如何主導達成此一協訂之文件，不見於近史所檔案館藏總理衙門史料中。第二冊內容為外務部(1900-1911)澳門專檔中有關駐法公使劉式訓中葡勘界談判議題。第三冊內容編自於咸豐十年~宣統三年(1860-1911)大西洋國修約檔，關於〈中葡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審

¹ 本輯史料分別採自《外交檔案函目彙編》中大西洋修約及澳門檔、一般交涉等類資料。除澳門華工問題另編入《華工出國史料》外，以及清末廣東、香港等各報對勘界的言論剪報未採集外，其他有關澳門的史料則有文必錄。

好條約)的修訂及換約交涉、〈中葡商約〉的議訂及光緒二十七年(1900)後澳門專檔內有關中葡界務交涉等文件。由於一~三冊的內容均涉及清季澳門中葡交涉問題,因此編者於第三冊之後,根據前此三冊各項議題,擇其要項依時間順序編列「清季中葡澳門關係年表」。第四冊所採集者為北洋政府時期(1911-1927)外交檔案中有關中葡對澳門問題的交涉文件以及廣東香山勘界維持會的言論。

《澳門專檔》全書採影印照相出版,以避免手民之誤;檔案若不清楚者,另附打字稿於原件之後。目錄除第二冊依時間排序外,均標明主題,依類相屬,各類主題再依時序列目;第四冊則列有分類及時間目錄。本輯在編目上以各冊為單位,因此各冊目錄格式未能統一,第一、二冊亦有少數幾篇史料重複出現,就議題上,第三冊的修約問題時間上早於第一冊所列議題,此乃編者疏漏之處。

二、內容說明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希望在中國找尋一貿易站,以配合其殖民帝國的東進政策,時逢明朝實施海禁,葡人乃賄賂海道副使汪柏,而得以暫居澳門。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營建房舍及圍牆,立有三巴門、水坑門、新開三門作為中葡界址。萬曆元年(1573)明政府允諾葡人留居澳門,但每年必須繳納地租五百兩。

鴉片戰爭後,香港漸漸取代了澳門的貿易地位,澳門沒落的事實並沒有阻止葡萄牙在澳門擴張其勢力的意圖,國勢已衰的葡萄牙反而趁此機會搭上西方列強向中國叩邊的列車,正式對澳門的主權歸屬展開挑戰。首先葡萄牙女王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任命亞馬勒(Joa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為澳門總督,並對澳門實施殖民稅法:向居住在澳門的中國商人及停泊在澳門的中國船隻徵稅。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兵襲擊澳門海關,驅逐其丁役。此舉不但引起廣東督撫的反彈,下令把澳門海關移設於黃埔,並動員在澳經商的中國商人遷到黃埔貿易。在民間也種下仇葡的情結,導致亞馬勒被殺,中葡關係陷入極度的緊張中。葡萄牙藉機停止對清政府繳納年租,面對此舉,清廷未向葡提出具體的抗議,使葡萄牙以此為藉口,認為清政府默許葡國在澳門有行使主權之實,也埋下日後中葡澳門屬權紛爭的導火線。

英法聯軍之役後，葡萄牙也趁中國忙於應付各國之際，想擴充澳門界址進一步擁有澳門的主權，同時，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900年後改爲外務部）處理對外事宜，於是一連串的中葡修約、界務談判的資料保存在總署、外務部等外交部門中。以下便是根據《澳門專檔》一～四冊的內容作一簡介，涉及的議題主要有：一、修約：同治～光緒年間（1864-1885）有關「中葡和好貿易條約五十四款」、光緒十三年（1887）「中葡草約」及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葡通商條款」等中葡修約議題；二、澳門界務糾紛；三、清末到民國北洋政府時期中葡會勘澳門界務等。

（一）中葡修約

英法聯軍之際，葡萄牙利用中國忙於和英法談判之際，重議澳門問題，以確定葡萄牙在澳門的宗主權。透過法國公使哥士耆（Kleczkowski）的穿針引線，中葡雙方於咸豐十年（1860）在北京展開談判，簽定「中葡和好貿易條約五十四款」。俟同治三年（1864）換約之際，清廷赫然發覺第九款有關澳門設官問題語意模糊²，要求換約前先確立清在澳門有設官稽查收稅之權，葡萄牙認爲清在澳門所設之官應僅僅是管理商務的領事而非行政官，雙方對「設官」一詞的解釋有很大差距，換約事一延再延。

同治七年（1868）清廷決定不再和葡萄牙糾纏於澳門設官問題，而採赫德之議「贖回」澳門。總署開出的條件是：中國以百萬兩白銀贖回澳門，葡萄牙自澳門撤軍、在澳門的砲臺、兵房全數移交中國；原居住澳門之葡人仍准留居；此後，澳門設官、征稅等一切治理權均歸中國統籌。赫德並推薦即將卸任回國的日斯巴尼亞（西班牙）公使瑪斯負責此一任務。³清政府支付瑪斯三十萬兩白銀作爲活動經費，連同贖金共一百三十萬兩的巨款則借自洋商在海關的存款，年息一分，從海關關稅中按月扣還，分兩年清償。然此一計畫卻因瑪斯回國不久後病逝而中斷。

爾後多年葡方不斷提出換約之請，以解決無約國在華通商及傳教之不

2 原來草約第九款所列文字爲「大清大皇帝任仍憑設立官員，其該官員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劄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清廷的立場是，即稱「仍設立官員」便是指仍照從前舊規，由清派官駐澳，稽查收稅，管理澳門。葡方以爲清廷在澳門所設官員係爲單純管理貿易的領事，而非行使管轄權的行政官。見《澳門專檔》（三），第130條，頁121。

3 《澳門專檔》（一），第19條，頁34。

便。光緒八年(1882)葡萄牙公使賈貴祿(Jooquin Jos'e Da Grafa)提議在中葡通商和約未換之前，是否可先預立一暫時條款，讓大西洋國傳教士、教師及商民在中國能享有最惠國待遇。⁴葡國單方面的要求自然不為總署所接受，清廷還是那一句老話「俟澳門設官一節訂明後再辦」。⁵

光緒十一年(1885)適值中法構兵之際，奧國總領事以半威脅的口吻出面為葡萄牙作說客：「值中法交戰之際，法國欲租澳門以屯糧，今中葡無約，可不守局外之規，如能趁此另立章程，既不失交鄰之道，並與中國大局有神。」⁶清政府以為歷來中國與各國立約通商，均由彼此欽派全權大臣會商辦理，從無領事與關道私自商立章程之事，⁷何況此約已拖十年有餘，亦不爭此一時，應俟中法大事抵定，再從長計議。

中法戰爭的爆發，清政府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希望內地釐稅在入關時能連同關稅一起課徵，即所謂「鴉片稅釐併徵」；但若有效地實施鴉片稅釐併徵，必須厲行緝私。因此清廷派上海道邵友濂、海關稅務司赫德和英政府談判時，英方要求港澳共同開辦，以避免屆時鴉片走私均集中到澳門，影響香港的貿易。在港澳共同徵稅緝私的原則下，清政府不得不主動與葡方接觸。光緒十三年(1887)清廷派赫德親信英人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前往里斯本，訂定了〈中葡草約〉，草約內中國「承認葡萄牙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同意，則葡國不得將澳門讓予他國」。⁸清政府為了鴉片稅釐合徵模糊了其對澳門的主權，這種顧此失彼的作法亦引起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廣東巡撫吳大澂的異議。果不出其然，葡萄牙便以「永駐澳門」為由，堅持其擁有澳門主權，為日後中葡界務帶來許多困擾。

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因白銀貶值，欲修改原訂值百抽五之關稅。葡使白朗毅(Jose Azevedo Castallo Branco)到北京進行關稅談判時，趁機要求疏浚航道以振興澳門商務，並以對面山及大小橫琴島為澳門「生成屬地」為由，要求將該地劃為葡屬。⁹清廷對其無理要求自然是置之不理。

4 《澳門專檔》(三)，第199條，頁208。

5 《澳門專檔》(三)，第200條，頁211。

6 《澳門專檔》(三)，第205條，頁217。

7 《澳門專檔》(三)，第205條，頁218。

8 《澳門專檔》(一)，第1條，頁3-15。

9 《澳門專檔》(三)，第234條，頁258。

於是白朗毅再以擴充商務為由提議興建廣澳鐵路，作為中國在澳門設立海關分關之交換條件。雙方議定〈中葡增改條款九款〉，此條約後來因為葡國政府反對澳門設關而作罷。光緒三十年(1904)白朗毅再度來華，與商務大臣呂海寰、盛宣懷在上海重開談判，雙方訂定〈中葡通商條約二十款〉，其內容主要為補充光緒十三年(1887)〈中葡條約五十四款〉。至於廣澳鐵路則另立合同，由兩國商人集股合辦。

(二) 中葡界務

清季中葡交涉中「界務糾紛」為一重要的議題。關於葡在澳門的界址，可分為原租、舊佔、新佔、圖佔四階段說法。所謂原租是指十六世紀葡人自築之三巴門、水坑門及新開門圍牆以內之區。同治二年(1863)，葡萄牙拆除此牆，向外擴張；光緒初年對望廈、龍田等村勒收地鈔，到了光緒十三年(1887)中葡簽約時，葡已據有整個澳門半島，此為舊佔之地。爾後，葡亦不顧雙方對「勘界前對現時情形不得有增減」之約定，趁著清政府忙於應付西方列強而無暇顧及澳門之際，積極地延伸其勢力範圍，佔據澳門半島北面的青洲及南方的潭仔、路環兩島，此屬新佔之地。此外，葡萄牙亦覬覦對面山、大小橫琴島、馬騮洲以及澳門的海權，不斷製造事件，挑起主權紛爭，此為葡萄牙圖佔之區。從檔案中可將界務糾紛歸類如下：

1. 同治十一年(1872)葡萄牙在灣仔搭建棚寮
2. 光緒四年(1878)葡萄牙抗議中國無權攔截香港運彈藥船
3. 同治十一年～光緒五年(1872-1879)葡萄牙干擾中國在馬騮洲海域緝私
4. 光緒六年(1880)葡萄牙不准中國在灣仔、過路環海域緝私
5. 光緒十二年(1886)葡萄牙擅自將青洲租給英人設公司
6. 同治二年～光緒十三年(1863-1887)葡萄牙佔望廈、龍田等村
7. 光緒十四年(1888)葡萄牙稱中國在小橫琴島無管轄權
8. 光緒十五年(1889)葡萄牙抗議中國在關閘至北山嶺一帶建造巡捕所
9. 光緒十三年～十六年(1887-1890)葡萄牙圖佔青洲海域
10. 光緒十九年(1893)葡萄牙驅逐灣仔之中國兵船
11. 光緒二十二年～二十四年(1896-1898)葡萄牙在小橫琴島建造營房並稱其為葡屬之地
12. 光緒二十四年(1898)葡萄牙向望廈村民收稅
13. 光緒三十三年(1907)葡萄牙強行拖去灣仔中國漁船

- 14.光緒三十四年(1908)中國海關在過路環捕獲日本軍火船「二辰丸號」，日稱其為葡界
- 15.光緒三十四年(1908)葡萄牙在九澳搭建兵房、丈量土地
- 16.光緒三十四年～宣統元年(1908-1909)葡萄牙至馬料河收稅並擄去華民
- 17.宣統元年～二年(1909-1910)葡萄牙干預華兵到小橫琴島緝匪
- 18.宣統二年(1910)過路環綁匪案葡方未先知會粵督即出兵，引發清廷抗議
- 19.宣統三年(1911)葡萄牙拆毀前山鄉民所築圍牆
- 20.宣統三年(1911)葡萄牙在雞頸山（潭仔）附近濬河

（三）中葡勘界

葡萄牙未能以立約來達成擴址目的後，自行在澳門擴張界址的舉動，引發了許多民怨，香山縣民紛紛要求清政府與葡明確劃清界址。在輿論的壓力下清政府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派駐法大使劉式訓赴里斯本與葡萄牙政府商談劃界問題，雙方決定各派代表至澳門查勘劃界。起初中國對葡方所派出的人員不滿意，在幾經折衝下葡國派出勘界專使馬沙鐸(Machado)，中國派出雲南交涉使高而謙於香港展開會談。談判期間葡方動作頻頻，不但派軍艦入港示威而且要求中國承認其對澳門水陸界佔領之既成事實。清政府方面的底限只願承認光緒十三年(1887)中葡草約訂定前所謂葡在澳門「原租」及「舊佔」之地，至於十三年以後新佔及圖佔之地甚至有關澳門內河、海界，清廷概不予承認。¹⁰雙方談判僵持不下，葡於是提出交由海牙公斷，消息傳回，朝野一致反對。由民間自組的勘界維持會、粵商自治會紛紛電請清廷堅守澳門主權，在雙方都不願讓步的情況下，清廷與葡會談了十次，最後仍告中斷。宣統二年(1910)，清廷再度派劉式訓赴葡萄牙續議界務問題，不久，葡國發生政變，改為共和體制，清政府一度想以對其承認作為收回澳門主權的交換條件，但在西方各國陸續承認葡萄牙新政權後，清政府喪失了最後談判的籌碼。

民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為了解決長期以來緝私及提犯的困擾，希望儘速與葡萄牙恢復勘界會談。民國三年(1914)，中葡各派代表，雙方初步接觸後在陸權與島權上均願作適度的讓步，¹¹但在內河航權及海權上則難

¹⁰ 《澳門專檔》(二)，第119條，頁123。

¹¹ 葡國公使符禮德(J. Batalha de Freitas)首先提出願意放棄前此馬沙鐸對大、小橫琴島及

達共識，而事實證明，爾後中葡界務最多糾葛也是在海界而非陸界。

民國五年(1916)二月，廣東將軍龍濟光、巡按使張鳴岐電稱葡軍在澳門青洲附近填築海圩。十一月，又乘我前山軍隊換防之際進泊灣仔，遣兵登岸租屋。對於中國的抗議，葡萄牙辯稱其擁有灣仔及銀坑海權。¹²爾後多年，葡萄牙亦利用中國政府南北分裂之際，向廣東軍政府提出擴界要求或自行擴展界址。

民國八年(1919)，葡萄牙在青洲島堤岸附近挑浚海道，築成一長五十丈、寬十丈的路面。廣東軍政府一面向澳督提出抗議，一面派員前往青洲實地測繪，並將葡人擅築青洲海坦各情電京本部。駐葡萄牙代辦郭家驥主張禁運米糧入澳以為要挾，¹³但考慮影響旅澳華人生計而作罷。廣東軍政府見葡方如此不可理喻，決定派陸軍第一旅旅長盧焱山帶隊，遣「雷龍」、「永豐」各軍艦前往九州洋一帶梭巡。此時，英方以英葡同盟之誼，要求北京政府勸請廣東當局勿出此強迫舉動，北京政府以南方向不聽從北方命令為由回絕之。¹⁴事實上南北政府在處理青洲填坦一事的態度是一致的，廣東方面派軍艦脅其停工，也是經北京政府所默許，¹⁵所謂無權制止粵方派艦之說，不過是推托之詞；至於葡萄牙要求立即劃界，北京政府告以南北未統一之前不易辦理，亦是延宕之語。

民國九年(1920)六月，雙方為了解決劃界前最棘手的港口及提犯緝私問題，軍政府與澳督會商在澳門界務未定以前，先訂立興築澳門港口工程合約、修改港口章程及澳門交解華犯章程。至於劃界問題因葡萄牙要求廣東政府所派專員須有北京政府的任命，若劃界會議在三個月內未能解決，要交由國際公斷等，不為廣東政府所接受，而暫從緩議。

民國十年(1921)九月，中國魚雷艇停泊澳門，擊斃澳門警員，葡萄牙

對面山的索求，但希望比照九龍，將大、小橫琴島租給葡國九十九年。中國方面則認為，談判還是必須依據過去的基礎，中國願作部份的讓步，例如潭仔、過路環兩島，中葡可各佔一半。《澳門專檔》(三)，第55條，頁127。

12 對中國的抗議，葡萄牙振振有辭地辯稱：光緒十六年(1890)已與粵督訂約，內港屬澳管轄，換言之，葡國擁有灣仔及銀坑海權。中國方面，除要求葡艦退回原泊，並聲明光緒十六年粵督與澳督暫定彼此泊艦地點，乃權宜行事，並非正式訂約，而此事與將來劃界更無相干。《澳門專檔》(三)，第90、91條，頁240、241。

13 《澳門專檔》(四)，第186條，頁342。

14 《澳門專檔》(四)，第198條，頁351。

15 《澳門專檔》(四)，第236條，頁392。

一面向北京政府要求賠償，一面將澳門問題擬提到華盛頓會議上解決，並請美國出面公斷。北京外交部認為澳門界務新舊佔地糾葛複雜，非他國所能深悉，斷難付諸公斷，希望歸入租借地問題，根本上籌議收回之法。¹⁶

民國十一年(1922)五月，澳門發生葡萄牙駐軍打死大批中國工人事件，國內各團體一致通電嚴重譴責葡萄牙的暴行，並希望借此機會收回澳門。澳門勘界一事也因此而擱置下來。

民國十七年(1928)南北統一，國民政府始致力於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適時中葡條約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修訂後已屆四十年，前約載明每十年修改一次，但每次屆期皆一字不改，只具換文形式，國民政府擬利用此機會根據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之原則另訂新約。¹⁷至此，中葡澳門關係已非僅僅是界務問題，而是中國如何收回澳門的主權問題，但由於葡方態度消極，中葡澳門問題一直懸置未決。

另外本書輯有多篇廣東香山勘界維持會的意見書，會長楊瑞楷（拱北士紳、亦為旅港商人）言論可顯示當時民間在中葡交涉上所持態度遠比政府積極、強硬，¹⁸可作為當時民意之參考。

三、結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民國四十四年(1955)接收大批近代外交史料以來，除了著手於史料的整理，開放學界利用外並出版檔案目錄及史料彙編，以利學界的使用。如早期《海防檔》、《教務教案檔》的出版，提供史學界有關清季自強運動及教案研究的方便性，讓研究者可在檔案的基礎下進一步從事相關議題的探討，著成專文或專書，《澳門專檔》即是在此一精神下出版。此輯在編纂上雖有多處不盡理想，但就研究中葡澳門交涉問題而言，在史料運用的方便性及價值性應有一定的助益。

16 《澳門專檔》（四），第261條，頁452。

17 《澳門專檔》（四），第301條，頁570。

18 請參閱《澳門專檔》（四），勘界維持會言論部份。

從汪精衛一封未傳送出去的函稿談起

邵銘煌*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在主動委託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utmann)出面斡旋中日議和，由於所開列條件過苛，遭中國政府拒絕後，憤而片面宣布此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象」的嚴厲聲明，意即不再尋求與國民政府直接議和的管道。之後，國民政府旋召還駐日大使許世英，同時日本也撤回駐華大使川越茂，中、日兩國的正式關係便告斷絕。

然日本對華誘和活動並未因此戛然而止，隨其侵略軍事之進展，仍不斷透過其少數官員與民間人士等多重路徑，主動施展和平攻勢，設法與國民政府接觸。日本外交部門表現格外急切，二月間其外相與次官在政府內部高層會談場合，相繼提案要求利用義大利出面擔任仲介角色；是月下旬，便發生義大利駐華大使柯萊(Giuliano Cora)親訪時在香港的宋子文，提示其個人對議和的條件並加以勸進的事，但為宋子文拒絕。¹蔣中正委員長二月二十五日日記所稱「香港傳出消息，日寇竟又有託由意大利大使調停中日戰爭之說」，²顯非子虛謠傳，而是確有其事。義使柯萊再接再厲，三月間又把透過其駐漢口參事官與汪精衛或孔祥熙接觸獲悉的中國政府的反應，傳達給日本駐上海的無任所公使谷正之。³

本文所要探討的這一封信稿，即與義使柯萊受日人之託，充當和事佬鏗而不捨的奔走有直接關係，係當年汪精衛幾經周折後作出的回應，原擬書致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後來卻因故未能傳達。藉本文之探析，益有助於揭曉日本對華誘和的重重陰謀。

*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祕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1 參見戶部良一，《支那事變和平工作の群象》（東京：創論社，19915年8月），頁202-203，及258頁的註1。

2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民國67年10月刊印，未公開發行），卷四，上冊，頁181。

3 戶部良一，《支那事變和平工作の群象》，頁203。

一、函稿內容考釋

茲先將函稿內容，抄錄如下：

敬啟者：近常由意大利使館得聆

閣下及貴同僚之意見，知貴方主要之考慮，為將來中國對日本之態度，且聞貴國切願息爭言和，唯須得有相當保證，將來中國必採對日友好之政策。□自巨變發生以來，目擊兩國人民之慘景，憂心如焚，無時或已。於既聆高見，願掬至誠，為

閣下告。中國人天性和平，殆為舉世所共認，而寬厚仁慈，不念舊惡，尤為歷代先哲處世之寶訓。此次抗戰純出自衛，苟貴國能放棄近年來日進不已之侵略政策，改弦易轍，彼此提攜，以謀共同之福利，中國人民決無不肯捐釋前嫌，與貴國經濟合作，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

蔣介石先生為□三十年來患難之友，□深知其服膺孫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之主張，平日其為人亦力主寬厚，數年來共事政府，雖兩人一軍一政，職務上各有不同，而對於東亞應樹立永久和平之方針，實為吾輩所昕夕研討，寢饋不忘者。現蔣先生已成中國全民擁護之領袖，必在蔣先生領導之下，中國始能完成統一，革新政治，造成繁榮之國家，以與鄰邦攜手，亦必如此而後鄰邦始能獲得最大之利益。以□與蔣先生相交之久，深知如兩國息爭以後，蔣先生對日本必取友好合作之政策，斷無疑義，□亦自當以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之資格，竭力主持，此□個人可以誠懇坦白之態度為閣下及貴國同僚保證者也。至于中國赤化之說，證之十年來歷史事實，識者自明，無待辭費。

目前局勢，中國純屬被動，實逼處此，□亦不憚明言，解鈴繫鈴，唯在貴國。苟貴國之條件，為吾輩所能接受者，雖貴國不進攻武漢，亦可接受，否則縱使貴國能占領武漢乃至我國祇餘一兵一卒，亦必為民族之生存，奮鬥到底，何必簽字于亡國之條約，以重增吾輩對國民之罪戾？貴國進攻武漢之舉，實為無意義之犧牲，此有識者之公論也。

此書託意國使館之好意，妥為轉達，彼此自須守絕對秘密，以免使此嚴重局勢，益陷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之此舉，純因目睹生靈塗炭，慘絕人寰，願貢個人之微力，試挽兩國之劫境，不獨個人對於戰爭無所畏懼，對於中國抗戰前途毫不悲觀，即個人之生命名譽，亦早已置諸度外，苟有利于中國，苟有利于東亞，雖粉身碎骨，亦所不辭，倘鄰邦遠識之士，一

致奮起，共圖挽救，尤所切盼。敢布區區，諸維
亮察。此致

近○○○先生閣下

從信的形式看，這是一封書就的函稿，現保存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⁴原信使用交通部函稿紙書寫及信封裝置，信封上特別標記「極密」二字，證明此事與時任交通部次長彭學沛有密切關係，再參照下節引述之日文電報，更能明白彭學沛所扮演的居間傳話角色。

函末並未註明書寫日期，但根據函中所述「□亦自當以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之資格，竭力主持」之語，可知一定在四月之後，蓋汪精衛係於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在中國國民黨五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被推舉為副總裁。此外，從信的末段一連幾次提及日本進攻武漢情事，亦可確定是寫在日軍攻略武漢之前，時間當為五、六月之間。至於較確實時間，容於下節續作考證。

書信人在信中只以「□」自稱，信末也沒有署名，惟細察字跡形體，其為汪精衛親筆函，殆無疑義。引人好奇者，為汪精衛何以甘冒危險，起意書寫此一致敵方首相的信件？經參查相關資料得知，乃源自於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發動的誘和工作。宇垣於是年五月下旬上臺後，亟於修正日本政府一月十六日所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之失策，因此除了親自主導進行與孔祥熙謀和交涉之餘，⁵另外還舊曲重彈，繼續假手義大利大使柯萊出面誘和，才促成此一函稿之出現。細讀函稿內容，不難理解當時汪精衛願意寫信，出發點端在於希望盡一己之力，勸阻日本能夠懸崖勒馬，放棄進攻武漢的謀略。此信為六月間寫就，從而進一步獲得佐證。

二、義大利大使柯萊調和經緯

在「抗戰至上 民族至上」呼聲下，為了避免遭到通敵賣國責難，抗戰期間有關謀和交涉活動，不得不出之以秘密手段。對於交涉過程，中、日雙方都要求嚴守保密約定，因此留下的記錄通常極為有限。當年義大利

⁴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原件，史料編號 715.1/87。

⁵ 關於宇垣一成與孔祥熙之間的謀和交涉，參閱邵銘煌，〈孔祥熙與抗戰初期的謀和試探〉，《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近代史學會，民國 85 年 9 月），上冊，頁 103-133。

大使柯萊受日本政府之託出面調和一事，自不例外，甚乏詳實資料以資查考。⁶即使此信所透露者也僅止於「近常由義大利使館得聆閣下及貴同僚之意見」、「此書託意國使館之好意，妥為轉達」等寥寥數語。

為求證汪函透露的這丁點訊息，再查閱相關資料，發現蔣中正委員長七月九日日記記及「意國大使單獨調停，為我所拒」之事，⁷他後來在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報告外交情勢時，重提義大利大使曾經從事媒介汪精衛與日本之間諜和活動的往事；⁸當時任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的石射豬太郎在東京也耳聞其事，他在六月二十四日日記上說：「自香港獲取汪精衛對意國大使柯萊提出希望直接從東京得悉日本議和的基本條件之情報」。⁹綜合這些片斷記錄，已可明悉義使之撮合汪、日議和之舉，絕非空穴來風，可惜都只是點到為止，難以從中窺全貌。

目前所知，對義使柯萊出面調和一事，有較為具體描述者，首推一份當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日高信六郎發給駐北京的堀內參事官的「極密」電報資料。從電報記述的情況，得知：六月二十六日，日本同盟通訊社中南支局局長松本重治自香港回到上海，向日高總領事報告他在二十三日與義大利大使柯萊的談話經過；日高總領事於次日（二十七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發出電報，七時四十五分到達北京。¹⁰茲就這份電報內容，勾勒出義使調和交涉之梗概如下。

六月某日，義大利駐漢口參事官晤見汪精衛，聲稱奉義大利大使柯萊之命，轉達日本公使谷正之提出的關於日、中直接談判的意見。

- 6 吳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引用蔣中正委員長之澳籍顧問端納(W. H. Donald)寫給英國新聞記者田伯烈的信，提及意使遊說汪精衛出主和議之事，但是所述不很清楚。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5月），上冊，頁484-485。
- 7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232。
- 8 蔣中正，〈外交趨勢與抗戰前途〉，《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速紀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藏毛筆原件。
- 9 石射豬太郎著，伊藤隆、劉傑編，《石射豬太郎日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年7月），頁272。
- 10 日高總領事發給駐北京的堀內參事官的電報，件名〈松本、伊大使談話〉。堀內參事官全名待查。本文所參考者，係北京師範大學蔡德金教授提供的影印件，蔡教授著《汪精衛評傳》已有所論列。原件雖只稱「松本」，查證相關資料推斷應該就是松本重治，當時松本正應西義顯電召，赴香港協商高宗武赴日秘訪事宜。唯其所著《上海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昭和63年2月七版）未提及曾與義使柯萊會談一事，是因為遺忘或其他因素，有待探究。

六月十六日，汪精衛在蔣介石諒解下，派交通部次長彭學沛往見義大利駐漢口參事官，答復谷正之之提議：一、在目前形勢下，汪不可能代替蔣中正掌理政權；二、目前蔣中正不可能下野；三、蔣中正將來的政策是穩健的，此點汪個人可以保證；四、漢口如果淪陷，中國恐會陷入混亂，對日本而言，與其讓中國混亂，不如讓中國統一方為得策。

六月十九日，汪精衛接獲義使所提三點建議：一、汪秘密赴日；二、如不能赴日，直接寫信給日本首相近衛；三、中國乘機表示決心參加防共協定。

六月二十一日，汪精衛派彭學沛答復如下：一、秘密赴日本難以實現；二、目前中國正接受蘇聯飛機及其他軍事援助，在此情況下，不可能參加防共協定；三、倘能得到義國政府的秘密保證，便可書致近衛一封長信；四、在起草致近衛信時，希望由義國斡旋，瞭解日方大致的條件；五、發送此信同時，也準備通告英國大使。

以上是雙方分別透過義大利駐漢口參事官與彭學沛傳達謀和意見大致的情形。義大利駐漢口參事官於六月二十一日獲悉汪精衛的基本立場後，旋即通報在香港等候消息的義使柯萊。兩天後（二十三日）柯萊再把交涉情況告知松本重治。當時松本正策劃高宗武秘赴日本交涉的計謀，俟安排妥當，高宗武離開香港前往上海當天，松本便又和柯萊晤談。松本隨後（二十六日）也返回上海，一方面協助高宗武赴東京事宜，一方面報告其上海總領事。

義使柯萊在松本返歸上海之前，直接向日本谷正之公使通報交涉情形，同時說明關於寫信一事，將來會經由義國駐上海的書記官回覆消息。他還提醒日方，要警戒中國方面可能把此次交涉進展的訊息洩露給英國。然事有逆料，柯萊大使卻於六月二十八日奉調返回義大利，經由他居間的調和交涉遂告中止，嗣因客觀情勢變化，無何結果。根據義國參事官得到的情報判斷，日高總領事後來在七月十三日致電宇垣外相報告，認為「所謂汪精衛的提案，只是出自探察日方意向的詭計而已，很難視之為漢口方面既定的明確方針。」¹¹

¹¹ 劉傑，《日中戰爭下の外交》（東京：吉川弘文館，平成7年2月），頁202。

三、汪精衛函並未傳送出去

到目前為止，這一封汪精衛寫給近衛的信在日文資料方面並未發現，似可作為未經由義大利使館傳送出去之一旁證。探究其未能傳送出去原因，主要是汪精衛遵照了蔣委員長「你不能寫信」的指示。後來蔣委員長回憶說：

意大利挑撥中國內部比日本還厲害，真是日本的走狗。這次汪先生出走，或許受了意大利的挑撥也難說。去年（指二十七年）五六月間，意大利大使叫他在武漢的領事同汪先生說，要汪先生寫一封信給近衛，他就可以從中替我們講和。汪先生拿這個事情問我，我說：你不能寫。後來他就沒有寫。從此以後，汪先生再也沒有和我談起過意大利外交。¹²

蔣委員長素疑日本有謀和誠意，深知日本這一波和平攻勢，不過是配合發動武漢新攻勢之故技重施而已。當時孔祥熙已把委派代表與日方先後在上海、香港兩地接觸探得的「以蔣委員長下野為議和必要條件」消息，報告了蔣委員長，在在暴露日本亟謀瓦解中國抗戰之詭計。而今義使柯萊傳來的議和意見，如出一轍，乏善可陳，無需理會。

其次，應與高宗武啓程秘赴日本打探消息有密切關連。高宗武日本之行，受日人松本重治和西義顯（南滿鐵道公司駐南京事務所主任）從中鼓動的作用很大，日方背後指使者則為軍部和參謀本部，但與外務省策動義使柯萊的仲介工作，殊途同歸。

高宗武於六月二十三日啓程赴上海，當天梅思平¹³便由香港返回漢口，晤見國民黨中宣部代理部長周佛海，想必與報告高宗武日本行之事脫不了關係。是日晚，梅思平夜宿周佛海寓所，續談中日外交趨勢。直到七月一日梅思平赴港，這一期間，兩人天天晤談。除周佛海之外，梅思平也在六月二十五日謁見汪精衛，二十七日又偕同周佛海、陶希聖、林柏生共四人，接受汪精衛晚宴，「談宇垣對華外交形勢，咸主對日適可而止。」

¹² 蔣中正，〈外交趨勢與抗戰前途〉，《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速紀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藏毛筆原件。

¹³ 梅思平，時為漢口半官方文化宣傳機構「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人員之一，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負責選輯外國報刊資料，提供總會參考，實則兼負蒐集情報任務。

¹⁴他們談話所稱的對日適可而止，蓋即指義大利大使之斡旋活動。高宗武既已啓程赴日直接探訪日方之議和真意，自可不必再假託義大利之手，何況蔣委員長已明確表示拒絕柯萊調和的態度。¹⁵

四、汪精衛尚未下出主議和決心

雖然這只是一封寫就而未傳送出去的函稿，卻蘊含有不容忽視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反映當時汪精衛對議和的基本立場，更可藉以察知他與蔣中正委員長之間的關係。

汪精衛在函稿中誠摯盼望日本要相信：中國政府在蔣中正領導及其協助下，採取對日友好合作之一貫立場。爲了兩國互利，應以和平方式解決軍事衝突。只要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可以被接受，中國政府當願與談判，否則即使戰至一兵一卒，亦必奮鬥到底。他推崇蔣中正是中國領袖，唯其才能帶領中國完成統一，革新政治，造成繁榮之國家。從他指派彭學沛向意國漢口參事官傳達的謀和立場，都足以顯示那時他們兩人關係還是和諧的，無如外界流傳處於緊張對立狀態。

汪精衛此時尚無出主議和的決心，才會將與義大利外交人員接觸情形報告蔣委員長，徵詢對日方建議其致函近衛首相可行性之意見。蔣委員長深曉日本誘和詭謀而告以不宜書函，汪精衛也遵從指示。義使柯萊媒介調和活動隨其調職而中止後，有關義國繼續調和消息，猶屢傳不斷，王世杰在八月二十二日日記中隱約透露，汪精衛「在黨部談話會中否認此事」。¹⁶爲此，蔣委員長特於二十七日接見路透社記者，也加以否認。¹⁷

可見以前對汪精衛主和看法，有所偏差，往往以其後來投日行爲之結果，評斷他在整個抗戰時期的政治行爲的表現，甚或有混淆黑白者。大陸研究汪精衛權威學者蔡德金，述及這一段史事時，對汪精衛對日方的提議

¹⁴ 參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68年出版），上冊，頁116-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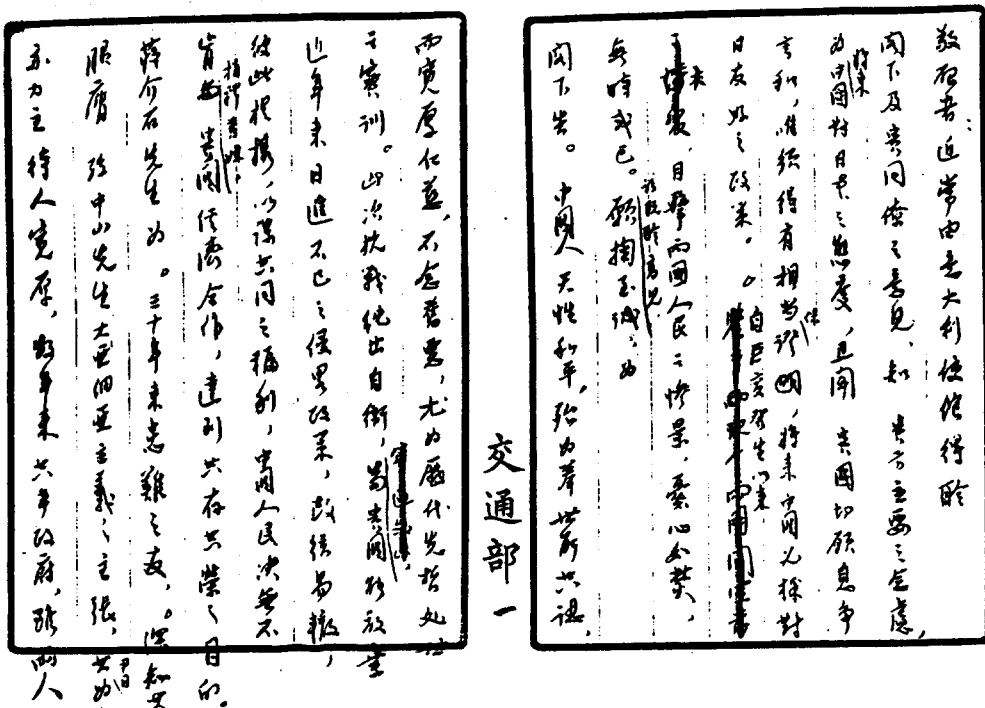
¹⁵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冊，頁232。

¹⁶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9年3月初版），頁344。

¹⁷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頁347，350-351。

與要求，使用了「大為興奮」、「很樂意的」之類語詞，恐不甚恰當。¹⁸事實上，就事論事，抗戰初期的汪精衛，基本立場還是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的，只是認為不應全然放棄經由談判解決戰端的機會；即使與日本談和，條件必須是可以接受才行，並非一味的求和。他在這一封函稿中宣示的「為民族生存，奮鬥到底，何必簽字于亡國之條約」、「不獨個人對於戰爭無所畏懼，對於中國抗戰前途毫不悲觀」的信念，便是最好的例證。

一個人的信念當然會隨著時移境轉而產生變化。陶希聖在《潮流與點滴》一書認為：汪精衛在武漢時期，沒有違背蔣委員長而另主和議的意向，應為可信。¹⁹汪精衛決心出主議和，是在十月下旬廣州、武漢陷敵以後的事。



18 參見蔡德金，《汪精衛評傳》（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一版），頁268。
19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59年9月初版），頁166。



新書評介

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莊吉發。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2月，300頁。

莊吉發教授是台灣研究清史的權威之一，他出版過二十餘本清史論著，更發表過數十篇論文。莊教授精通滿文，曾編譯過幾本滿文的書如《清語老乞大》（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尼山薩蠻傳》（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孫文成奏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年）、《滿語故事譯粹》（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作者任職於故宮博物院多年，對清代檔案瞭若指掌，本書除了運用許多故宮的檔案和文獻之外，又參考中外學者對薩滿教的研究成果共六十本論著和六十餘篇論文。作者文筆順暢，加上薩滿的故事精彩，讓讀者很能一氣呵成閱畢全書。

本書共分為六章、二十二幅圖版、四個附錄。各章節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作者討論大陸學者對薩滿教的定義、看法，而他秉承凌純聲教授觀點認為：「薩滿的功用是一種宗教，他的思想系統是哲學，並是一種醫術。」所以他使用「薩滿信仰」來取代「薩滿教」一詞。

第二章論述薩滿信仰的文化背景及其特質。所謂的文化背景是指古代匈奴、鮮卑、肅慎、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巫覡信仰，薩滿信仰屬於巫覡文化的範疇。作者也從地域、考古、語音學、歷史文獻上考證東北各民族的由來，這些氏族部落始祖或部族起源與薩滿起源的神話息息相關。作者認為薩滿具有神力，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薩滿的，薩滿有病患當薩滿、世襲，亦有取決於薩滿神。薩滿要學習神術，跳神、學習祭神的禱詞、熟悉宗教信仰活動內容等。例如錫伯族薩滿的訓練，包括神靈附體、刀、槍、火針刺身不受傷、上刀梯、擊鼓、診病、跳神、請神等。

薩滿信仰屬多神的泛靈崇拜，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聖者崇拜。薩滿信仰的功用像是一種宗教，巫術控制自然、駕馭自然的能力，如呼風喚雨。薩滿是自然現象的代言人，人們對巫覡的態度就像對大自然那樣敬畏。薩滿的法服、法器有它強化法力、護身防邪、象徵性、裝飾的

功能。

第三章討論薩滿信仰的靈魂概念及其宇宙觀。作者認為薩滿的靈魂概念將人的靈魂分成三種：有肉體的靈魂、精神靈魂、轉生靈魂。人亡故之後可以和自然界中各種靈魂神靈交往溝通，薩滿信仰根據萬物有靈和靈魂互滲的原則，薩滿的神聖性就在於他可以召喚各種神靈附體，所以自然界中的動植物、圖騰、祖先都是神性。尤其祖先崇拜隨著社會的發展有所變化，薩滿崇拜最初是氏族團體內的祖先崇拜，繼而逐漸發展為部族祖先或家庭祖先崇拜。以上所述的各種神靈地位平等、各有所司，神靈世界沒有統治神靈與被統治神靈的劃分。不過，後來滿族接受外來的宗教如佛教、道教等，逐漸將神祇體系衍化為佛教的宇宙觀。例如薩滿信仰認為自然宇宙分為九層三界，上界為天界，又稱為火界、光明界，分為三層，各種天神、日月星辰、動植物神、祖先英雄神祇都高居於九天上界的金樓神堂之中；中界亦分為三層，是人類、禽鳥動物繁殖的世界；下界為土界，又稱地界，亦分三層，是地母及司夜眾女神、惡魔等居住之地。這種三界說明顯地受到佛教、道教、基督教等教義的影響，在薩滿的故事中加入了冥府閻羅王的角色。可見早期薩滿信仰故事中，神祇的功能在於消災除病，保佑族人平安、多獲得獵物，人神關係直接、平等、現實，到了社會分化後神祇高高在上，支配世人。在《一新薩滿》、《尼山薩滿傳》、《恩都力薩滿》的故事中有亡魂在地府受到因果報應的觀念，都是佛道色彩濃厚影響。

第四章討論薩滿信仰的比較分析。作者首先將薩滿和西藏本教的比較，討論本教的流傳和派別。基本上西藏本教也是以巫術為主體，有對自然、圖騰、祖先的崇拜。喇嘛具有各種能力，其神通廣大可上天入地、伏魔降妖、馴伏百獸、駕馭自然、醫治百病。後來本教吸收了佛教的內容，逐漸發展為佛教的一個教派。本教和薩滿對三界的解釋不同，本教認為天界的主宰為白色、中界的主宰為紅色、下界的主宰為藍色。本教的觀念中地下沒有幽冥世界，靈魂也不會轉世。其次，作者將薩滿與傣文化的比較，在服飾上薩滿文化與傣文化有共同之處，有特定法器和消災祭祀儀式。後來受到漢族社會文化影響，其巫術意識與作法逐漸淡化，轉向娛神、娛人的娛樂性發展，如傣戲。最後作者比較薩滿與台灣的乩童，認為台灣的乩童和北亞民族的薩滿信仰有許多共同特徵，但差異亦多，故而斷定乩童不屬於北亞薩滿信仰系統。

第五章討論薩滿信仰的社會功能。作者認為是民俗醫療的靈媒，兼具巫術語醫術，醫治身心的各種疾病，作者認為薩滿跳神治病可以稱為「社會文化治療」或「民族精神醫術」，有超自然的作用，在北亞草原族群中具有正面的社會功能。作者又討論東北民族所舉行祭天、祭吉星神、家祭、族祭、野祭等各種祭祀活動，甚至清代宮廷亦是如此，乾隆朝編著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一書，對於祭祀活動規定相當詳細。薩滿的跳神活動對民眾產生重要影響，不但照顧民眾養生送死的人生大事，薩滿也治療人們心理、生理的疾病，為人祈求平安消災祈福。

第六章結論，作者引述若干學者的研究，再次說明薩滿不是宗教而是信仰。作者又舉例說明薩滿信仰在清初以來遭受官方取締，造成薩滿的活動日趨式微。更由於社會文化的進步，以及儒、釋、道思想的普及，薩滿信仰存在和整合組織的功能逐漸減退。

近年來大陸研究薩滿教的學者利用田野調查之便，出版不少薩滿跳神的論著，如富育光著《薩滿教與神話》、《滿族薩滿教研究》；定宜莊、劉小萌著《薩滿與東北民族》等書。¹不過，就這些田野調查的結果顯示，多數的東北居民對於祖先祭祀或薩滿跳神的活動都一無所知，即便留下若干祭祀的器物亦屬鳳毛麟角，所以本書作者雖然沒有做過田野調查，但能博引古今群書、檔案，及近人研究成果，對薩滿信仰有通盤的瞭解和綜述，本書之貢獻毋庸置疑。作者除了在「薩滿信仰」一詞上有所堅持之外，他懂得滿文翻譯，所以像大陸學者通用「努爾哈赤」的名詞，作者認為應該使用清初最早文字記錄用「努爾哈齊」一詞。

就本書結構看來，作者討論薩滿信仰的淵源到它的社會功能，讀者可以瞭解薩滿發展的脈絡。不過若干敘述重複出現，是為本書之瑕。如第六章為本書結論，但第五章就已綜合了前幾章的研究成果。頁 36-37 引《雞林舊聞錄》有將近一頁，到頁 130 又重引一次。頁 156 講《盛京皇宮》的宮廷祭祀活動，其實已在頁 35 中提及。頁 153 講伯衣薩滿，也已見於頁 35。還有前幾章註解之中出現的書名，在第五章又有作者出處等，如 161 註 7《雞林舊聞錄》在第二章的註 74 就出現作者出處等，到第五章又有。

1 富育光著，《薩滿教與神話》（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富育光與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教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定宜莊、劉小萌著，《薩滿與東北民族》（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再如講克木土罕領神的故事頁 30 並無註解，頁 105 重述時才註明出處。

本書另有一些語意不明的論述，如頁 106 說「儼文化稱面具文化；薩滿信仰稱爲裸面文化不正確」，但作者並未指出是何人的說法，就作者所舉的薩滿戴面具跳神的地區不多，附圖中的薩滿跳神也沒有戴面具的圖像。頁 37 引《雞林舊聞錄》提到請神送鬼時扮鬼者穿鬼衣、戴鬼臉，形若真鬼，似乎好像薩滿跳神時不戴鬼面具，只有送鬼才戴面具。頁 129 說：「後世習稱薩滿爲大神，而札立爲二神」。頁 35 中卻提及：「薩滿分大薩滿和二薩滿，大薩滿本領高，二薩滿又稱札立是助唱神歌」。到底薩滿是不是「神」，作者並沒有解釋清楚。

作者肯定的說薩滿信仰盛行的地區，人們的心理疾病、功能疾病，及器官性疾病，幾乎都依賴薩滿跳神治病。民俗醫療具有超自然的作用，在北亞草原族群中具有正面的社會功能。薩滿跳神的儀式讓精神達到純淨，以達到治療疾病的效果，此法在新近的醫學研究獲得證明，但是薩滿是否也提供患者各種草藥的藥方，這點似乎值得將來再進一步研究。作者在頁 173 言及：「否定薩滿信仰的學者，認爲薩滿信仰是一種迷信，薩滿跳神治病，愚昧無知，害人不淺。」到底薩滿跳神治病有沒有實效，這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從戶口冊所見東北地區人們的疾病，與一般漢人地區患的疾病大同小異。²例如〈遼陽廣寧界內蘇莊頭家口冊〉中有關疾病的記錄，有眼疾、失明、腿疾、出痘、瘟疫、瘋疾、殘疾、頭瘡。³在戶口冊中比較常見的小孩疾病大概是出痘。⁴嘉慶七年(1802)這年在遼陽、廣寧地區有莊頭呈報禾稼被水滄澇，⁵在蘇莊頭家口冊中記載死亡人數有二十一位，

² 目前大陸藏有清代戶口冊至少有三處，第一是瀋陽遼寧省檔案館；〈盛京內務府戶口冊〉（瀋陽：遼寧省檔案館藏）。第二爲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三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這些戶口冊的登記方式以族、戶爲主，每一族都有族長，每戶有戶長。以每一戶爲單位，對每個家戶下的成員有詳細記錄，包括姓名、世代、婚姻、職業、年齡、出生年的生肖、月份、時辰。依照清代管理旗人的「三年比丁」政策，戶口冊的資料每三年更新一次，有些戶口冊會記錄嬰幼兒和成年人疾病和死亡的原因。

³ 〈遼陽廣寧界內蘇莊頭家口冊〉（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⁴ 像銀兩莊頭唐孔曾之子唐慶什六歲入檔，左目幼時出痘損壞，見〈內務府來文〉，土地房屋類，第 1809 包，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乾隆五十九年內務府呈報承安名下入官莊頭王有，其長子大群、次子二群，均於本年五六月內先後出痘疹病故。〈內務府來文〉，土地房屋類，第 1847 包，乾隆五十九年九月。

⁵ 〈內務府來文〉，土地房屋類，第 1866 包，嘉慶七年十一月。

係因流行瘟疫、出痘。⁶如果這些地區完全依賴薩滿跳神來祭祀天花、麻疹的娘娘神，那麼跳神活動對於疾病的治療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

□賴惠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⁶ 瘟疫是一種傳染病，為何大人的瘟疫和小孩的天花一起流行，我也不清楚。不過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記載民國七、八年的河北省順義縣沙井村亦有類似的情況，小孩死於天花的有二十人，同年大人死於瘟疫者有十六、七人。參見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東京：岩波書店，1958年），卷2，頁58。

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陳鴻圖。台北：國史館，民國85年6月初版，279頁。

關於漢人移民台灣史的研究，過去長期受限於中國邊陲論的觀點，多循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觀察台灣的歷史，特別是有關清代的移墾開拓和土地制度演變的問題。這種歷史解釋觀點易產生強調邊陲與中心的共通性、忽視台灣內部的特性、偏重與中國史相關的研究課題等流弊。¹為克服此一基於研究者個人主觀意識型態，而導致研究課題受限制與研究深度不足等困難，嘗試結合不同學門訓練的學者集體進行區域研究，不失為可行的途徑之一。例如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成立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即是以區域研究的方式進行台灣社會文化變遷及其適應的研究。從民國六十年開始，該所即以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科技合作方式，從事台灣北部地區長期社會變遷的研究。其中尤以民國六十一年張光直先生推動該所與台灣大學及耶魯大學合作進行的「台灣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技綜合研究」（簡稱「濁大計劃」）最具代表性，範圍擴及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等，成為台灣研究重要的里程碑。成立於民國七十五年的中央研究院台灣田野研究室（後改為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延續此一科技整合的研究方式，結合歷史語言、民族學、近代史、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等院內四研究所的力量，在一個共同的研究計劃之下，進行台灣史田野資料的蒐集和研究工作。在第三期五年計劃

¹ 有關台灣經濟史研究的歷史解釋觀點，主要有三：中國邊陲論、階級剝削論、現代化論。參見葉淑貞，〈論台灣經濟史研究的歷史解釋觀點〉，《經濟論文叢刊》，22:4（1994年12月），頁477-503。

之中，台灣區域史科技研究計劃是其重要工作項目之一。同時，民族所的區域研究，除漢人墾殖史之外，亦與國際學界合作，進行福建與台灣地區民族誌的調查比較研究，以及海外華人社會與文化之研究等。本書即是台灣史研究在此一學術發展趨勢之下具體而微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首先指出台灣水利史的研究受到「濁大計劃」的影響，從過去著重科技史、制度史的研究，轉而擴大為生態史的研究，考察水利與區域發展、農村社會之間的關係等（頁9）。作者因此以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為例，探討兩個主題：一是水利開發、政府角色、區域發展三者相互之間的關係；二是以區域比較的方式，研究水利與社會文化適應的問題（頁9-10）。全書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四章，分別探討嘉南平原的農業環境及土地拓殖、清代的水利開發、水利開發的影響、水利開發與區域發展及官府角色等。作者對於史料的蒐集與整理用功甚勤，特別是地方志與碑刻及古文書的運用，對於嘉南平原早期的拓殖與清代水利開發的全貌，有完整而清楚的說明，可補充前人因資料闕漏而偏重台灣中、北部與宜蘭地區水利史研究之不足。²此外，作者亦能充分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討論水利開發對於農村社會的影響、嘉南平原與台灣北部及閩粵地區的比較研究、以及清代和日治時期政府角色的比較等處，獲致可觀的成果。

綜觀本書的研究取向與重要論述，仍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茲分述如下：

本書研究嘉南平原水利開發的例證，顯示如何掌握區域比較研究的重點，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作者比較嘉南平原、閩粵地區的發展與水利開發的關係，偏重兩者之間之共同之處，以歷史淵源說明之，仍不免陷入中國邊陲論的窠臼。然而從嘉南平原與台灣北部的比較，可知即使在台灣南北之間水利開發的模式，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如何從早期沿襲的閩粵移民模式蛻變成後期台灣特有的模式，才是區域比較研究的主題。舉例而言，作者指出明清之際閩粵地區的宗族逐漸取代官府開發水利的角色，康熙中葉以後嘉南平原也有類似的情形，水利開發多由宗族領導，宗族也藉

² 過去有關台灣水利史的研究，多偏重台灣中、北部與宜蘭地區，原因在於其古文書契資料相對豐富，而嘉南平原的資料較少之故。參見王世慶，〈從清代台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原載《台灣文獻》，卷36，期2(1985)，後收入氏著《清代台灣社會經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131-215。

此加強凝聚力（頁 239-240）。至於乾隆年間以後台灣北部水利開發的投資模式與水利組織都有私人投資企業化經營的情形，但在嘉南平原並不多見（頁 218-220）。由於北部的拓墾與水利開發成效超過南部，因此奠定清末台灣政治經濟中心北移的基礎。³到底傳統中國社會的宗族組織與現代化私人營利動機的企業組織如何影響區域發展，作者若能循此一脈絡探討區域發展，當更能突顯台灣史發展的特色。

比較清治與日治時期官府角色介入嘉南平原農田水利事業的情形，儘管兩者的消極與積極形成強烈的對比，但作者認為國家不同，表現的形式亦因之而異，兩者的比較是相對而言，沒有高下之分（頁 253-254）。此種說法顯示作者不抱持殖民地剝削論或現代化論等任何特定的歷史解釋觀點，而代之以廣泛的收集資料，進行客觀的歷史分析。但如前所述，清代台灣水利開發具有南北地域性的明顯差異，特別是傳統的宗族組織與現代化企業組織的不同。清代閩粵地區和嘉南平原的宗族扮演取代官府開發水利的角色，而日治時期政府重新介入水利修築，政府與當地宗族社會的關係如何調整適應，亦即由台灣總督府策劃監督並補助的嘉南大圳完成之後，其經營管理運作是否導致當地農村社會的變遷，有異於清代政府消極放任之下的發展情形？至於台灣北部的水利開發則深具私人投資營利取向，這種企業組織的社會與政府的關係在清治與日治時期有何不同？總督府介入水利事業的方式是否因地域性的社會組織差異而不同，進而對於清代台灣原有的南北社會差異產生影響？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亦即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介入方式，若因而導致不同的影響，就值得深入探討。

由於個人獨力進行區域研究，不若科技整合能收集體研究的成效，雖可參考前人相關的研究成果，亦僅能做驗證的工作，不易有突破性的創見。若能針對區域性特色，從技術觀點探討自然生態與人文的關係，或能有進一步的突破。以嘉南大圳為例，水利工程需要高度的技術與巨額的資本，不是台灣本地農民的技術與經濟能力所能負擔，故有日本政府的強力介入（頁 250）。現代化的水利灌溉工程固不待言，即便是傳統的水利技術，台灣中、北部所具有的優越條件，如水源豐沛、丘陵山坡、木料柴草，加上業戶資金，均非嘉南平原的自然、人文條件所能比擬。有關嘉南平原

3 王世慶，《清代台灣社會經濟》，頁 201。

的水利開鑿與組織經營，所牽涉的資源與技術問題，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角度。⁴若能結合科技史與田野調查資料進行研究，當更能突顯嘉南平原水利開發的特色，以及清朝政府與日本政府介入農田水利方式之不同，實與自然環境和技術考量有關。

總之，作者運用廣泛蒐集的史料，研究清代嘉南平原的水利開發，清楚且完整地說明了康熙中葉以後，台灣從每年一穫稻作轉變為雙穫制的過程及其影響，有助於學界對此問題的認識。唯全書校對欠佳，數字頗有舛誤，且若干重要問題缺少深入分析，是為美中不足之處。但本書係由作者碩士論文改寫，能有此成績，殊屬不易，假以時日，當能對台灣史研究有更大的貢獻。

□劉素芬·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
- 4 楊聯陞先生對於中國歷史上公共工程的研究極具啟發性，可以參見 Lien-sheng Yang, "Economic Aspects of Public Works in Imperial China," *Excursions in Sinolog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XXIV, 1969), pp. 191-248；陳國棟譯，〈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收入楊聯陞，《國史探微》（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189-266。

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正文483頁，目錄2頁，前言3頁。

近十年來，大陸方面對於蔣中正（介石）的研究相當積極，各類研究專著、家族秘史、記實小說等，數量十分可觀。僅就蔣氏傳記而言，以《蔣介石傳》為名者，即有王俯民著及楊樹標著兩種，王俯民另著有《蔣介石詳傳》。此外，尚有宋平著《蔣介石生平》（1996年增訂再版時，更名《蔣介石全傳》），嚴如平、鄭則民著《蔣介石傳稿》等。1993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再版時更名為《蔣介石年譜》），由檔案出版社出版，這是大陸方面首次以「蔣介石年譜」為名出版的史著，十分受到注意。但是該書實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將其皮藏毛思誠撰《蔣公介石年譜初稿》重行整編，更名出版，並非新著。且毛稿記事僅至民國15年，該稿曾於1937年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為名出版。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出版《蔣介石年譜初稿》時，僅係就毛稿與《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作一互校，補正其中闕漏，並未另行增訂民

國 15 年以後記事，因此該書實際上應視為《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之另稿。至 1995 年 11 月，由李勇、張仲田編著的《蔣介石年譜》出版，這應該是大陸地區第一次出現完整的蔣氏年譜。

李勇與張仲田兩位作者的背景，書中未作介紹。〈前言〉之中，兩人曾就編著分工作一說明，張仲田負責編寫 1887 年至 1949 年，李勇負責編寫 1950 年至 1975 年部分。兩人在〈前言〉中，同時說明了編著本書的兩個目的，第一在作為深入研究中國現代史、國共兩黨關係史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權的參考，謂：「在中國現代史的舞臺上，蔣介石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舊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他曾經給災難深重的舊中國留下深深的印記，其統治時期也被人們稱為『蔣家王朝』時期，因此，研究蔣介石的活動，對於深入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國共兩黨關係史，了解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權的階級實質及其統治特點和手段，揭露蔣介石在政治上採取的兩面派手段，和反共反人民的本質特徵，是有重要意義的，基於此目的，我們編寫了這本《蔣介石年譜》。」第二在激發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熱情和歷史責任感，謂：「現在，新中國已經走過了四十三年的光輝歷程，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年學生在學習和了解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同時，也很有必要了解蔣介石如何施展權術，依靠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和工農群眾的鬥爭，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及其違背歷史潮流走向失敗的過程，以便從中更加深刻地認識新中國締造之艱難，認識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真理，認識中國現代史的發展證明了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而必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規律，加深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激發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巨大熱情和歷史責任感。」

全書有系統地記錄了蔣中正從 1887 年出生至 1975 年在臺北病逝的八十八年重要事蹟。較之此地常見的數本蔣氏年表，如陳布雷等編《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7 年）、王德勝編《蔣總統年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42 年）、《總統蔣公哀思錄》編纂小組編《總統蔣公年表初稿》（《總統蔣公哀思錄》第三編，台北，民國 64 年），本書有若干值得稱道之處。就資料而言，本書引用了不少近年來所公布的新資料，例如浙江方面在蔣氏故鄉溪口所做的調查；中山艦事件、西安事變等事件，以及國共關係的相關文電等。另外，由記事中亦可發現，兩位編著者的資料引用範圍十分廣泛，若干內容在相關書籍中皆未見記

載，甚至一些蔣氏的家務亦記錄其中。但是十分可惜的是，本書對於各項資料徵引，均未註明出處，使讀者無法就所引資料之相關問題作進一步探討；書末亦未列徵引書目，供讀者參考，這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大缺失。

另一項值得稱道的地方，為兩位編著者對資料的消化程度相當具有水準。書中對於所引用蔣氏發表的文電、講話等，大多能掌握要點，以節錄或摘要方式將原意表達出來，而在節錄或摘要原文時，對於「反共」、「共匪」等字樣亦未加以隱諱。如1950年3月13日，載蔣中正發表題為〈復職的目的與使命〉的講話，謂：「提出『現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計劃，改為“一年整訓，二年反攻，掃蕩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說：從現在起，少則三年，多至五年，要來達到我們消滅共匪，復興中華民國的目的。』」（頁400）僅節錄不到一百字的原文，即將這篇講詞的重點表現出來。再如1957年10月10日，蔣中正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對大陸同胞及共軍官兵，提出六大自由、三大保證，書中謂：「為慶祝『雙十』節發表文告，提出反攻大陸後恢復六項自由：（一）勞動就業自由，廢除工奴與集中營；（二）溫飽康樂自由，廢除合作社，國營農場，糧食配給暴政；（三）思想研究自由，根絕洗腦筋；（四）經濟自由，取消統購統派與公私合營；（五）生命安全自由，取消階級鬥爭，禁止製造仇恨清算；（六）選擇生活方式自由，發揚民族精神，保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還提三大保證：（一）凡脫離共軍來歸官兵一律一視同仁，論功行賞；（二）凡參加中共團體既往不咎；（三）除元凶外一律平等對待。」（頁428）文字雖係摘要，但對照原文，內容尚不失原意。

當然，本書亦有若干缺點，除前述徵引資料未註明出處外，編著者對於資料的取舍標準未予說明為另一缺失。對於蔣中正這樣一位執掌中華民國黨政軍大權達五十年之久的政治強人，其一生事蹟絕非本書四百八十餘頁的篇幅所能完整涵蓋，因此編著者如何選擇相關資料，是在閱讀本書時需要了解的一個問題。但是書中未見有「編輯說明」或「凡例」等編輯體例及資料取舍標準的說明文字出現。雖然編著者在〈前言〉中稱：「作者在編寫《蔣介石年譜》過程中，本著尊重歷史和史為今用的原則，在史料的選擇上採取嚴肅認真、務求真實的治學態度，並注意吸取了國內外史學界科學研究的一些新成果、新材料，在選材上，主要從政治上的大是大非著眼，略去其個人生活方面的『佚事』、『奇聞』等。」但這只能視為編著者選擇資料的態度，而無法視為選擇資料的標準。事實上，僅就書中各

年記事所佔篇幅，編著者就有必要說明其對資料取捨之標準。書中各年記事，最多者為 1926 年的四十三頁；其次為 1949 年的二十八頁。再來依次為 1925 年及 1948 年的二十七頁、1937 年的十八頁、1927 年十七頁、1924 年十五頁、1936 年十三頁、1931 年及 1946 年十二頁、1933 年、1938 年、1945 年及 1947 年的十一頁。其餘各年均均在十頁以下，其中 1887 年至 1917 年間，大多只有一頁；1951 年至 1975 年間，多為三或四頁；1975 年只有一頁。此種分配看來十分不合理，如果依 1926 年的記事標準，1949 年當不止只有二十八頁，而 1926 年以後各年的篇幅亦均會擴充。但是編著者為何獨重視 1926 年呢？編著者未加說明，讀者自然無從理解。再就各年記事的内容而言，如以 1926 年以前部份與《蔣介石年譜初稿》（或《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相對照，可以瞭解編著者應該是參考了該書，不過在對照的過程中，也可發現若干問題，如 1926 年 10 月 20 日，載「電囑漢口唐生智切實負責統籌兼顧全局，不必事事請命。」（頁 132）但在《蔣介石年譜初稿》中，同一日卻有「電示魯滌平、熊式輝對贛整個戰略」、「電囑唐生智，負責籌顧全局」及「電囑何應欽相機處理閩事」三件電示（頁 749-750），不知為何編著者只選錄電囑唐生智一件？再如人事任命的記事亦有類似情形，如 1925 年 1 月 23 日，載「呈請任命胡謙為軍官學校教育長。」（頁 77）而《蔣介石年譜初稿》中，同一日的記載則為「呈請任命胡謙為軍官學校教育長，張元祐為戰術主任教官，吳國楨為兵器主任教官，李中元為工科主任教官兼工兵隊隊長，胡樹森為步兵總隊長，陳復為第一隊隊長，童錫坤為第二隊隊長，梁端寅為第三隊隊長，蔡忠笏為炮兵隊隊長，黃在璣為輜重隊隊長。」（頁 298）顯然當日與胡謙同時還有一批主任教官與隊職官的任命，不知編著者為何只列胡謙一人？事實上，此項任命是軍校增設教育長之後，連帶進行的一次大幅度人事調整，實不宜只列胡謙一人。至於 1926 年以後各年的記事亦可見到這種情形，如蔣氏來台後，曾為胡適、陳誠的逝世，親撰輓聯；為孔祥熙的逝世，親撰事略，但書中為何有輓胡適聯（頁 442）、撰孔祥熙事略（頁 462）的記事，卻沒有輓陳誠聯的記事？凡此如編著者先行加以說明，當可減少讀者不少疑問。

此外，本書在若干方面，仍未能擺脫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甚至加入編著者個人主觀的見解。如 1926 年 5 月 15 日，對蔣氏在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之〈整理黨務案〉，謂：「這些提案，再次暴露了蔣介石的

反共思想。」(頁114)同年5月22日,稱:「蔣介石在會上為其提出的整理黨務案進行詭辯」(全上)。再如1949年9月20日,敘及蔣氏發表〈為本黨改造告全黨同志書〉,謂:「還誣蔑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是『極權主義暴政』,因此要求國民黨員同共產黨『拼命搏鬥』」(頁391);1953年2月5日,稱:「由於艾森豪威爾聲言『解除臺灣中立化』,蔣介石發表聲明說:『實為美國最合理而光明的舉措』,開始大肆叫囂『反攻大陸』,並以此加強對臺灣人的統治,肅清異己分子。」(頁410)同年5月24日,稱:「准許不忠於自己並和蔣經國有矛盾的臺灣省主席吳國楨『辭職』,批准吳去美國講學。」如此自由心證、隨意扣帽子的寫法,不僅不符合編著者所稱「嚴肅認真、務求真實的治學態度」,同時也減損了本書的學術價值。

本書記事亦有若干錯誤,包括時間、人名、機關等的錯誤,此處不一一列舉。引用資料亦有內容不完整之處,如1925年2月18日,載「決定進攻平山計劃,主要內容為:作戰方針,軍隊部署,搜索,行軍日程,給養。」(頁81),對照《蔣介石年譜初稿》稱此計劃之內容為「(一)作戰方針,(二)軍隊部署,(三)搜索,(四)行軍日程,(五)聯絡,(六)給養」(頁311),本書少了一項「聯絡」,不知是否編著者遺漏了?另有若干記事重複,如1921年7月5日載「孫中山來電。『西寇擊破易,收拾難,須多一月始得凱旋,我軍經入邕寧,明後日,余當馳往巡察,速去相助。』」與7月20日載「孫中山來電,謂平定廣西的戰事已經接近勝利,惟收拾殘局急需助手,望速來廣西相助。」實為同一件事,按5日為孫電發出之日,20日為蔣氏收到孫電之日;另1926年1月1日所載「晚五時,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宴會少校以上官長,並訓話。」與1月2日載「在廣州衛戍司令部設晚宴招待少校以上軍官」,亦為同一件事,應在1月2日;1950年4月16日,載「在陽明山莊召集高級將領發表題為〈軍人魂——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的講話」與5月16日載「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五期學員開學典禮上作〈軍人魂〉訓話」,為同一件事,應在4月16日。此外,書中有若干記事,僅有月份,而無日期,事實上編著者只需做進一步查證,即不難查出這些記事中的大部份日期,如1955年9月有四條記事無日期,經查證「主持中央警官學校復校典禮」在9月1日;「在華僑文教會議上,要海外文教人士完成『復國』任務」在9月2日;「巡視高雄海域」在9月18日;「至金門巡視防務」在9

月 26 日；此當係編著者技術上的疏忽。

綜合而言，本書雖有若干缺點，但是仍不失為現階段十分具有參考價值的一本蔣氏年譜。由此書的出版，不禁使我們要提出一個問題：蔣中正先生是舉世聞名的反共領袖，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關鍵地位的國家領導人，如今大陸方面繼《蔣介石傳》之後，又出版《蔣介石年譜》，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一部蔣中正先生的完整傳記或年譜問世？蔣中正逝世距今，已經二十二年，這段期間，國內相關史政機構亦曾計劃編纂蔣氏年譜，但均未能執行。目前國內學者所較常參閱之相關書籍，僅有前述之三種年表，但均嫌簡略。而由秦孝儀擔任總編纂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內容雖稱詳細，但該書自民國 67 年 10 月出版至今，仍未公開發行，外間流傳不廣，且該書只編至民國 38 年，38 年至 64 年部份僅有年表。事實上，蔣氏的資料大都存於臺灣，習稱「大溪檔案」，若能基於現有基礎，再充分運用這批檔案編纂一部完整的年譜，應是一項難度不高的工作。該批檔案已於民國 84 年歸國史館典藏，定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並決定先行公開民國 12 年至 26 年部份。但是筆者所衷心期望者，為國史館能儘速完成此一檔案全部的編目整理工作，早日開放供研究者參閱運用，並能延請學者專家，詳閱此一珍貴資料，共同編纂一部詳盡的蔣中正年譜，為蔣氏畢生勳業留下完整的記錄。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謄寫，電腦打字稿並附磁片尤受歡迎。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三份。
- (7)來稿請寄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學位論文

台灣各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 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丘慧君輯**

畢業校所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
政大教育	權容玉	民初中國教育思想演變之研究	陳伯璋 陳迺臣	1994
政大教育	崔香順	梁啟超(1873-1929)教育思想與其轉變因素之剖析〔博〕	劉興漢 陳迺臣	1995
台大政治	洪聖斐	日本三井財閥與辛亥革命	許介麟	1997
台大政治	邱麗珍	國民黨黨營經濟事業發展歷史之研究，1946-1996	許介麟	1997
政大政治	李相沃	張之洞的政治思想及其實踐	楊樹藩	1986
政大政治	蔡體楨	江蘇與預備立憲，1900-1911	李定一	1986

* 本刊第二、四、五、七期曾收錄台灣各大學新聞、外交、教育、東亞、大陸問題等非歷史科系之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提供學界參考。本期所收錄者，計有台灣大學之政治研究所（台大政治）、法律研究所（台大法律）、社會研究所（台大社會）、經濟研究所（台大經濟），台灣師範大學之三民主義研究所（師大三民）、體育研究所（師大體育），政治大學之教育研究所（政大教育）、政治研究所（政大政治）、外交研究所（政大外交）、民族研究所（政大民族）、東亞研究所（政大東亞）、法律研究所（政大法律）、三民主義研究所（政大三民），中興大學之法律研究所（中興法律）、財政研究所（中興財政），東吳大學之社會研究所（東吳社會），淡江大學之美國研究所（淡江美國）、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淡江國戰），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輔仁應心），文化大學之中美關係研究所（文化中美）、日本研究所（文化日本）、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文化民僑），及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政戰政治）等校博碩士論文目錄。另各校三民主義研究所有關中國、孫中山或蔣中正思想研究者，因數目甚多，此處未加收錄。目錄之中〔博〕指博士論文。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小組助理

政大政治	陳儀深	《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博〕	易君博 張玉法	1987
政大政治	高太植	顏元的經世思想	蔡明田	1989
政大政治	陳政如	陳獨秀民主思想研究	何信全	1994
政大政治	潘台雄	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君主立憲思想， 1898-1911〔博〕	孫廣德 張治安	1996
政大政治	李 熊	自強運動時期的財政研究	王爾敏	1996
政戰政治	胡瑞舟	中國辛亥革命形成之研究	蔡政文	1986
政戰政治	楊碧玉	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	張世賢	1986
政戰政治	吳輝旭	國民革命與台灣抗日民族運動	萬世章	1987
政戰政治	蕭耀清	國父革命方略未能貫徹因素之分析 ：1905-1913年	李守孔	1987
政戰政治	王智榮	胡漢民政治人格之研究	張世賢	1987
政戰政治	高小蓬	民國初年的婦女運動，1911-1913	張玉法	1988
政戰政治	劉慶祥	力行社與安內攘外政策之研究	鄧元忠	1988
政戰政治	陳福成	中國近代政治結社之研究	陳水逢	1988
政戰政治	李文師	論中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吳安家	1988
政戰政治	郭鳳城	張國燾政治人格之研究	張世賢	1989
政戰政治	蘇哲鋒	討袁時期國父思想戰之研究	許承璽	1989
政戰政治	李亞明	北伐前後中國留俄學生之研究	關素質	1990
政戰政治	王進義	三民主義力行社組織與策略之研究	滕 傑	1990
政戰政治	蔣海朋	中山先生領導倒滿革命團體之公眾 關係	陳德禹	1990
政戰政治	陳奇雷	抗戰時期社會動員理論之研究：以 兵役政策為例	林鍾沂	1991
政戰政治	陳建仁	抗日戰爭前中共統戰之研究（九一 八事變——西安事變）	蔣緯國	1992
政戰政治	張天燈	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的方略	陳伯鏗	1992
政戰政治	林富水	不對稱結構下的談判行為研究—— 國共1936-1945年談判案例分析	劉必榮	1995
政大民族	關家莉	尼布楚條約簽定的背景因素研究	李毓澍	1991
政大民族	陳殷宜	清代乾嘉時期新疆貢玉制度之研究	莊吉發	1992

政大民族	陳旺城	張格爾事件之研究	劉義棠	1992
政大民族	李信成	楊增新在新疆(1912-1928)	李毓澍	1992
政大民族	吳嘉玲	清代乾嘉時期遣犯發配新疆之研究	莊吉發	1993
政大民族	翁靜梅	清廷與哈薩克在新疆貿易之研究 ——以乾隆朝為中心	林恩顯	1993
政大民族	劉子鳳	從俄人東進分析——清初東北的動 亂與開發，1644-1795	李毓澍	1993
政大民族	吳秀瓊	清朝前期漢在蒙古的經濟活動：清 朝建立——清準戰爭結束，1636-1759	林修澈	1993
政大民族	歐陽增梁	準噶爾與清朝之關係	莊吉發	1993
政大民族	溫順德	清朝乾嘉時期關內漢人流移東北之 研究	莊吉發	1993
政大民族	張明杓	「三一運動」前後韓國獨立軍在中 國東北地區抗日之研究	張存武	1993
政大民族	黃美秀	清康雍乾三朝八旗生計問題之研究	陳捷先 莊吉發	1994
政大民族	高素蘭	盛世才與國民政府關係之研究， 1933-1944	胡平生	1994
政大民族	高錦惠	清乾嘉道三朝烏魯木齊地區之開發	劉義棠	1994
政大民族	蕭衡萱	晚清新疆省的財政，1878-1911	林恩顯	1995
政大民族	楊慶平	清末台灣的「開山撫番」戰爭， 1885-1895	許雪姬	1995
政大民族	鄧秋華	清代索倫部之研究	莊吉發	1996
文化民僑	王育傑	清代平埔族與漢人土地轉移關係之 研究	呂秋文 洪敏麟	1987
文化民僑	黃建淳	新加坡華僑會黨對辛亥革命影響之 研究	程 運	1988
政大外交	劉翼楚	美國對中共之技術轉移政策（自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90年止）	蘇 起	1990
政大外交	蔡東杰	李鴻章與清季外交	金神保	1993
政大外交	陳湘芬	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外交政策與對外 關係	金神保	1995

政大外交	姜宜君	1938 至 1942 年關於中美財政軍事 援助方案之探討	趙國材	1995
政大東亞	黃健夫	陳獨秀與中國托派	李天民	1989
政大東亞	陳金富	中共統一戰線之研究：以 1945 年 — 1949 年之中共統戰為例	曾永賢	1990
政大東亞	林慶南	1935 年至 1949 年國共談判之研究	李英明	1993
政大東亞	譚志強	中葡澳門問題始末，1553-1993〔博〕	楊逢泰	1993
			趙國材	
政大東亞	蔡熙駿	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係之研究 ， 1920-1943〔博〕	段家鋒	1993
文化日本	金東琳	日本帝國主義の台灣、韓國地域に 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の比較研究	宋越倫	1993
淡江國戰	匡曉薇	馬關和議的談判研究	劉必榮	1994
淡江美國	林立樹	司徒雷登調解國共衝突之理念與 實踐〔博〕	李本京	1992
淡江美國	賴維中	中國遊說團與中國代表權問題 （佰萬人委員會案例研究）	李本京	1993
文化中美	許志麟	抗戰勝利後中美關係惡化原因之 研究， 1945-1949	楊紹震	1987
文化中美	許學士	1920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與基督教徒 的政治觀	王成勉	1988
文化中美	張銘森	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主要論點之評 析	毛樹清	1988
文化中美	黃春森	魏德邁與中國， 1944-1947	王成勉	1989
文化中美	羅震華	中共在大使級會談中談判策略之 研究， 1955-1957	蔡瑋	1989
台大法律	帥珂羅	清代婦女之法律地位	戴炎輝	1968
台大法律	李愛香	固有法上尤其清代之婚姻法	戴炎輝	1977
政大法律	王 文	中國典權制度之研究	陳顧遠	1971
政大法律	陳 泉	清律贖刑之研究	陳顧遠	1972
中興法律	那思陸	清代州縣衙門審斷制度之研究	林咏榮	1980
文化法律	尤 清	近代社會變遷與法律變遷之研究	楊玉宏	1969

台大社會	鄒理民	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	葉啓政	1981
台大社會	胡克威	世界體系與邊陲地區的低度發展——兼論晚清的社會變遷，1840-1911	蕭新煌	1981
台大社會	馬康莊	近代儒家思想轉化的結構分析	葉啓政 瞿海源	1983
台大社會	郭美蘭	近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之研究	蕭新煌	1988
台大社會	王宏仁	戰後台灣私人獨占資本之發展	蕭新煌	1988
台大社會	郭正亮	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轉化，1945-88	蕭新煌	1988
台大社會	翁仕杰	台灣漢人傳統民變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轉型——理念型分析：從反抗官僚特權到爭取平等待遇	張炎憲	1989
台大社會	蕭阿勤	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1934-1991：知識社會學的分析	孫中興	1991
台大社會	廖美	台灣農民運動的興盛與衰落：對二〇年代與八〇年代的觀察	蕭新煌	1992
台大社會	游秀玫	殖民體制下的文化革新——1920年代的同風會與文化協會	章英華	1995
政大社會	吳姿嫻	日據時期台北地區死亡率長期變遷趨勢研究，1906-1942	楊文山	1996
東吳社會	林倖妃	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	張炎憲	1994
東吳社會	陳俊昇	近代台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政權與社會形構	張炎憲	
東海社會	涂一卿	清代台灣社會變遷與地方領導精英——霧峰林家與板橋林家之比較	章英華	1988
東海社會	許甘霖	黨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石化業個案研究	王振寰	1993
東海社會	林寶安	台灣地方金融與地方社會——信用合作社的發展歷史與社會意義	高承恕	1994
東海社會	王鳳雄	日據時期台灣社會解放運動及論述：以《台灣民報》作為分析場域，1920-1932	朱文鴻	1995

台大經濟	施佳佑	貨幣制度的選擇：以日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經驗為例	葉淑貞	1992
台大經濟	余國瑞	日據時期台灣新式製糖工業	葉淑貞	1992
台大經濟	葉彥珣	戰後與日治時期台灣原料在甘蔗契約買收制度之研究	吳聰敏	1993
台大經濟	樊家忠	戰後土地改革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	葉淑貞	1995
台大經濟	謝欣玲	工資差異研究：1941-43年的台灣實證	劉鶯釧	1995
台大經濟	謝嘉雯	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的決定因素：戰前與戰後的比較	劉鶯釧	1995
中興財政	趙意味	日治時期台灣地方賦稅之研究	曾巨威	1996
中興財政	林聖傑	影響台灣關稅稅額之因素，1897-1994	葉淑貞	1996
師大三民	吳昆財	戰後國共談判與國家政權重建之關係（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兼論孫中山與張君勱之憲政理論	李炳南	1994
師大三民	王廷峰	民國元年南北議和對中山先生革命建國事業影響	傅宗懋	1995
師大三民	胡振東	聯俄容共時期國民政府權力結構之演變(1922-1928)	李炳南	1995
政大三民	葉定國	孫中山實業計畫之內在意涵——一個發展社會學面向的研究	李英明	1994
輔仁應心	陳祥美	梁啟超生命夢想的形成與發展：一種心理傳記學研究	丁興祥	1994
師大體育	陳世恩	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之體育思想	許義雄	1989
師大體育	徐元民	戰前十年中國體育思想之研究，1928-1937	許義雄	1990
師大體育	李姬淑	近代中韓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比較	許義雄	1991
師大體育	曾瑞成	新文化運動時期之體育思想，民國8年—民國16年	許義雄	1991
師大體育	蔡宗信	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	蔡禎雄	1992

		之研究		
師大體育	蔡政杰	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近代體育之發展	許義雄	1992
師大體育	鄭健源	論毛澤東的體育思想——以辯證唯物論的觀點	許義雄	1993
師大體育	程瑞福	清末女子體育思想的形成(1894-1911)——以自強保種思想為中心之探討	許義雄	1994
師大體育	劉進枰	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會籍演變之歷史考察，1949-1981	蔡禎雄	1995

香港各大學研究所歷屆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香港大學歷史系(1961-1996)

作者	論文題目	畢業年
SINN Yuk Yee, Elizabeth	The Tung Wah Hospital 1869-1896: A Study of a Med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 in Hong Kong (博)	1987
A. E. SWEE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1945-1954: Vari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Policy Making. 4 vols. (博)	1989
Lesley Jean FRANCI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in Shanghai, 1931-1937 (博)	1991

* 本論文目錄承香港大學歷史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鄒重華先生、博士班研究生黃秀顏小姐，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區志堅先生等協助蒐集，謹此致謝。本刊另於第二、四期曾刊載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博碩士論文目錄，敬請參考。目錄之中(博)指博士論文。

- | | | |
|---------------------------|--|------|
| FUNG Chi Ming | History at the Grassroots: Rickshaw Pull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1874-1992 (博) | 1996 |
| NG Yuk Lun,
Peter | The 1819 Edition of the <i>Hsin An Hsien-Chih</i>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with Translation and Notes | 1961 |
| CHAN Man Yue,
Mary |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Hong Kong, 1895-1911 | 1963 |
| Takemichi HARA | Chinese Policy in Manchuria, 1905-1911: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 1971 |
| WONG Chi
Keung | The Black Flags: a study of their emergence and their confrontation with the French in Tonkin, 1865-1885 | 1972 |
| LIN Ho Yuke | Local Elitist Activities: A Study of the Kwangtung Gentry in the Tao-kuang Period(1821-1850) | 1974 |
| G. C. EMERSON | Stanley Internment Camp, Hong Kong, 1942-45: A Study of Civilian Internmen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 1975 |
| HUEY Man
Chiu | Bouvet, Le Comte, Du Halde: The New Awareness of China, 1650-1750 | 1978 |
| CHEUNG Tsui
Ping, Lucy | The Opium Monopoly in Hong Kong, 1844-1887 | 1986 |
| C. KRIPALANI
-THADANI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Concepts of M. K. Gandhi and Mao Zedong, 1919-1949 | 1987 |
| NG Wing Chung,
Vincent | <i>Huiguan</i>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1912-41 | 1987 |
| WONG Kam
Cheong |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Writing in Late Ch'ing China | 1987 |
| LAM Man Sum | Hong Kong and China's Reform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Reports of Four Hong Kong English Newspapers(1895-1912) | 1987 |
| LEE Shun Wai |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1918-1925):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Search for National Regeneration and Personal Identity | 1988 |
| YU Sau Ping | The Governorship of Yang Zengxin in Xinjiang, 1912-28 | 1988 |
| TSUI King Chung, |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 Study of | 1988 |

Francis	the View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1860 and 1919	
Jeanette	The Governorship of John Pope Hennessy,	1990
BRESNIHAN	1877-82: Reform and Foreign Policy	
LI Yuk Wai	The Chines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he Philippines	1991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CHU Yik Yi,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1952: A Reappraisal	1991
Cindy	of a Critical Period	
LOCK Chung	"To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	1993
Sum, Andy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Hong Kong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a Factor, from the	
	Late 1940s to the Late 1950s	
CHAN Wai Yi	Cold War in Asia: An Appraisal of American	1995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Conflict	
CHAN Kwong	A Warlord Regime and a Colony: A Comparative	1995
Tak	Study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Canton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1929-1936	
NAKANO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Expatriate Wives in Hong	1995
Yumiko	Kong: The Reproduction of a Conservative Social Patterns	
MOK Kin Wai	Lineage and Elite Domina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1996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Shunde County, Guangdong	
MARK Chi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1996
Kwan	Peaceful Coexistence Initiative, 1954-1957	

香港中文大學(1987-1996)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
何炳堅	滿清政府挽救其政權的最後嘗試：戊戌變法及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博〕	王爾敏	1988
梁炳華	中英就九龍城寨治權之交涉(1898-1948)〔博〕	吳倫霓霞	1993
游子安	清代善書與社會文化變遷〔博〕	羅炳綿	1994
李盤勝	康熙帝之民族政策研究〔博〕	羅炳綿	1995

- | | | | |
|---------------|--|------|------|
| 胡志偉 | 劉師培政治思想研究〔博〕 | 梁元生 | 1995 |
| 葉國洪 | 張之洞與其所辦近代工業——從中體西用論剖析
清末工業化運動〔博〕 | 吳倫霓霞 | 1995 |
| 鄭宗義 | 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蕡山到戴東原〔博〕 | 劉述先 | 1995 |
| 邢福增 | 基督教救國——徐謙、馮玉祥、張之江〔博〕 | 劉義章 | 1995 |
| | | 梁元生 | |
| 麥炳坤 | 中國基督教會與社會主義運動：基督教知識分子的反應與調適之路，1945-1954〔博〕 | 梁元生 | 1996 |
| 李光雄 | 近代村儒社會職能的變化——翁仕朝(1874-1944)個案研究〔博〕 | 吳倫霓霞 | 1996 |
| 黃永豪 | 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鄉紳、宗族與租佃關係 | 科大衛 | 1987 |
| 游子安 | 論明清時代商、礦業的合伙制與伙計制 | 羅炳綿 | 1987 |
| 李傑泉 | 中國二、三十年代的黨化教育(1927-37) | 許冠三 | 1988 |
| 余耀庭 | 軒尼詩在香港的華人政策 | 吳倫霓霞 | 1988 |
| 杜榮佳 | 論光緒年間(1875-1895)的清議 | 鄭兆江 | 1988 |
| 鄭宗義 | 當代新儒家探索：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研究之一例 | 王爾敏 | 1989 |
| 邢福增 | 晚清中國基督徒對宗教信仰與文化環境的調適(1860-1911) | 王爾敏 | 1989 |
| 黃美施 |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與英法聯軍在北省地區的和戰推移(兼論清政府與北省地方官對聯軍壓境的態度及因應) | 王爾敏 | 1989 |
| 吳志華 | 中國史學的新趨向 | 羅球慶 | 1989 |
| 胡志偉 | 論阮元的學術思想及其對清代學術的貢獻 | 遼耀東 | 1990 |
| 李家駒 | 一場「神」或「上帝」的爭論——早期來華新教
教士對於“God”一詞的翻譯與解釋(1807-1877) | 葉漢明 | 1991 |
| | | 郭佩蘭 | |
| 溫偉國 |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買辦研究 | 吳倫霓霞 | 1991 |
| Chan, Kai Yiu | Big Business Financing in Modern China: A
(陳計堯) Case Study of the Flour Milling and Cotton Textile
Enterprises of the Rong Brothers, 1901-1936 | 葉漢明 | 1992 |
| 潘來基 | 資源控制與現代國家建構：國民政府對四川省重慶地區的稅務改革，1928-1945 | 葉漢明 | 1992 |

Chan, Yue Shan (陳宇山)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During the Governorship of Sir John Francis Davis in Hong Kong, 1844-1848	吳倫霓霞	1993
Wong, Man Kong (黃文江)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James Legge	吳倫霓霞	1993
區志堅	查繼佐及其《罪惟錄》之研究	羅炳綿	1994
林國輝	從《皇朝經世文續編》「學術」及「治體」部份 看晚清「經世思想」的內涵	劉義章	1994
馬木池	清前期潮州地方社會與書院發展	劉義章	1994
黎漢基	競逐權威：流亡知識分子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	郭少棠 梁元生	1995
伍德昌	國家建構與人力資源控制：以 1900-1916 年豫西 南的軍事發展為例	葉漢明	1995
陳偉文	「文化工人」——延安作家的自我形象與身份認 同(1937-1945)	葉漢明	1995
林錦源	汪康年與《時務報》——一位晚清改革者的思想 變遷	梁元生	1995
林玫芳	廣州學生運動(1945-1949)	劉義章	1996
Christopher Robyn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 Sino-American Historico- Cultural Synthesis	劉義章 何佩然	1996

新亞研究所(1961-1992)

作者	論 文 題 目	畢業年
李木妙	榮氏企業史研究〔博〕	1990
鄭潤培	清季漢陽鐵廠史之研究〔博〕	1990
廖 珍	清代文藝思潮	1961
黃養志	乾隆朝征緬考實	1963
梁中英	李鴻章與清廷外交對日決策關係	1963
楊玉華	十九世紀初葉中國商人在越南通商之概況	1967

郭遠欽	顧亭林年譜新編	1968
陳奕啓	沙勞越華僑之拓殖	1968
孫婉敬	民國二十五年中美貨幣協定述略	1968
鄧青平	清雍正年間的文官養廉制度	1970
歐陽鎰豪	從政治經濟兩方面看一九〇五年粵漢鐵路之續約運動	1973
翟志成	魯迅胡風之反控制鬥爭	1975
李金強	清代福州之研究	1977
黃兆強	趙翼史學研究	1979
李鴻	近三十年中國大陸之農村水利建設	1979
黎志剛	郭嵩燾對晚清經濟問題的探討	1982
廖偉慶	近年來中共提高糧食生產技術的政策	1983
鄭潤培	大生紗廠史略	1985
李木妙	近代中國民營企業的個案研究——榮家企業發展史	1985
李超群	晚清武漢經濟發展史略	1986
鄧雪蓮	清季福建船政局史略	1987
吳玉英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之史的研究	1987
楊學元	清中葉後國家財政與現代化企業的關係	1988
區紹賢	清代福建的糧食短缺問題及其補缺辦法	1989
方潤華	十八世紀福建米糧供求與米價變動的關係	1990
陳俊仁	中國近代(1897-1927)銀行史之研究	1990
高國豪	清代漕運制度的廢弛與改革研究	1992

香港浸會大學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
羅玉芬	Revolution or Rediscovery? Post-World War Tw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a Crossroad	Barton Starr	1996
潘淑華	Five Years of "Mischievous Activity": An Analysis of Governor Hennessy's Policies towards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1877-1882	馮培榮	1996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6.5~1997.2)

公小穎* 輯

(1996)5.8 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的「近代中國民眾動員的社會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於四川大學召開。來自北京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東京外國語大學、四川大學、四川師範大學等單位的教授、專家共 20 多人參加會議。會中討論辛亥革命、法國大革命、晚清新政時期四川反教運動中的民眾動員，以及蘇州「市民社會」與近代城市社會動、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治建設與抗戰民眾動員等，會期 3 天（至 10 日）。

6.2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及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聯合舉辦「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會期 3 天（至 26 日），邀請美、歐、日、港、大陸學者以及國內學者與會，發表論文 20 篇，其中與中國近代史有關的論文茲列如下：山田賢：〈清代四川之移住家族與地域社會——雲陽涂氏之個例研究〉；劉錚雲：〈清代四川的人口——史語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數冊》〉；賴惠敏：〈清代皇莊戶口的研究〉。

8.1 天津南開大學主辦「紀念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成立四十周年暨第三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會期 4 天（至 4 日），共有來自大陸各地及日本、韓國、香港等地 70 餘位學者與會，宣讀論文 65 篇，內容涉及明清兩代政治、軍事、經濟、中外關係、文化、人物各個方面。

8.9 由吳三連史料基金會與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東亞系主辦的「北美洲第一屆台灣歷史文化研討會」，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舉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行，會期 4 天（至 12 日），發表論文 25 篇。

8.10 由中國科技史學會少數民族科技史分會、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雲南農業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主辦的「第三屆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於昆明北郊雲南農業大學和大理市召開，共有來自大陸各地及台灣、日本近百名海內外不同民族的專家、學者與會，提交論文 80 餘篇。

8.26 「第八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於韓國漢城國立大學舉行，共有來自世界各地學者百餘人與會，其中中國學者 30 餘人，其中包括來自台灣的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傅大為、黃一農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祝平等，會期 5 天（至 31 日），會議就「西方科學和東亞科學的轉化」、「東亞社會中的開業醫生」、「近代東亞社會中的科學體制」和「東亞傳統科學的知識背景」四個專題進行討論報告，內容涉及東亞科學、技術、醫學發展史和科學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等各個領域。

9.19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張彬村先生主講：〈明清市場經濟發展的困境〉。

9.24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兼任研究員施添福先生主講：〈蘭陽平原傳統社會空間階層的形成和演變〉。

9.2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學術演講，邀請四川聯合大學羅志田教授演講：〈胡適的世界主義及其反傳統思想中的民族主義關懷〉。

9.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學術討論會，邀請四川聯合大學羅志田教授演講：〈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競爭〉。

9.3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學術演講，邀請四川聯合大學羅志田教授演講：〈如何向大陸學界介紹台灣史學研究成果〉。

10 月 由中國現代史學會、東北師範大學、《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委會、吉林省社科院等單位共同發起的「紀念『九一八』事變六十五周年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於本月上旬在長春舉行。

10.3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朱德蘭女士主講：〈近代台灣與上海香港長崎之間的中藥材貿易〉。

10.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張力先生主講：〈從「四海」到「一家」：中國海軍的整合，一九三七～一九四七〉。

10.5 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文化研究組籌辦的「婦女與宗教小

型研討會系列二」假該所第一會議室舉行，會議論文發表人及題目茲列如下：陳家倫：〈性別差異——社會結構位置對台灣宗教的影響〉；林美玫：〈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事業〉；李秀娥：〈鹿港夫人媽成神的傳說與類型〉；宋錦秀：〈古典妊娠論述中的「養胎」與「胎殺」：兼及台灣的比較研究〉；張珣：〈幾種道經中對女人身體的初探〉。

10.8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助研究員蔡采秀女士主講：〈東亞殖民都市的發展——以橫濱和基隆為例〉。

10.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李宇平女士主講：〈輿論與法幣政策的形成(1931-1935)〉。

10.18 馬歇爾基金會主辦「馬歇爾使華（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學術討論會」，會期2天（至19日），與會學者50餘人，發表論文21篇。（詳見本期「會議報導」）

10.29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研究助理洪麗完女士主講：〈從二林地區「番社」之移居活動看中部平埔族群遷徙成因〉。

11.3 由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廣東省社會科聯合會共同主辦的「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假廣東省中山縣翠亨鎮舉行，會期6天（至8日），共有來自日、韓、越南、俄、美、澳門及兩岸三地220位學者專家與會，發表論文130篇。（詳見本期「會議報導」）

11.4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假台北中央圖書館舉辦「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1996)」，為期3天。會中宣讀之論文與近代中國史研究有關者有：謝嘉梁，〈台灣歷史文獻館藏政策之研究〉；王明生，〈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舊藏資料保藏、管理與利用〉；朱法源，〈國防部檔案的管理與使用〉；劉維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藏會議檔案的內容與運用〉；趙雲鵬，〈遼寧省檔案館典藏歷史檔案及其開發利用述略〉；楊中一，〈雲南民族宗教檔案述評〉；方傳讓，〈「昆明城市近代建築史考研究」簡介〉；朱德蘭，〈從憲兵隊檔案看戰時日本在香港的反諜報活動〉；張力，〈檔案利用與抗戰史研究的新方向〉。

11.5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邀請銘傳管理學院共同科講師張素玢女士演講：〈台灣南部日本移民村之農業經營——以菸草經濟為中心〉。

1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陳儀深先生主講：〈政權替換與佛教大師的調適——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明真、虛雲、

道安、印順爲例)。

11.15 “Narratives, Arts and Ritual: Imagining and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研討會在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召開。

11.18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舉行學術演講，由研究員柯志明先生主講：〈清代台灣平埔族與漢人間的土地權利關係：以十九世紀初翁仔社業佃糾紛爲案例的分析〉。

11.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呂芳上先生主講：〈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轉變〉。

11.26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研究助理張隆志先生主講：〈歷史轉型期的社會與國家——從劉銘傳與後藤新平的台灣經營論談起〉。

11.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午餐會，邀請資深報人陸鏗先生演講：〈1949年以前政海人物印象記〉。

11.29 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合辦的「週五咖啡時間開講」，邀請比利時魯汶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張雯勸女士演講，講題爲：〈泰北地區雲南人的遷移：前國民黨軍隊與他們的家屬〉。

12.3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行專題演講，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先生演講：〈戀愛中的胡適——美國留學與中國現代化理論的形成〉。

1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澳洲雪梨大學教授黃宇和先生演講：“The Arrow War: A Study of Imperialism.”

12.5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季刊)主編演講：〈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構想與探索〉。

12.7 由西安事變研究會與西北大學文博學院主辦的「紀念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假西安市西北大學舉行，會期3天(至9日)，共有學者近百人出席，發表論文55篇。(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12.1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圖象研究室舉辦午後沙龍開講演講會，由研究員石守謙先生主講：〈明、日貿易與繪畫〉。

12.12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假台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舉辦「西安事變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會期1天(論文目錄見本期「會議消息」)。

12.14 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的「台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召開。會期2天(至15日)。(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12.1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八十五年度第一次主題演講，由研究員兼所長杜正勝先生主講：〈傳承與求新——談談我對史學的一些看法〉。

12.17 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的「紀念北伐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假台北市立圖書館舉行，會期二天(至18日，論文目錄見本期「會議消息」)。

12.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游鑑明女士主講：〈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

12.19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助研究員劉序楓先生主講：〈清乾隆初年的銅政改革：由洋銅至滇銅的轉換過程〉。

12.21 由馬尾造船廠、船史研究會、福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共同主辦的「船政文化學術研討會：紀念馬尾船政創辦130週年」，假福建省福州市東湖賓館舉行，會期3天(至23日)。(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12.21 由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香港華南研究會、中山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十七世紀的嶺南學術研討會」假中山大學歷史系舉行，會期1天(論文目錄見本期「會議消息」)。

12.22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跨世紀的文化反省與展望」系列論壇之一『革命或改革？——中國歷史百年回顧與展望』，由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方文學語言學系研究教授劉再復主講「百年來三大意識的覺醒及今天的課題」，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王汎森評論；及中研院院士張灝主講「百年來中國革命的思想道路」，中研院院士林毓生評論。

12.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學術演講會，由研究員王爾敏先生主講：〈論晚清思想中的過去與未來〉。

12.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長山田辰雄教授演講：〈廿世紀中國政治的連續性與孫中山初期思想〉。

12.31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研究助理宋錦秀女士主講：〈安胎、胎神與「煞」的觀念——以台灣傳統社會為例〉。

(1997)1.9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梁其姿女士主講：“Women Practicing Medicine in Premodern China.”（傳統中國社會裡參與醫療活動的職業婦女）

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林滿紅女士主講：〈台灣商業經營的中國傳承與蛻變——以近年台灣相關研究為基礎之省察〉。

1.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學術討論會，邀請挪威諾貝爾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Dr. Odd Arne Westad 演講：〈1950 至 60 年代蘇聯和中共之結盟〉。

1.17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東南區學會第 36 屆年會假喬治亞州 Savannah 市舉行，為期 3 天（至 19 日，相關論文目錄見本期「會議消息」）。

1.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邀請劍橋大學副教授方德萬 (Prof. Hans van de Ven) 先生演講：“Rescuing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ideals, violence and practice”（〈革命的概念與概念的革命〉）。

1.27 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暨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協辦之「第六屆國史研習會：政治、宗教與生活」，於花蓮縣舉行，會期 5 天（至 31 日），與會學者 19 人，研究生學員 54 人。

1.3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於台北該局舉辦「學術精進討論會」，計宣讀論文三篇：周金佑，〈史政編譯局現藏「台海危機」檔案介紹(1949-1960)〉；葉高樹，〈抗戰時期軍法執行總監部的設置及其運作〉；沈上明，〈從日本防衛廳戰史叢書探討日本於第二次中日戰爭初期的戰爭決策〉。

2.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翟志成先生主講：〈百花齊放聽新鶯——「抽象繼承法」提出的時機及其失與得〉。

2.18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討會，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張建俵先生主講：〈台灣戰爭損害問題初探〉。

2.26 國史館宣佈，「蔣中正總統檔案」（原名「總統府機要室檔案」，俗稱「大溪檔案」）對日抗戰前之北伐時期全部及統一時期部份籌筆檔共一百冊，即日起開放閱覽。

2.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熊秉真女士主講：〈明代的童心辯〉。



圖右：藏於福建福州馬江海戰紀念館的船政界石（馬幼垣攝）

圖下：中研院近史所網際網路首頁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簡史

出版品

學術研究組

學術支援單位

一般近代史組

圖書館

政治外交史組

檔案館

社會經濟史組

資訊室

文化思想史組

NEW 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全文檢索資料庫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本期要目

台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

船政夢華：紀念福州船政局創辦一百三十週年的研討會

群英會翠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追記

大陸「第二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學術會議」記略

「紀念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紀要

研究生生活的回顧——從梁啟超到現代化

對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學人簡介——張爾園

中國大陸太平天國史研究述評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出版緣起

上網際網路 INTERNET 查詢近史所資訊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近代中國研究與典藏

——倫敦地區史料介紹之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澳門專檔》史料介紹

從汪精衛一封未傳送出去的函稿談起

新書評介三本

